新建設

第三卷 第二期

東方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社論）

十月革命與蘇聯和平政策

蘇美經濟制度及其世界政策

歷史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關於整理現代史料的幾個問題

康德哲學批判

魏晉玄學的社會意義——黨性

現階段土地改革的理論分析

明代人民反官僚地主的鬥爭

關於中國原始藝術的發展

「嘎達梅林」和「阿那爾漢的歌聲」

科學和宗教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週年（座談紀錄）

柯柏年　王亞南　徐特立　翦伯贊　金毓黻　鄭昕　侯外廬　朱劍農　丁易　常任俠　臧克家　周邦立譯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

馬列主義理論叢書

自然辯證法

恩格斯著 鄒易里譯

本書舊版係里雅沙諾夫所編，錯漏雜亂，大大違反恩格斯生前寫作計劃。一九四九年蘇聯馬·恩·列學院依據恩格斯為本書所擬草案及與本書有關文件重行編譯成目前全新版本，計草案二篇，論文十篇，雜記和散篇十篇，後者各按性質分為辯證法、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項；結構細密，條理清楚。譯文正確通俗，極少一般譯文所常有的、生澀難讀的、不流暢的文句。（基價十六元八角）

學習雜誌叢書

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

斯特羅果維契著 曹葆華·謝寧譯

這是一本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研究邏輯的書。它解答了什麼是邏輯的問題；並扼要地說明邏輯底發生、發展的歷史；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闡明了形式邏輯底四個基本規律；明確地解決了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的關係問題。

（基價四元）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恩格斯著 張仲實譯

基價七元二角

反杜林論

恩格斯著 吳黎平譯

基價十四元

德國農民戰爭

恩格斯著 錢亦石譯

基價九元

新聞工作叢書

新聞工作叢書係聯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講義的選譯。為了便利讀者了解起見，其中並附有選自「真理報」的一些有關的參考材料，對蘇聯新聞工作經驗作了比較有系統的介紹。

怎樣領導黨報

波得庫爾科夫等著 蔣齊生等譯

本書包括聯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講義：「省級報紙編輯部工作的組織」和「論報刊述評」，並選譯「真理報」所發表的「報刊述評」、「報紙巡禮」和「最近來郵」等多篇，闡明了報紙領導工作的各方面。（基價四元五角）

報紙編輯部的群眾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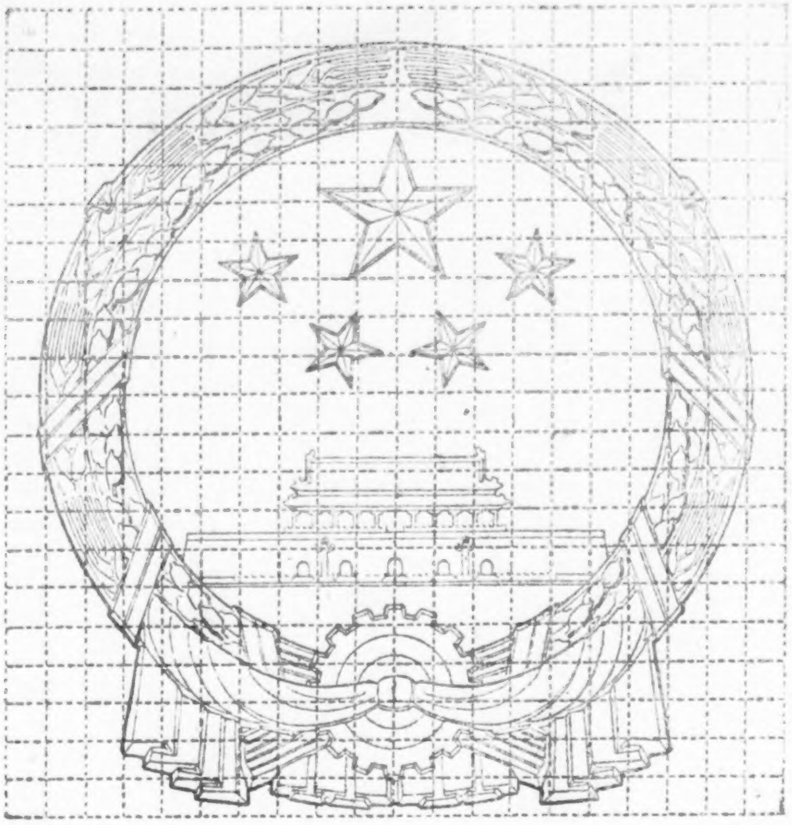
葛列勃涅夫等著 徐演等譯

本書包括聯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講義「報紙編輯部的群眾工作」和「報紙編輯部怎樣處理勞動者的來信」及選自真理報的有關論文三篇。關於工農通訊員和讀者來信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參攷。（基價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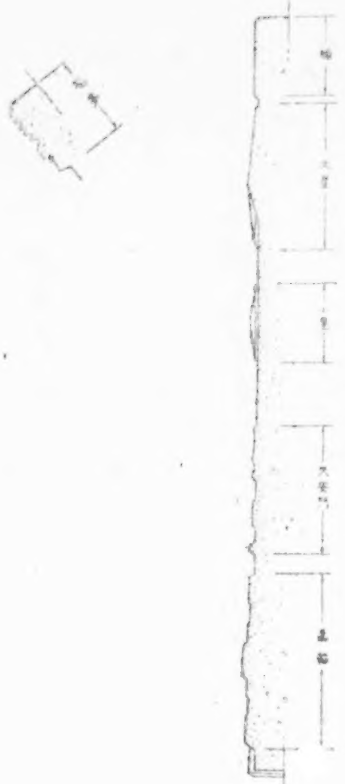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M10-0-[illegible])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方格墨線圖



國徽圖案縱斷面圖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製作說明

一、兩把麥稻組成正圓形的環。齒輪安在下方麥稻桿的交叉點上。齒輪的中心交結着紅綬向左右綰住麥稻而下垂。把齒輪分成上下兩部。

二、從圖案正中垂直畫一直綫，其左右兩部份，完全對稱。

三、圖案各部分之地位、尺寸，可根據方格墨綫圖之比例，放大或縮小。

四、如製作浮雕，其各部位之高低，可根據斷面圖之比例放大或縮小。

五、國徽之塗色爲金紅二色：麥稻、五星、天安門、齒輪爲金色，圓環內之底子及垂綬爲紅色；紅爲正紅（同於國旗），金爲大赤金（淡色而有光澤之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使用辦法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徽在下列各機關懸掛：

1、中央機關：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及其直屬機關。

2、地方機關：

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

民族自治區人民政府；

省、市、縣人民政府及人民行政公署。

3、駐外國使館及領事館。

二、國徽之懸掛：

1、國徽應懸掛於機關大門上方正中處；

2、國徽之懸掛於禮堂者，應懸掛於主席台上方正中處。

三、國徽之其他使用：

1、中央人民政府頒發的有關榮譽之文書証件（如奬狀、勳章及奬章証書等）、外交文書（如國書、條約及全權証書等）及外交部所發各種護照之封面，均加印國徽；

2、外交部及駐外各使領館所用之鋼印、戳記中間應雕刻國徽；正式公文用紙應加印國徽；

3、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政務院總理及外交部部長與駐外各使館館長以職位之名義對外所用信封、信箋、請柬等上面，均加印國徽；

4、外交部及駐外各使領館得於外交官制服、信封、信箋及其他器具用品（如餐具、文具等）上之適當地方，加印或鑲嵌國徽，其詳細辦法，由外交部擬訂經政務院核准後施行；

5、除以上列舉外，如尙有其他必要用途時，由使用機關報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批准後，始能使用。

四、國徽不得用於下列場合：

1、私人婚喪慶弔禮節中的點綴；

2、工商業品的標記、裝飾、廣告、圖案；

3、機關、學校、團體的証章、紀念章及其他徽章；

4、日常生活的陳設佈置。

東方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社論）

·專著·

十月革命與蘇聯和平政策　柯柏年（五）
蘇美兩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及其世界政策　王亞南（八）
★
歷史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徐特立（一一）
史學方法商討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翦伯贊（一四）
關於整理近代史料的幾個問題　金毓黻（一八）
★
康德哲學批判　鄭昕（二一）
魏晉玄學的社會意義——黨性　侯外廬（二六）
★
現階段土地改革的理論分析　朱劍農（三〇）
明代蘇、松、常三府人民反官僚地主的鬥爭　丁易（三六）
★
關於中國原始藝術的發展　常任俠（四一）
「嘎達梅林」和「阿那爾漢的歌聲」　臧克家（四四）
——略論兩篇民間紀事詩

學術問答

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有那些根本的區別？我們今天還有研究形式邏輯的必要嗎？（馬特答）（四七）
中國的農業稅和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初期時的糧食稅有沒有什麼不同？今天中國和當時蘇聯的情況是不是有些類似？（千家駒答）（四八）
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的基本內容，有那些不同？當一個國家違犯國際公法的時候，誰來執行國際公法上的規定呢？（李浩培答）（四八）

·譯　文·

科學和宗教　蘇·Б·А·伯格達諾夫　周邦立譯（五〇）

論商品與貨幣（下）　英·J·伊頓等　吳恩裕譯（五四）

·座談記錄·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週年　中國新史學研究會　新建設雜誌社（五八）

·書　評·

美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崩潰——評陳伯達著「中國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敵蔣介石」　蘇·Д·查斯拉夫斯基　茹普譯（六五）

對呂著簡明中國通史隋代部份的幾點意見——附呂振羽覆函　羅元貞·高振鐸（六七）

學術文摘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中國革命　陳伯達（七一）

馬克思的經濟恐慌學說　郭大力（七一）

論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價值律　沈志遠（七二）

「新理學」底自我批判　馮友蘭（七二）

學術簡訊

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科學討論會——地質學家裴文中等考查東北文物古蹟——國際民主法學工作者聯合會動態——朝鮮學者爲祖國獻身——拉脫維亞圖書館六十五週年紀念——塔什克設立新馬恩列學院——日本學術新著（七七）

編後記（四九）

社論

東方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朝鮮的戰爭局勢，現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美帝的侵略魔爪，已公然越過三八線，並向鴨綠江畔伸展。對於朝鮮人民的英勇抵抗，我們從來是抱着無限同情的態度的，對於目前戰爭局勢的發展，我們更不能不密切地注視。因爲，我們認識到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在今天，我們尤其認識到東方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多少歲月來，中朝兩國人民一直保持着親密的友愛關係。從地理上看，兩國襟帶相連，安危與共。中國人民關懷朝鮮戰局，本來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我們並沒有忘掉甲午之戰，我們牢記住『唇亡齒寒』的歷史教訓。在過去，日本帝國主義曾把朝鮮變爲侵略東北的總指揮站，到今天，美帝也要妄想以朝鮮爲侵略東北的軍事基地了。所以，中朝兩國的關係，是息息相關的。中朝兩國的人民，就像是骨肉手足：朝鮮人民的朋友，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朝鮮人民的敵人，就是中國人民的敵人；朝鮮人民的苦難，也是中國人民的苦難；朝鮮人民的勝利和光榮，同樣是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光榮！我們完全擁護周總理的昭示（九月三十日），我們要正告美帝侵略集團：「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理，我們當然要理！美帝妄狂宣佈，要以武裝侵奪台灣，難道我們還能不理？美機再三侵入東北領空，並且不斷掃射我國人民，難道我們還能不理？美帝派遣大批特務，搗亂我國社會秩序，難道我們還能不理？一句話，美帝已公開向中國人民直接挑釁，嚴重地威脅到東北國防，甚至隨時會進犯我國領土，我們要是再不理，戰爭販子一定更囂張、更瘋狂。

在今天，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反對美帝侵略和援助朝鮮人民，祇是一件事的兩方面。如果我們要制止美帝進窺東北，就不能讓獸兵出沒於中朝的接壤地帶；如果我們要在東北穩步地進行和平建設，更要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作爲我們的屏障。爲了保衛我們的國防，也爲了我們國家和平建設能有保障，我們首須粉碎美帝的侵略陰謀；要粉碎美帝的侵略陰謀，我們義不容辭地要向朝鮮人民伸出友援之手。在現階段，援助朝鮮人民就是我們反對美帝侵略和保衛世界和平的一個必要和有效的步驟。

從整個國際形勢來看，今天世界民主和平陣營所處的地位，是更有利了。朝鮮戰爭已把帝國主義强盜頭子的泥足陷入不拔的深淖，今後朝鮮人民在堅持長期抗戰的方針下，必能克服許多困難，取得最後勝利。中國人民和越南人民所走的革命道路，必然就是朝鮮人民所走的革命道路，這是一條長期鬥爭的道路，也必然是一條全面勝利的道路。面對着這樣一個新的形勢，我們對於朝鮮戰局的發展前途，實在沒有杞人憂天的任何根據。朝鮮人民在漢城和平壤保衛戰中所表現的新愛國主義和革命的英雄主義精神，完全證明了朝鮮人民一定會像中國和越南人民那樣，經得起革命的歷史考驗的。在全世界保衛民主和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與人民，首先是他的最親近的鄰人、中國、的支援之下，勇敢的朝鮮人民必將最後得到自由、獨立和解放！

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當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的地位越是絕望，它就越加激怒，愈要採取軍事冒險的侵略行動，這表示它徬徨失措，表示它外强中乾，表示它狗急跳牆！但是，它跳來跳去，總跳不出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眞理、正義和進步勢力必勝，强權、暴力和反動勢力必敗的規律！希特勒倒下去了，墨索里尼倒下去了，東條倒下去了，明天的杜魯門、邱吉爾、艾奇遜、馬歇爾、麥克阿瑟……也必定會一個個倒下去！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越南人民站起來了，明天的朝鮮人民和其他一切被壓迫的人民也必定會一個個站起來！讓我們加强團結，充實國防，展開反美援朝運動，粉碎美帝擴大戰爭的一切陰謀，爲保衛世界和平貢獻出最大的力量！

最後，我們願意號召全國的學術工作者，更緊密地團結起來，配合這一運動，對美帝的侵略暴行作更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宣傳，共來展開一個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反侵略運動！

專著

十月革命與蘇聯和平政策

柯柏年

十月革命是近代歷史最偉大的事件，它不只是廢除了國內的階級壓迫和剝削，而且廢棄了國外的民族統治和剝削。只有推翻了階級壓迫和剝削的資本主義，才能廢棄民族統治和剝削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上層建築。』（列寧）。所以，十月革命成功後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底對外政策，只能是民主的和平政策。

在十月革命底前夜，俄國老百姓要求『和平——土地——麵包』。所以，列寧在『革命底任務』一文中，指出蘇維埃政府底對外政策，應該是和平政策。他說：『蘇維埃政府應立刻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即同時旣向該國政府，也向該國工農羣衆）提議馬上根據民主條件訂立總的和約，並立刻訂立休戰協定（那怕只是三個月也好）。

『民主和約底主要條件是放棄兼併（掠奪），——這並不是說歸還各列強所喪失了的領土等，這樣的瞭解是不正確的；而是說，每個民族，無論在歐洲或在殖民地中，毫無例外地都有可能由自己自由決定，究竟是組織獨立的國家，或是加入任何一個其他的國家，這才是對於放棄兼併的唯一正確的瞭解。

『蘇維埃政府既提出媾和條件，它自己就應立刻在實際上着手執行這些條件，即公佈並廢除那些束縛我國的秘密條約，就是原來由沙皇訂立，答應俄羅斯資本家有可能掠奪土耳其、與地利等等的秘密條約。其次，我們必須立刻滿足烏克蘭人和芬蘭人底要求，保障他們以及一切居住在俄國的他族人民享有完全自由，直到自由分立爲止，同時對全部阿爾明尼亞也採取這樣的原則，必須把駐在阿爾明尼亞境內，以及我國所佔土耳其領土上的軍隊概行撤退等等。

『這樣的媾和條件是不會得到資本家的歡迎的，可是在所有各國人民中却會獲得莫大的同情，會引起他們的熱忱和一致痛恨遷延强盜戰爭這一義憤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大爆發，這就極有可能使我們一下子到得休戰和同意開始媾和談判的回答。因爲工人的反戰革命，到處都無可遏制地高漲起來，要推動這個革命前進，決不是和平空談（一切帝國主義政府早已用這種空談來欺騙工農，我國的克倫斯基政府也是一樣），而只有與資本家斷絕關係並提議和平，才能做到。』（「革命底任務」）。

十月革命勝利了。掌握了政權的工農政府，立即頒佈了『和平法令』。

『和平法令』不僅是代表俄國工農勞動人民底要求，也代表全世界勞動人民底要求。它說：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所建立起來並憑靠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工農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及其政府提議，立刻開始進行正義民主的和平談判。

『本政府認爲，一切交戰國中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痛苦不堪，半死半活的工人和勞動階級絕大多數所渴望，而爲俄國工農在推翻沙皇帝制後所極肯定

堅決要求的正義的和平，乃是必須立刻締結的不兼併（卽是不侵佔別國土地，不強迫合併別的民族）和不賠款的和平。……

『本政府根據一般民主派底法權意識，特別是勞動階級底法權意識，認爲凡是把弱小民族合併於強大國家而沒有得到這一民族所明確自願表示出的同意和願望，都是兼併或侵佔他國土地的行爲，並不管這種強迫合併是何時實行的。

『本政府認爲，爲了各富強國家來如何瓜分它們所侵佔的弱小民族而繼續這次戰爭，便是反人類的莫大罪行，所以鄭重聲明，決意根據上述對一切民族都是同樣正義的條件，立刻訂立停止這次戰爭的和平條約。……

『俄國臨時工農政府向一切交戰國政府和人民作此種媾和提議時，又特別向人類三個最先進民族和此次戰爭中三個最大參戰國，卽英法德覺悟工人們呼籲。……所有這些無產階級英勇精神和歷史創舉底模範，都使我們堅信上述各國工人定會瞭解他們現在所担負的，使人類擺脫戰禍及其惡果的任務，因爲這些工人定會以各方面的、堅決的、竭誠努力的活動，來幫助我們把和平事業以及使被剝削勞動民衆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制的事業有成效地貫澈到底。』

列寧在『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草案』（後來稍加修改，成爲蘇俄憲法底一部分）中，把工農政府底外交政策規定得更明顯：『（一）立憲會議表示具有不屈不撓的決心，要把人類從造成此次空前罪惡戰爭以致殺人遍野的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底血爪下解放出來，因此完全贊同蘇維埃政權所執行的下述政策：廢除秘密條約，現時交戰雙方軍隊中的工農進行最廣泛的聯歡，無論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來達到各國人民間以民族自由自決爲基礎的不兼併不賠款的民主和平。

『（二）爲了同一目的，立憲會議主張與資產階級文明世界底野蠻政策完全斷絕關係，這種政策是以奴役亞洲和一般殖民地以及弱小國家中數萬萬勞動民衆爲基礎，造成少數特殊民族中剝削者底福利。立憲會議表示歡迎人民委員會宣佈芬蘭完全獨立，開始從波斯撤退軍隊，宣佈阿爾明尼亞有自由實行自決的政策。

『立憲會議認爲宣告廢除歷來沙皇、地主和資產階級政府所訂債款的蘇維埃法令是對國際銀行和金融資本的第一個打擊，並深信蘇維埃政權定會堅定地遵循這條道路前進，一直達到國際工人起義反對資本壓迫的完全勝利。』

從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可以看出十月革命成功後，蘇維埃政府立卽實行着民主的和平政策。終止帝國主義戰爭，實現不兼併、無賠款的和平，堅持一切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原則，廢除剝削其他民族的條約，——這就是民主的和平政策底主要內容。這是外交底革命，空前未有的革命！

蘇維埃政府底這一正義的民主的和平政策，遭到當時兩大帝國主義集團所反對，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爲帝國主義強盜始終是強盜。當時帝國主義強盜們非但沒有接受蘇維埃政府底民主的和平建議，反而企圖以武力來扼殺這年青的蘇維埃政府。一方面是德國大舉進攻，迫使蘇維埃政府簽訂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約；另一方面是英、法、美、等十四國直接武裝干涉和援助反革命的白黨軍隊。可是，一切帝國主義強盜企圖以武力把社會主義蘇維埃政府扼殺的陰謀，都宣告失敗。到了一九二二年十月紅軍和游擊隊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手中解放了海參威時，外國武裝干涉者就全部被驅逐出境，蘇維埃政府贏得了存在的權利。

兩種制度並存——這一事實，帝國主義強盜已不得不承認了。然而他們充滿着對社會主義蘇維埃政府的瘋狂仇恨，與他們酷嗜搶掠的本性，使得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機會進攻社會主義的俄國，扼殺無產階級的政權。

蘇維埃俄國底政策，仍然是和平政策。列寧說：『所以我們應當記着，從國內戰爭和反協約國戰爭所開闢的全世界歷史範圍看來，和平當然是可能的。但是，我們一面作各種促進和平的步驟，同時應當極力備戰，絕對不解除我們軍隊底武裝。我們軍隊是使帝國主義列強不敢作絲毫侵犯我國企圖的眞實保障，因爲它們縱然可以指望起初獲得某些僥倖一時的勝利，但結果任何一國都不免要爲蘇維埃俄羅斯所粉碎。』（俄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前夜，社會主義的蘇聯底對外政策，始終是和平政策。斯大林一九三九年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說：『蘇聯底對外政策是明白而顯然的：（1）我們維護和平，並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業務聯系，只要它們也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而不來試圖侵犯我國利益的時候，我們是始終都保持這個立場的。（2）我們對所有與蘇聯交界的鄰國，都保持和平善鄰的關係，只要它們也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而不來試圖直接或間接破壞我蘇維埃國家疆土完整安全利益的時候，我們是始終都保持這個立場的。（3）我們援助遭受侵略而爲本國獨立奮鬥的民族。（4）我們不怕侵略底恫嚇，而決計用雙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蘇聯疆土安全的戰爭挑撥者

底打擊。這就是蘇聯底對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是更加強大了，它底對外政策仍然是和平政策。斯大林在一九四七年與史達森談話時，說道：『這兩種經濟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當然能互相合作。這兩種經濟制度之間的差異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因爲所談的是兩種制度的合作。德國和美國的經濟制度是相同的，但是兩國之間却發生了戰爭。美國和蘇聯的經濟制度並不相同，但是兩國沒有交戰，而且在戰時合作了。假使兩種不同的制度能在戰時合作，那末爲什麼不能在和平時期合作呢？當然，很清楚，假使願意的話，經濟制度雖然不同，合作還是完全可能的。不過，假使不願意合作，那末即使經濟制度相同，兩個國家及人民還是可能交戰起來的。

『第一次表示兩種制度可能合作的是列寧。列寧是我們的導師，而我們蘇維埃人是列寧的學生。我們從來沒有放棄，而且將來也永遠不會放棄列寧的指示。也許一種制度——例如資本主義制度——不肯合作；不過這說的是合作的願望，而不是合作的可能性。至於說到蘇聯的人民和共產黨，那他們是有合作的願望的。毫無疑問，這種合作對於兩國都有益無害的。

『應該辨別清楚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的願望之間的差別。合作的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的，但是合作的願望却不是永遠有的。假使有一方不願合作，結果就是衝突，戰爭。

『每一個民族都支持着他們願意和可能支持的制度 。那一個制度比較好——這讓歷史去證明。應該尊重人民所選擇和擁護的制度。爲了合作，不必要求各民族有相同的制度，應該尊重人民所擁護的制度。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合作才有可能。』

十月革命後蘇聯底對外政策，一貫地是和平政策。社會主義的國家，廢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所以，不論是在革命剛成功、力量還比較弱的時候，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力量已極強大的時候，它始終如一地爲世界持久的民主的和平而奮鬥。它爭取和平，因爲和平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 。它不怕和平，因爲兩種制度底和平競賽之結果，勝利的必然是社會主義。

今天，美帝國主義繼着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妄想奴役全世界。強大的蘇聯底民主和平政策，是美帝實行侵略戰爭政策時所遭遇的最大的障礙 。因此，美帝底造謠機構，集中力量在誣衊蘇聯。最近艾奇遜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講、杜魯門在舊金山的廣播，都恬不知恥地撒謊，說蘇聯在破壞世界和平。事實究竟是事實。全世界老百姓看清楚了：蘇聯正在全力進行和平經濟建設，而美帝則在加緊準備世界戰爭；蘇聯堅持一切民族自決權，尊重各國人民所選擇的制度，反對干涉他國內政，而美帝則以軍事的經濟的援助給予全世界一切反動政權，反對人民解放運動，武裝侵略朝鮮和中國；蘇聯並沒有在美國鄰國設立什麼軍事基地，而美帝則在外國領土設立了四百多個軍事基地，把國防線推到離美國本地三千多哩（大西洋方面）和五千多哩（太平洋方面），準備進攻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事實勝於雄辯。全世界老百姓是站在蘇聯底民主和平政策這方面的！

本刊啓事

本刊自第三卷第一期起，已委託全國新華書店代售代訂。至原在本社及本社上海辦事處訂閱者，仍由本社繼續寄發，至期滿爲止。惟因本刊已改爲月刊，篇幅增加，定價調整，故原訂兩期者折爲一期，折算後不滿一期之餘數，以一期計算，此啓。

從土改中學習

本社叢書之一　基價四元七角

土地改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也是一種最劇烈的鬥爭形式。本書是幾個知識份子參加京郊土改工作的實際報導，提供工作經驗，並且說明他們如何在現實鬥爭中教育了自己，提高了自己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學習土改，也可以幫助一般知識份子在思想上爭取自我改造。書末並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和劉少奇副主席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等重要文獻。

蘇美兩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及其世界政策

王亞南

我們研究這個題目，主要是在幫助我們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分辨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在過去，我們一直把美國看成我們的朋友。而今天，蘇聯才是我們眞正的朋友，美國則是我們橫暴的敵人。這種友敵關係的轉變，明顯地看出是政權轉變的結果。買辦官僚政權自然是要以蘇聯爲敵而以美帝爲友的。

可是，認淸這種友敵關係，也並不是十分簡單的事。因爲現在整個世界是被二個政策——和平政策和戰爭政策——支配着，它們影響滲透到了社會一切方面。和平政策原是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推行的，反之，以美帝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統治階級，却千方百計地使世界保持在戰爭狀態下，甚至製造戰爭狀態，以便利其侵略剝削的自私自利企圖。爲了達成這個目的，它們便在第二次大戰過程中及在此以後覺醒起來翻身過來的落後國家，拚命扶植能滿足它們帝國主義要求的舊統治勢力，把那種執行其命令的傀儡統治，叫作「民主」「自由」秩序；可是反對那種罪惡統治的革命活動，則被它們定義爲破壞民主和平秩序的暴力。特別是像台灣的蔣介石，朝鮮的李承晚，安南的保大之流，臨到從根破滅的階段，更像煞有介事的叫嚣和平，希望人民軍不要最後地消滅他們。戰爭販子施弄和平烟幕，會經迷惑過一些人。對於這種情形，是需要從本質上加以辨識的。怎樣才能從本質上去辨識呢？簡言之，就是要從和平集團和侵略集團的領導國家蘇美兩國的社會經濟制度本身去分析究竟誰要戰爭，誰要和平。不過，社會經濟制度是包括很廣的，我們只能在瞭解它們的世界政策所要求的限內，來加以說明。

一　蘇聯社會經濟制度及其世界政策

討論一國的社會經濟制度，首先要從考察該社會的財產關係——生產關係出發。在蘇聯社會，全社會的生產手段（或生產資料）基本上是公有的。第二次五年計劃快結束的時候（一九三八年），蘇聯全社會財產中，工業上99.9%，農業上99.7%的生產手段是社會公有的。公有有二種形態：完全公有和集體農場合作社所有。關於後者，社會公有還佔9%，像集體農場中的土地，拖拉機……，主要部分，還是屬於全蘇聯人民的。至於私有財產形態，也存在於蘇聯社會，它屬於手工業者和個體農民，但其在全體財產中只佔0.2%的微微不足道的比率。

這三個財產所有形態，存在着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們都建立在勞動人民自己的勞動基礎上，即是說，在蘇聯社會裏，剝削關係已不存在了。

因此，反映在它政治上的生產關係即社會政治組織，也是非常明白的，沒有存在着壓迫關係。蘇聯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是完全調和統一的。政權屬於全蘇聯勞動人民。蘇維埃政府組織中，從聯邦院（以區域人口爲單位選出代表）和民族院（以民族爲單位選出代表）的成分一、三二九人中看來，工人佔五四一人，農民三四九人，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四三九人。其中婦女代表佔總數二七八人。資產階級學者往往汚蔑蘇聯，認爲沒有反對黨是不民主的，這充分表明了他們惡意的誹謗和政治水平的低下。因爲政黨是代表社會階級的，希望一個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完全被消滅了的蘇聯社會主義社會裏，存無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政黨或封建階級政權，那簡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由於政治經濟的統一，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調和，蘇聯社會經濟，就以無比的速率，向前發展。

從一九二九——四一的十二年間，蘇聯社會財富增加、經濟發展的速度，用一般資本主義國家速度計算，要相當於一百年，用發達較快的美國的速度計算，也相當於八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蘇聯社會經濟曾受到了澈底的破壞和攪擾，但戰後恢復的速度，更加驚人：一九四九年第一季工業生產已超

過戰前一九四一年的53%；超過一九三九年的九倍。其發展或恢復的速度之所以如是迅速，就是因爲蘇聯社會沒有剝削關係，可以無限制地發展生產力，不斷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勞動人民政權可以全力來執行有利於全社會的計劃和政策，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在大大提高。一九四七年廢除戰時配給制後，國內物價曾三度減低：第一次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使人民得到八六〇億盧布的好處；第二次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人民受到的利益是七一〇億盧布；第三次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人民受到的利益是八〇〇億盧布。這些表明了人民的物質生活再次地被迅速提高，而精神生活方面，不僅全面消滅了文盲，在科學及一般文教上也因適應生產的需要，和具有充分發展的物質條件，而一日千里地向前開展着。

在這樣社會裏，它沒有失業，沒有生產過剩，沒有經濟危機。而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它只有在經濟分工的基礎上，才有同他國進行物資交換的必要，它對國外市場是沒有特別需要的，是沒有任何理由來從事擴張的。像這樣的社會，它的世界政策究是要戰爭抑要和平呢？這成了明如觀火的事實。

所以，從本質上考察，蘇聯要和平而反對戰爭，是由它的社會制度決定了的。只有和平，才能更快的發展經濟，更迅速地提高人民生活，更早地完成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而戰爭所帶來的，却是阻礙和延緩如上所論的種種建設成果。

自然，從國際的觀點看來，蘇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尚只是基本的而不是最後的消滅資本主義，因爲在國外帝國主義國家還存在着。蘇聯是願意聲援全世界人民革命勢力，熱誠歡迎全世界其它各地同樣實行社會主義，但這絕不是革命的任意輸出，革命是在每一社會自身的條件下發生發展的，它不必輸出也不能輸出。而況任一戰爭的犧牲者都是勞動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德國減少人口10%以上，希特勒誠然是隨着戰敗而倒斃了，墨索里尼和少數日本財閥、軍閥雖然也隨着戰敗倒斃了，但主要的傷亡却是勞動人民，德、意、日大資產階級照常活得很好，所以儘管蘇聯同情並聲援落後地域的反抗壓迫的鬥爭，但爲了避免勞動人民的犧牲，並不因此就要求把那種戰鬥擴大爲世界性的戰爭，反之，它是用盡一切努力使那種性質的戰鬥或戰爭局部化的。

二 美國社會經濟制度及其世界政策

美國是當前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也是當前最兇惡最專橫的帝國主義國家。到戰後，由於它變得更強大了，它的資本主義的本質，才使它不能不變得更強橫與野蠻，更法西斯化。我們知道：今日的美國，並不是一向就是這樣富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它還是一個債務國，從那次大戰以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倒下去了，它就因緣時會，因緣其有利地位，暴發起來，變成了債權國，變成了戰爭的暴發戶。第二次大戰，它更發橫財了。目前全世界黃金總值二九〇億美元，美國擁有80%即二三〇億美元，它的工業生產力佔全世界工業生產力的60%；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它的海外租借物資達八〇〇億美元，海外投資一七〇億美元。

可是，這樣富有的美國，究竟它的財富是爲誰所有呢？蘇聯的財富是屬於全體勞動人民的，美國呢？儘管全部財產在美國沒有確實的統計，但從英國的情形看，據一九三六年調查，英國一千英鎊以上財產所有者佔全國人口63%的人，卽掌握了社會財富83.3%，美國的情形當然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不必計算總數，單從美國財富迅速集中到華爾街來考察這個問題，就可見一斑了。華爾街中有五十家最大銀行，其中八家是更大的，一家最大的。八大銀行所有的財產共一千億美元，至它們通過各種投資方式所間接控制的資產，就更可想而知。比如那八大銀行中最大的摩爾根銀行所直接控制的公司，竟達四四〇家之多，它所有和控制的財產，共達七百億美元，等於全世界黃金總值二倍強，稍少於英國一九四三年的全社會所得（據調查英國該年全英人民收入是八百億美元）八大銀行統治，是通過它們派出的各種各色的董事，控制着各種各色的大企業。其中，交通運輸業五八五個董事，保險業二八七個董事，大製造業八六四個董事，大公司三五六個董事，雜誌報章三〇一個董事，至其間接所控制的派出董事，則達三、七四一人。全國各種企業，是在這種形態下被操縱統制，被造出金融寡頭，這就是美國。

然則這樣大的財富，是怎樣被蠻積起來的呢？一九二九年是美國經濟大恐慌的一年，那時美國十億美元財產的大公司，還只二十家；一九三九年爲三十八家；到了一九四五年共增至四十五家。所控制的五二五家公司所獲的利潤，一九三七年還只有純利三十九億美元，到一九四七年共獲利一七四〇億美元，在一九四〇——四六年總數共六六五億美元，由此可見這些財富，主要是在大戰過程中積蠻起來的。其方式是：

1.合併：因配合軍事需要，把小資本的企業，在極有利件的條下，合併起

來：

2. 津貼：在戰爭過程中，美國政府曾大量津貼軍火工商業；

3. 包銷：戰時所生產的軍火和戰時物資，全部由政府包銷；

4. 代管：政府設置工廠設備，如軍火工業等，由資本家管理經營。

在獨占資本家漁利發財的過程中，勞動人民不僅犧牲生命，他們由勞力生命換得的報酬，還由通貨膨脹受到殘酷剝削，所以勞動階級的實得工資與資本家利潤適成反比，貧富懸殊更加兩極化。據美國人自己的統計，美國人民毫無儲蓄，過着從手到口生活的，佔全部人口30%，完全不能維持生活的佔9%，依據他們算計的最低的合理生活要求，則全國80%的人民，無法達到這種水準。羅斯福生前曾敍述美國財富集中結果，人民有三分之一不能維持生活。羅氏只是較爲開明的資產階級的發言人，所說的還未接近眞相，據美共領袖福斯特所說，不能維持生活的人民，並不是三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

社會財富迅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而大多數人民則淪於飢寒邊緣，因而美國就有如下的社會現象：

（一）六百萬學齡兒童無法進學校；

（二）全國有二千萬文盲；

（三）已達選學年齡尙未入學者，有三百萬；

（四）神經病患者衆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因患神經病不能當兵者六百萬，現在每年都在迅速增加；

（五）大量的犯罪，據估計：每十七——十八秒有一重要犯罪案件。平均每天三十六件兇殺案，每年十一萬三千大盜竊案。犯罪在社會學上稱爲零碎的反抗，因爲今天的美國勞動階級，一般還未覺悟，控制在資產階級手裡，上層工人階級的被收買，使得窮苦的勞動人民未能好好地組織起來，而只能進行着零星的反抗。

（四、五兩項是一九四八年美國社會安全委員會向杜魯門所提出的報告）

在這樣貧富兩極的社會裡，政治法律秩序是怎樣維持的呢？讓我們分析資產階級所大聲標榜的美國的「民主、自由和幸福」。

羅斯福曾說過：「一個私人權力擴張到比民主國家權力還大時，這社會的民主和自由就不能維持了」。那麼誰是美國眞正的統治者呢？有人曾描寫「一千個美國人統治着美國」，這是就五十個銀行家以及二百個非銀行家並其家族合計而來的。還有一本書名「美國六十家」的著作，說明美國是由六十家美國人統治着。「民主」選舉是以金錢獲得的，在八十一屆國會中，上院六十六位職員中，律師十六人，工商業家九人，農業家五人。下議院議員中律師佔二三五人，工業家八十五人，農業家三十五人，新聞工作者二十一人，共它二十一人，在兩院五三一位議員中，婦女代表只有九人，而律師——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約達三百人。選舉是通過威務利誘種種卑鄙手段進行的，前年美國總統選舉，卽有人迫害或恐嚇，阻止選舉進步黨人和共產黨人。維持少數壓迫階級的統治，不僅依賴如是的政治組織和司法警察制度，他們還把魔掌伸到文化事業、學術機關、慈善事業裡面。資產階級控制了全社會報紙發行數，除了極少數屬於進步力量以外。像今年三月愛因斯坦發表科學研究成果，資產階級報紙交相讚揚，過了不久愛氏發表原子能只能用以增進人民福祉，不該用以屠殺人民的言論，資產階級報紙立卽動員起來攻擊愛氏，甚至倡言要把他驅逐出境。由這個例子看來，美國的「民主」「自由」全是騙人的幌子，它只是在資產階級利益容許並要求的限內，才讓科學家發言的。

資產階級掌握了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組織，進而就暢所欲爲的實行其世界政策。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華爾街雜誌「商業週刊」上，曾露骨地說出美國的世界政策，在一篇題爲「新外交與新商業」的文章內寫着：「美國在海外阻止共產主義事業，等於爲基地、救濟及復興落後地區，也就是要獲得商業市場」。美國的外交政策的精神，都包括在這幾句話中。爲了商業市場，爲了基地，通過救濟和復興貸款，在反共的名義下，來實行擴充和支配。「馬歇爾計劃」，「杜魯門開發落後地區計劃」（卽所謂「第四點計劃」），無非是在歐、亞兩洲求得商業市場。以南朝鮮說，美國資本家控制了大韓煤礦、動力、煤油諸公司；以台灣說，最大的糖業公司中，美國資本就達60%，雷諾公司控制了鋁業，愼昌洋行全部經營肥料，它如化學、動力、電力都掌握在美國人手中。

爲了商業市場，爲了少數獨佔資本家的利益，而向外擴張，而拖着全國人民去作炮灰，無非是因爲這少數人控制了整個國家的一切。但，這樣是不是解決了問題呢？美國戰前經常失業者的數字，是一七〇〇萬人。在第二次大戰過程中，因爲軍需工業的緊迫需要以及兵員的大量徵調，失業問題是暫時解決了一些。但資本主義性的無政府生產的擴張，一到戰事結束，軍需品需要減退，復員的勞動人數增加，同時獨佔資本家的無底貪慾，又不容許勞動人民得到合理的報酬，於是，就在戰時生產開始轉向和平生產的時候，失業的人口就按照

那種轉移或復員的程度，而迅速增加起來。美國爲資本家所控制的政府，儘管用各種偷天換日的方式，把失業人口數字掩飾起來，但總計全失業和部分失業的人口數字，經常都搖擺在一千萬人左右。失業、罷工、搶殺、犯罪……構成了美國動盪的社會面；被壓迫榨取的人民不能照樣生活下去，壓迫榨取的統治者也不能安然統治下去，於是唯一的出路，即是製造戰爭空氣，製造繼續擴充軍備的有利條件和口實，以便由此重溫他們在第一次大戰中和第二次大戰中大發其財的好夢。但美帝國主義者要記着：日本帝國主義原來也是由幾次戰爭暴發起來的，可是歷史的條件在不斷變換，特別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世界早已改觀了，日本法西斯勢力倒下去了，美國法西斯勢力，定然要受到更慘的失敗。

要之，美國的擴張主義、侵略主義、好戰主義、是由它的社會經濟制度在本質上決定了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這一名言，是包含有我們所說的這一切的深刻意義的。

三　幾個基本認識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認識到：

（一）對戰爭的要求和對和平的要求，都是一種社會現象，都可從社會經濟制度中找到它的根源。如果一個社會的一部分人能從戰爭中獲致暴利，戰爭又能爲其解決種種困難，它就必然有戰爭的要求，必然有好戰的傾向。但單是這樣還不行，他們一部分人好戰，一部分人能從戰爭獲利，如其不是社會制度允許他們這少數人獨占一切，控制一切，從而動員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力量，奴役剝削勞動人民，並驅使他們上戰場去從事戰爭，那也無法形成他們那種好戰傾向。反之，在另一個社會裡，那裡沒有誰愁衣食，那裏全社會中人的政治權力是平等的，那裏經常在擴大物質和精神生活，一有戰爭，任誰都得不到好處，都只會妨礙個人乃至社會的發展，如果不是爲了抵抗侵略，保衞他們的和平建設秩序，他們是決計不會戰爭的，自然也就沒有好戰心理傾向，而相反的產生了和平傾向。

（二）一個在國內沒有剝削關係存在的社會，對外便不會要求侵略和剝削。因爲它沒有了階級歧視，也沒有了民族歧視，從蘇聯國內一百六十多個大小民族的和睦相處，以及與蘇爲友像東南歐諸國經濟的迅速發展這二例子看來，就充分證明了這一結論。相反地，像在美國，它國內的剝削榨取階級處在統治地位，它就把國內的種族歧視觀念，發展到最高峯，黑人是不被看作人的。可是事實上，並不因爲它歧視異族，就把同族的勞動人民看得尊貴些。恰好相反，正因爲階級社會把同族的被壓迫同胞，作着無憐惜的榨取，它才對異民族顯出無比的輕視。種族的壓迫是階級壓迫的副產物。獨占資本家階級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對落後民族侵略戰爭，原本就包含有藉此縮減過剩或失業勞動人口的陰謀或企圖在內呢！

（三）蘇美兩國對於戰爭的態度，既然本質上是由其社會經濟制度所決定，那麼，資本主義制度未消滅，帝國主義勢力未剷除，戰爭的根源是依舊存在着的。而且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的發展，也會意味着資本主義力量的相對的減弱，單就這點講，反動統治階級對於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和平建設，也就會發生無比的妒忌與恐懼的情態，而這也成了他們瘋狂備戰的一個原因。

（四）在和平陣營與好戰集團對壘的情形下，以蘇聯爲首的和平勢力，即使再委曲求全，再努力避免戰爭，那並不能因此就阻止戰爭的實現，無條件地要求和平，反而會變成好戰集團加速發動戰爭的誘因。所以，和平政策，應該是保衞和平的政策。如像在各國武裝干涉新生的蘇聯的一九一九年及以後幾年中，如果當時蘇聯不抵抗，予侵略者以打擊，便不能保障此後和平建設秩序。今天我們中國東北正在建設中，關內各地也正展開恢復和建設的程序，如果我們不同時提高警惕，準備予侵略者以打擊，我們的敵人就會認爲有機可乘而孩瞞思逞的。

（五）但保衞和平，與單純的以武力對抗武力是不同的。我們如果那樣作去，同敵人作着軍備競賽，那就會給予它以實現戰爭的口實和機會。我們必須向世界——向敵人國內展開和平運動，一方面表示我們是眞正要和平的，目前在全世界展開的和平簽名運動，對於好戰的法西斯主義是一個巨大的打擊。美國英國動員了警察四出干涉簽名或集會，因爲他們好戰者，在這種廣泛而熱烈的簽名運動中，看到了廣大人民所表現的反戰意志，這妨阻了戰販們發動戰爭和動員的工作。這使他們懼怕人民力量的壯大，懼怕聽到要求和平的呼聲。

（註）這是我在中蘇友協廣州支會的演講，由陳可頌同志記錄，經過修改和補充，交新建設月刊發表。

歷史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的講話——

徐特立

史學工作者和其他社會科學工作者是有着密切的關係，因爲歷史學是帶全面性的東西，它不能和其他社會科學分離而孤立。譬如：我們編歷史教科書的時候，就必須找精通世界史的朋友幫忙，同時也必須瞭解馬列主義的歷史觀，纔不至於在某些歷史問題上發生觀點的錯誤。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在社會科學中是不能孤立的。我們研究了唯物史觀以後，知道了社會的下層基礎是經濟。經濟基礎不了解，歷史便無法寫。同時，我們研究歷史的時候，對於上層建築如政治、法律、宗教、倫理、道德等等，也都要加以研究和了解。所以，眞正要研究歷史，是需要很多朋友的，沒有從事其他社會科學工作的朋友的合作，歷史的研究工作是不大容易成功的。

我們對舊的學者、舊的學術不一概抹煞，但要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的先生就是資產階級的學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尊重資產階級的學者，如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等。他們深感自己的不足，在辦萊茵報時，感到自己對於經濟知識缺乏，到處尋求老師和朋友。雖然他們的先生不及他們進步，但唯其有落後的先生，才有前進的學生。列寧在青年團大會報告上說：馬克思吸收了人類過去的一切知識遺產，纔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體系。這話是非常正確的。我們知道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他的朋友恩格斯替他完成的，沒有恩格斯，「資本論」就只能出第一卷。第二卷及第三卷是經過恩格斯整理出版的。我們今天能够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是由於有了馬克思主義。最初馬克思主義的產生，不只有一個馬克思，還有恩格斯的帮助與配合，纔成功了完整的馬克思主義。就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來說，只有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馬克思還不够，還要有帝國主義時代的列寧、斯大林來發展他的理論，尤其是革命的策略方面，是蘇聯革命的產物。同時，沒有繼續向東方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不够，中國的毛澤東對於馬、恩、列、斯主義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毛主席常說：『我們要學習古今中外』，就是說要瞭解今天的中國，也要接受古人的遺產和外國的遺產。所以找多方面的朋友是必要的。

在找朋友的時候，意見相同的固然可以做朋友，意見相反的也沒有甚麼妨礙。而且從相反的方面看問題，更可避免片面性，所以古人有「相反相成」之說。一切事物都不能沒有矛盾，研究學術也一定要有矛盾。有矛盾才有發展，否則就是老一套，沒有進步，就不能成功。縱令有些成就，也不免片面性。凡對於一個問題希望有完善的解決，一定要有爭辯，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意見越多，爭辯越細密，就越能澈底地解決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一個問題的意見就不見得完全一致，馬克思曾看過一本地質學，馬克思認爲有相當的價值，恩格斯却認爲錯誤太多。馬、恩二人經常通信，就是靠了爭辯討論，求得一致，才解決問題。馬、恩兩人經常通信討論問題，在一個時期中，幾乎每天一封信。目前，我們同志間對於某些問題，常有不同的看法，而發生爭論。譬如：王學文同志根據馬克思的「資本論」說到生產的三要素是勞動力、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但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說：『勞動對象在人類發生以前就存在的，不應該包括在生產要素之內，所以斯大林說過只有勞動力和勞動工具兩要素。』由於馬克思主義不獨經濟學要活用，唯物史觀也是要活用的，是要看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來靈活運用的。舉例來說：我們現在是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在社會發展史上是一個特殊階段。而這個階段的劃分，是可用許多不同的方面來看的。首先單獨拿國家的性質來說，只要簡單的用一句話就够了，卽新民主主義國家就是『人民共和國』。中國過去以『士農工商』稱爲四民，而人民的國家就是四個階級的國家，如果把士爲四民之首，以士作領導改爲工作四民之首，卽以工人階級做領導者，就完全說明了新民主主義的性質。它不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因爲資產階級共和國只是一

個階級專政的國家；同時，也不是奴隸制度的國家，因爲奴隸制的共和國也是一個階級專政的國家。其次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上，也可以說明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性，『城鄉互助』表示了農業和工業的合作，表示了農業的獨立性，還不是工業支配農業。資本主義社會裡，資本支配着一切，農業就沒有獨立性。另外，『公私兼顧』和『勞資兩利』，在在都表現了我們現在社會的過渡性質。再說到階級關係，『三個敵人，四個朋友』，更說明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殊性質。可見我們的社會性質是可以用許多方式來表示的。

馬克思主義應該辯證地運用。發展矛盾是一個進步，但必須共同討論，解決矛盾，不然就成糾紛。我們編小學教科書碰到矛盾的問題的時候，要解決就是要找朋友共同解決，孤軍作戰是不成的。總之，我們不能孤立，只有『上帝』才是孤立的，因爲只有一個『上帝』。我們必須要廣交朋友，展開辯論，還必須吸收過去的文化遺產。不過，我們的吸收，不是妥協的，而是批判的。學生一定要超過先生，甚至要打倒先生；靑出於藍，也是先生的光榮。我們中華民族是有偉大的歷史基礎的，在一百年中，我們從封建社會一躍而爲新民主主義社會，跑到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前面。因此，我們不要氣餒，我們有遺產可以繼承。搞歷史的人，不和人合作是不成的。社會的上層建築如宗教和哲學都是要研究的。恩格斯就注意宗教史的研究，沒有因爲宗教是迷信就把它一脚踢開，而把宗教看做是一個歷史問題。我們搞歷史的人，也是需要找懂得宗教的人來談的。凡是曾經在歷史上起推動或阻礙作用的東西，都不可以自己的好惡而定去取。孤立的研究常不免有主觀的偏向，而且個人及少數人的知識總是有限的。李恕谷是清初的學者，他對於中國舊的六藝是全知全能的，他說：『學不如問。』因爲『問』是非常討巧的事，是求知識最捷的途徑：他研究了十年的學問，我們和他談一兩天或一兩句，就把人家的心得吸收過來了。看見有學問的人，除非他不和你合作，否則我們是不要錯過這機會的。我今天的講話是有企圖的，因爲我需要朋友幫助。我現在在搞世界史，因爲要編中國史，不能不了解當時的世界情況，尤其是商品和文化的交流問題。最近我在輔仁大學得到了一冊關於中西交通的史料，是爲着要解決關於中華民族來源的問題。近二、三十年來，有些學者只說中華民族是從西方來的。但是在這裡我發現了東方民族也曾西去，我發現了文化是交流的，不是有來無往的。例如：做生意的人，只販貨來，不買貨回去，是沒有的事，這樣的做生意是會賠本的。因此，只有西方文化的東來，沒有東方文化的西去是不可想像的。研究社會科學，世界史是不可少的東西。不搞世界史，就不能知道人類發展的一般規律，也就不能用普遍眞理來解決中國的特殊問題。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和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曾經用來解決希臘、羅馬史中不能了解的謎。中國關於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的傳說，和恩格斯、摩爾根的學說不謀而合，雖然大多數考證僞書的學者都認爲是僞造的。中國許許多多胡說八道的東西，其中有好些是這樣的：拿來和地下發掘與摩爾根的調查一對照，恰恰相合。因此，我們就可以說，這種胡說八道的東西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而是有其來源的。所以，編中國史、編小學歷史教科書，是少不得世界史的。我們在編小學歷史教科書的時候，曾經頌揚封建社會初期的土地私有制，因爲它使生產力提高了。我們又曾頌揚過西周的井田制，又頌揚過春秋戰國時代消滅封建的貴族制，又根據史記貨殖傳稱贊周代經濟生活，統治者不加予奪，使『巧者有餘，拙者不足』的事實，也就是優勝劣敗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有人對這些頌揚提出反對，認爲須要修改，因而這個稿子已經擱了一年多，沒有找得集體討論的機會。我曉得我們這裡有這個新史學會，因此我想把這些問題拿到這裡來解決。沒有組織，工作是搞不好的。我們的偏向在於孤立，我們要解決問題，必須要有組織，有專人負責來共同研究。學者、專家常有見樹不見林的偏向。這種見樹不見林的專家，用來解決專題是需要的，我們必須尊敬他們。他們植樹，我們培林。森林若離去樹木，也就不成其爲森林。見樹又見林，就是一個合作問題。

研究歷史要有一般的知識。馬克思吸收了人類一切的知識遺產，毛主席學習古今中外。由此可知，交朋友是可以產生偉大的力量的。朋友之間是不可能沒有矛盾的。矛盾是人類必然的現象。有矛盾就要鬥爭。但我們的一切鬥爭爲的是團結，並且要『鬥而不破』。沒有批評是不對的，單只有批評，也是不對的。試拿軍事來說，戰與和是對立的，但和是戰的一部分，戰而能和，才能得到戰爭的果實。這就是矛盾的統一。討論問題有小型座談會和在報紙上發表的兩種方式。我覺得報紙上的批評就沒有小型座談會好。因爲有些問題在報紙上討論，結果議論紛紛，得不到集體作結論，並沒有得到解決。最後，雙方罷戰，思想上的矛盾，依然存在。這樣，必發生不好的影響。同時，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顧慮多，於是就不能不有長篇闊論，作四面包圍，費時間很多，在座談會上，片面點滴的意見也可以談，許多人彼此商討，有了結論再發表，這樣，問題很快地就得到解決了。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翦伯贊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這個問題很大，但扼要地說來，就是立場觀點和思想方法的問題。

首先說到立場問題，因為這是歷史研究的出發點。

所謂立場，就是一個歷史家站在甚麼階級立場來處理歷史的問題。一般說來，階級社會中的歷史家，總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把歷史學當作辯護階級剝削的工具。必要時甚至歪曲歷史，以引出其所需要的結論。雖然也有些具有正義感的歷史家，他們對剝削階級採取批判的態度，但歸根到底，他們的批判，還是要受到階級性的限制。這就說明了超階級的歷史家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也說明了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是不能也不願揭示歷史真理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給與歷史以科學的說明，才能使歷史學與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才能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

我們可以充分地指出，中國過去的歷史家，最大多數都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替封建主義服務的。貫徹着中國歷史學中的正統主義，就是辯護地主階級的階級支配的一種歷史理論。所謂正統主義就是以帝王為中心的歷史主義。照正統主義者看來，所謂歷史，就是一個皇帝加一個皇帝，一個王朝加一個王朝，如果某一王朝被農民顛覆便是歷史中斷，便需要有另外一個地主奮起草野，恢復地主階級的統治，存亡繼絕。總之，他們以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地主階級的統治，如果有人企圖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便被指為「盜」為「賊」為「匪」為「寇」為「叛逆」為「妖人」，便被當作地主階級的仇敵而遭受剿滅屠殺。因此他們把每一個爬上了寶座的地主，都頌揚為神聖；把每一個保衛封建制度的理論家都頌揚為人類的師表；把每一個辯護封建制度的武士，都頌揚為英雄豪傑。此外，他們又運用一種人道主義的言語，把封建社會粉飾為「王道盛世」。至於他們對於歷代以來被壓迫剝削和奴役的人民大衆，則視若無覩。如果說在古典的歷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人民大衆的紀錄，那除非這種人民可以用為宣傳封建道德的資料，例如烈女節婦之類，不然就是被當作「叛逆」的典型，用以警戒大衆。

現在，地主階級的統治，已經最後地從中國歷史上消滅，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就應該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批判以帝王為中心的正統主義，建立以勞動人民為中心的新的中國歷史。我們要從中國歷史上去發現勞動人民的歷史創造，他們的發明與發見，他們反封建制度的革命鬥爭，這就是說，我們要研究勞動人民生產的歷史和革命的歷史。但這不是說，我們就不研究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的歷史，相反地，我們應該精細地去研究他們的歷史，因為只有從統治階級的歷史中，才能發掘出勞動人民的歷史。不過在研究統治階級的歷史時，要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這就是說，我們要盡量地去揭發地主階級的罪惡，揭發封建社會的黑暗，並且要指出封建社會的暫時性及其滅亡的必然性。自然，我們也要指出封建社會在歷史發展的總行程中，還是有它的進步性，因為比之奴隸制度，封建制度是一種進步的制度。

封建時代的中國歷史家，不僅用正統主義辯護他們的階級統治；又用大漢族主義來辯護他們的種族支配。他們把漢族描寫為神明華胄，把其他種族描寫為犬羊之族，虫豸之裔，好像漢族是天生的文明種族，其他種族是天生的落後種族，從這裡替漢族的地主階級找到了征服其他種族的歷史根據。

從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歷史家就產生了「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狹隘的種族主義的思想，他們就強調「華夷之別」，就宣傳一種憎惡鄰人的理論，他們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左閔元年）「戎，禽獸也。」（左襄四年）「翟，封豕豺狼也。」（國語周語中）「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國語周語中）像這樣的仇視鄰人的說教，充滿了中國的史乘，其目的就是為了挑撥種族之間的仇恨，以便利地主階級發動侵略戰爭。

在漢族的歷史家看來，中國的本部是漢族的禁臠，中國境內的其他種族，皆不得入居中原。因此，只要蒙古人跑進長城，就是「入寇」；氐羌跑到陝甘，就是「內犯」；西南少數民族從深山窮谷跑到平地，就是「作亂」。反之，當漢族的地主階級南征北伐，去征服他的鄰人，去從他的鄰人進行武裝的收奪的時候，地主階級的歷史家卻說這是宣揚王化。為了鼓舞這種宣揚王化的事業，漢族的歷史家往往用最動人的言語歌頌那些遠征異域的冒險家，歌頌那些為

了少數地主發財，而使千百萬勞動人民成爲泥沙的侵略戰爭，歌頌那種對少數民族之野蠻的刀劍統治。

現在歧視少數民族的時代已經成了過去，我們應該批判那種站在狹隘的種族主義立場所寫的大漢族主義的歷史，建立包括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眞正的中國歷史。

爲了建立這樣的歷史，在積極方面，我們應該把中國歷史的研究，聯繫到各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因爲實際上中國的歷史，不只是大漢族的歷史，大漢族的歷史不論在中國史上佔有怎樣重要的地位，也只能是中國歷史的一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眞正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境內各種族歷史的總和，如果不研究各民族的歷史，中國史就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在消極方面，我們應該根據具體的歷史事實，對中國史上的民族問題，予以合理的說明。我們不應該把漢族在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對外戰爭，都加以歌頌，因爲漢族的對外戰爭，有些確是侵略。例如漢代之遠征西域和西南夷，隋代之遠征高麗，唐代之遠征中亞，都是侵略戰爭。但這不是說漢族的任何一次對外戰爭都是侵略，例如宋代之於遼金元，明代之於滿清，却是自衛戰爭。同樣，我們也不應該對於其他種族的任何一次變亂，都說成侵略，因爲其他種族的變亂，有些是反對漢人的奴役，例如東漢羌人的變亂，西晉末匈奴人的起義，清代的回變，以及歷代以來西南少數民族的動亂，都是爲了反抗漢人的奴役。但這不是說所有其他種族的侵入都是正義的，例如遼金元之於宋，滿清之於明，都是侵略。總之，我們應該根據具體的史實，判別出誰是侵略，誰是自衛。而且卽便是侵略戰爭，也不應視爲各族人民間的敵對行爲，應該指出這些侵略戰爭的發動者、組織者、指揮者，是各族的統治階級；至於各族人民之間，原無不解的寃仇。最後，我們也應指出，由於中國境內各種族在侵略與被侵略、征服與被征服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今日的偉大的中華民族。

其次，說到觀點問題。

所謂觀點問題，就是對歷史的看法或認識問題。一個歷史家對歷史的看法或認識，也不是偶然的，他爲甚麼要這樣看而不那樣看，要這樣認識而不那樣認識，這是被決定於歷史學家所屬的階級，因爲一個歷史家對歷史的看法和認識，就是反映這個歷史家對現實世界的需要和願望。換言之，就是歷史學家的階級意識在歷史學上的表現。

在階級社會中，由於歷史家的階級屬性之不同，在歷史學上也就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歷史觀。但儘管有各種不同的歷史觀，歸根到底總是貫澈着唯物論與唯心論兩種敵對觀點的鬥爭。

這幾乎是一個決定的事實，只要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的歷史家，沒有一個不反對唯物論的，他們一聽到唯物論這個名詞，就以爲是大逆不道；反之，對於唯心論，則認爲是一種盡善至美的東西。這樣的情形，是不足奇怪的，因爲當剝削階級爲了要保持和鞏固自己的統治的時候，他們的階級利益，就會限制他們對歷史的正確認識，就會要求他們蒙蔽歷史的眞理，因爲揭發了眞理，對於他們的階級支配是一種危害。而唯物論者就正是要眞實的認識歷史，要澈底地揭發歷史的眞理。

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古代的歷史家，幾乎都是唯心論者，他們寫的歷史的動機，就是爲了發揮主觀的觀念，一部春秋，就是用微言發揮大義，有時爲了發揮他們擁護等級服從的思想，甚至歪曲或湮滅歷史事實，例如春秋上把晉文公召見周天子的史實，寫成「天子狩於河陽」；又如春秋二百四十年間，魯君之見弒者四（隱、閔、子般、子惡），見戕於外者一（桓），而春秋不見其文，爲的是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卽「魯之君臣未嘗相弒」。（禮記明堂位）。像這樣的情形，簡直是把歷史當作歷史家主觀觀念的註脚。不僅春秋的作者如此，其他古代的歷史家之寫著歷史，大半也是爲了發揮自已的主觀觀念，寫成他們的「一家之言」。

因此，中國的古典歷史著作，幾乎都貫串着唯心論的觀點。在這些歷史著作中，對於任何歷史事變，都不聯繫到當時的社會經濟去給以說明，總是把這些歷史事變歸結於「卓越人物」的願望。一部二十四史，其中觸目驚心的巨像，就是皇帝聖人和英雄。在古代歷史家看來，一部中國史，好像沒有甚麼現實的東西，如果也有歷史的現實，那就是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程、朱、陸、王等相傳的道統，和秦皇漢武以次的聖君賢相的企圖，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卓越人物」的觀念。

這種觀念的系統，近代的唯心論者稱之曰「知識綫」。他們以爲歷史上存在和發展的，就是這條「知識綫」。至於其他具體的歷史事實，如經濟生活，政治體制，都不過是觀念的體現。因此唯心論的歷史家，一致强調歷史上的「卓越人物」，好像任何歷史事件，都是按照「卓越人物」的願望而實現出來的。例如西漢之遠征西域，就是因爲漢武帝好大喜功；鄭和之七下西洋，就是因爲明成祖要追捕建文帝；王莽改制，就是因爲他想移漢祚；王安石變法，就

是因爲他急功好利；總之，他們以爲不管在甚麼條件之下，「卓越人物」要想創造怎樣的歷史，就可創造怎樣的歷史；換言之，「卓越人物」的觀念，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

唯心論者不僅把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爲「卓越人物」的願望，又把「卓越人物」的願望歸結爲神的啓示。貫徹着中國歷史學中的天命論，便是唯心論之最高的發展。照天命論者說來，「卓越人物」的任何想法，都是神的授意。神怎樣授意於「卓越人物」呢？那就是通過讖緯、符瑞等等的暗示。司馬遷說，他之寫史記，一方面是爲了通古今之變，另一方面是爲了究天人之際。這樣說來，人類歷史之最終極的動力，不存在於人類社會，而是要從神的啓示中去尋找了。

這樣的看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應用唯物論的觀點來研究中國歷史，我們首先就應該從中國史上撕去神秘主義的外衣，揭穿唯心論者的階級本質，正確地指出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不是「卓越人物」的願望，更不是神的啓示，而是社會經濟。社會經濟的結構，是歷史的眞實基礎，在歷史上各時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歸根到底都應該由社會經濟來說明，因爲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都是社會經濟的派生物，只要社會經濟一有變動，他們或遲或早都要跟着變動。社會經濟決定歷史的發展，也決定它的轉變。因此，我們研究歷史，就應該把歷史的動力歸結於物質生活之生產，歸結於生產這些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即歸結於社會經濟。

歷史的發展，歸根到底雖然是社會經濟演着決定的作用，但這不是說觀念就毫無作用。唯物論者從來不忽視觀念形態對歷史所起的反作用，而且以爲只有把握社會經濟基礎與觀念形態之間的關聯與統一，才能理解歷史上的社會之有機的構成。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也要根據物質的實踐去說明觀念形態，並且從觀念形態中去尋找社會經濟的反射。

其次，中國歷史學上也貫徹着進化論的觀點。所謂進化論，就是以爲歷史的發展，只是和平的漸次的進化，即只有量的積累，沒有質的突變。在進化論者看來，中國的歷史就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這樣一代一代的因襲下去，古往今來，只有王朝的更替，社會的本質並沒有什麼根本的變革。因此過去的歷史家，他們都是斷代爲史，從來不提到歷史階段問題。

具體的中國歷史已經證明了進化論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爲中國的歷史也通過了一系列的歷史階段，由原始共產社會而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現在又進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些相續繼起的社會，都是在本質上不同的社會，而且從一個社會到另一個社會，都不是和平的進化，而是一個歷史的突變，歷史的飛躍。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就要根據具體的歷史資料，劃分歷史階段，就要說明每一個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構造，和他的政治制度乃至意識形態就要說明從一個歷史階段發展到另一歷史階段的變革過程。

此外，在中國歷史學中，也貫徹着一種循環論的觀點。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司馬遷說：「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這些說法，幾乎成了過去中國歷史家共同的觀點。自從鄒衍五行始終之說應用於中國歷史學上以後，歷史循環論更加定型化了。所謂五德，即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別稱；所謂五德始終，就是五行輪迴。照過去的歷史家說，每一個王朝皆以五行之一爲德而王，中國的歷史就是按照五行相生的秩序終而復始地打圈子，打了一個圈子，再打第二個圈，這樣一直循環下去。換言之，中國的歷史是不斷地回到他的出發點。

我們必須指出，歷史的發展，決不是採取循環的道路，他是一個往前發展的過程，這個往前發展的過程，不是一個圓圈，而是一個永遠不回到出發點的螺旋紋。雖然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也有些局部的暫時的倒退現象，但整個的中國歷史則是前進的。雖然在中國史上也有些類似重複的現象，但這些類似重複的現象，是在不同的歷史基礎之上出現的。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就不應該誇大某些暫時性的倒退現象，或者類似重複的現象，而是應該從千頭萬緒的複雜史實中，去揭示那條通過曲折歪斜的道路但始終是向前發展的道路。

最後說到方法問題。

這裡所謂方法，是指辯證唯物論而言。不過在這裡我要說到的，不是這個方法論的本體，而是怎樣應用這個方法來研究具體的中國歷史。

用辯證唯物論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和用其他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不同之點，就是他的目的，不僅是說明歷史，而且是改變歷史。

由於基本的出發點不同，由此展開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同。首先就表現在他不把歷史的研究，停止在史料的搜集分類，而是要分析史料，從史料的分析中總結出歷史的原理原則，用這種原理原則再投入現實的歷史，作爲無產階級戰鬥的精神武器。

過去中國的歷史家，以爲一個歷史家的任務，就在於把史料堆積起來，而且以爲如果對史料進行分析，好像就是歷史學上的異端。辯證唯物論者也知道

搜集史料的工作，是研究歷史的基本工作，但不論如何，搜集史料只是替歷史研究準備材料，並不是歷史學的終極目的。因為歷史學的任務，總不能就是編成一些史料彙抄，他應該是一種分析史料的科學。如果只是搜集一大塊史料，而沒有能力進行分析，那麼，這樣的史料，除了表示歷史家的辛苦，任何用處也沒有。用列寧的話說：「只能等於玩具，或者比玩具更不如的東西。」

因此，用辯證唯物論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就應該學會分析史料，把史料變成歷史。

和其他的方法不同，辯證唯物論者不把他的歷史研究停止在個別問題的吹噓上，而是要把個別問題當作歷史總體中的一個細胞或環節來研究，看出個別問題在歷史總體中所佔的比重，所起的作用，所能體現的歷史內容或傾向。

過去中國的歷史家，他們放着許多震撼中國歷史的大事變不聞不問，專門從中國歷史上選出一些最偏僻、最微細，亦即最不關重要，最不能特徵歷史傾向的一些問題，把他們孤立起來，大吹大擂，好像一個歷史家的任務，就在於吹噓和玩弄這些個別問題，就在於迴避歷史的重要關鍵拒絕對歷史的全面研究。

辯證唯物論者並不反對把個別問題，從歷史的大聯系中抽出來，作精細而深入的研究；反之，他提倡這樣的研究，因為研究愈精細，則由此而作出來的總結，也就愈益正確。但是他以為這種被選出的個別問題，必須是一種足以體現歷史發展的傾向，最少也是足以說明歷史的某一側面的那種問題。而且他以為即使是研究個別問題，也不要割斷這個問題與歷史總體的聯系。因為任何個別的歷史問題，如果從歷史的大聯系中孤立出來，就無法說明。

因此，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歷史，就應該學會怎樣把個別問題的研究，聯系到中國歷史全面的發展。

和其他的方法不同，辯證唯物論者不把他的歷史研究停止在歷史的表面，如政治現象和意識形態；而是要從歷史的表面現象的背後，去發掘構成這些表面現象的基本東西——經濟結構，再用這種基本的東西去說明表面的現象。

過去的中國歷史家，以為歷史家的任務，就在於毫無遺漏地記述這些歷史上的表面現象，如內亂、外患、黨爭、哲學、文學、藝術等等。至於這些表面現象怎樣發生、發展，那好像就不是歷史學應該回答的問題。換言之，他們以為歷史學的任務，只是報告歷史怎樣演變，並不說明歷史為甚麼要這樣演變。

辯證唯物論者以為歷史學的主要任務，不僅是要報告「怎麼樣」，而且要說明「為什麼」。因此辯證唯物論者反對毫無原則地鋪陳現象、誇張現象，他主張給與這些現象以應有的說明，即把目光透過現象去尋找他的經濟根源。例如我們研究某一時代的歷史，首先應該考察的，是這一時代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因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表徵社會性質的重要標誌。只有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然後才能對於某一時代的政治現象、文化思想，以及一切複雜紛亂的歷史現象，給與正確的說明。

因此，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歷史，便要學會從歷史現象背後尋找本質的方法。

和其他的方法不同，辯證唯物論者不隱蔽歷史上的階級鬥爭，並且要公然地堅決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去揭發歷史上的階級鬥爭，以及因階級鬥爭而引起的社會變革。

過去的中國歷史家，根本不承認中國歷史上有階級鬥爭，甚至不承認有階級；在他們看來，中國史上的一切變亂，都是由於個人的仇恨，不是由於階級的對抗。但是具體的史實却證明了中國史上也有奴隸與奴隸主、農民與封建地主的鬥爭，一直到現在，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還在進行消滅官僚資產階級與殘餘地主階級的鬥爭。

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就必須把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及其行動歸納到他所屬的階級予以說明，因為在階級社會中，任何個人都要隸屬於一定的階級，因而任何個人的行動，也必然是階級行動的一部分。

在封建社會內，最主要的是兩個敵對階級的鬥爭，即地主與農民的鬥爭。但除此之外，在統治階級的內部也有矛盾，例如東晉時代，同一地主階級中，就有北方流亡地主與南方土著地主之間的矛盾；同一北方流亡地主之中，又有中央派與地方派之間的矛盾。因此，當我們分析階級關係時，就必須注意去發掘各種各樣的矛盾。

同時，階級矛盾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斷的變化中發展着的。例如西晉的歷史，就充分地表現了階級矛盾的轉化過程：最初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八王之亂），以後引發了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流人暴動），最後轉化為種族間的矛盾（永嘉之亂）。因此，當我們分析階級關係時，就必須注意矛盾的發展和轉化。

總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歷史，就要學會從階級矛盾中去尋找歷史的變革。

關於整理近代史料的幾個問題

金毓黻

一

如何研究中國近代史？是當前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是我們教育工作者和研究歷史的同志們都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根據新的觀點要把中國近代史分作前後兩段，前一段爲舊民主主義革命史，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說起，至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時候爲止，這一段包括八十年的長期。後一段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說起，直到一九五〇年的現在，經過了三十年，不過只是一個開端，可以說這段歷史來日方長。

我不配說研究近代史，是因爲新的條件不够，新的觀點不够，只能在許多史學專家一致努力研究的氣氛之下，作一點整理史料的工作。希望在這一點上爲大家効點勞，也可以說是爲人民服務，至於對現社會能够起點什麼作用，這是我不能逆料的。

我是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做一點整理史料工作，所整理的是介乎舊新民主主義革命之間的一段，是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開始，往下拖長一點就要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那一天，劃作一個段落。但是先把整理的重點放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幾個標題之上，而做點有計劃有步驟地整理，當然担任整理的工作同志不止是我一個人。

我們整理史料是把革命史料和反革命史料加以分別的，就是把整理的重點放在革命史料的部分上，也就是放在從事生產的工農勞動人民的身上。我們要把這樣的人民大衆看做是歷史的主人，把這些人向環境作鬥爭在現代社會向前發展的歷史，作了極忠實極正確地記載，整理這樣的人民史料，才叫做革命史料。但是從事生產的勞動人民向他們的環境所作的鬥爭，定然不是作他們內部的鬥爭，而是另有鬥爭的對象，這樣的對象就是統治階級的地主官僚軍閥大資本家等等。這樣的統治階級所表現的行爲都是不利於勞動人民的，他們要白手奪取勞動人民生產的果實，供作他們的享用，這樣的行爲就是反革命的行爲。我們把這樣的行爲也作了極忠實、極正確的記載，整理這樣的史料，可以叫做反革命史料。當然以革命爲主要的史料，同時也要和反革命史料加以嚴密的配合，如此分外顯得人民革命史料的重要性，更不至於把革命史料陷於單調。

因此之故，我們首先要認清辛亥革命時代以孫中山先生爲首的同盟會，是站在革命立場上的，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推倒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雖然有了不少的弱點，究竟是屬於革命行爲。至於以袁世凱爲首的北洋軍閥，以及割據西南各軍閥，是站在反革命立場上的，是孫中山先生的最大敵人。孫中山先生就要和這些人作了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就是我們要整理的前一段近代史料。

因而，我們更要認清五四運動以後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有了領導者，已經有了革命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孫中山先生未死之前，他已得到中國共產黨的帮助，仍然是站在革命隊伍之內，而且使革命事業向前推進一步，一直到他死亡爲止。但是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尤其是其中一部分的右派黨員，就和中山先生有了分歧，而走上反革命之路了。等到中山先生死去以後，漸漸地國民黨就不肯與中共合作，中共也就無法再帮助國民黨，因此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就走向反革命的路上去了，結果，演出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的一段歷史。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這些反動派作了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就是我們要整理的後一段近代史料。

由此可見，一談到革命史料就與反革命史料有了關聯，二者是密結在一起，而無法分開的，我們就依據這樣的原則來整理這幾段的史料。

二

現在我要談談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但是先要說明整理史料是不是就等於研究歷史。

我常常懷疑到我們的整理史料是不是只作史料的堆積？是不是隨便雜湊材料使人無法捉摸？如果僅僅作這樣的整理工作，就算不得研究歷史。

我向來是喜歡搜集史料，尤其喜歡作「長編」和「輯佚」的工作，這一類的工作，算不算是研究呢？

經過我們一再的考慮，一再的檢討的結果，以爲如果是把搜集到的史料，經過有計劃有系統的整理，再照這樣整理的結果編成各種各樣的史料長編。這樣的整理，可以說是研究歷史的初步工作，也是屬於研究歷史工作的一部份。

研究工作的範圍是有大小之分的。若就比較嚴格的小範圍來說，研究歷史應該着重寫作極細緻的專題，在專題中要充分利用史料作極細緻的研究。其次要寫一部有組織的專史，例如范文瀾先生所寫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册，範圍是放大一些了，但也是利用極豐富的史料寫出的一部綜合性專史，這樣的著作當然也是屬於嚴格的研究範圍。

但是再把研究的尺度放大一些，也可以把整理史料的一類工作加入進去。我何以要作如此主張？因爲我們把若干雜亂無章的史料經過一番整理之後，自然就有了頭腦可尋，這正是研究歷史的初步工作。不過這樣的研究，是屬於廣義的研究而已。

我們所寫的國史長編是這樣寫出來的。

1.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寫起，經過四十年的長期，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日，暫劃分這一階段作寫國史長編的範圍。

2.我是用逐日記載的方法，即是選擇重要史料而正確地記載下來，作爲寫國史的綱領，也可以說是用已往史學家的編年法。

3.這樣的國史長編暫以三個月爲一卷，一年共有四卷，如果按四十年計算，就共有一百六十卷，我們就用這樣的方法而日積月累起來。

但是我們所要寫的長編，也不限定是編年體一種。其他各種各樣的長編列舉如下：

1.專題記載的長編，爲作專題研究的準備。

2.分類記載的長編，爲作近代經濟史、文化史以及其他專史的準備。

3.傳記長編，爲作某一人物傳記的準備。

4.圖表長編，爲作各種地圖史表的準備。

我們對於傳記長編圖表長編專題長編已經有了一些準備工作，但對於分類記載的長編尙且未能着手，是因爲工作人員太少的原故。

我們所作的長編工作，是近似堆積史料的工作，也很容易使它雜亂無章，如果是這樣的長編，就談不到整理，所下的工夫就算白費。

我還記得一九一三——一六年間，在北大讀書的時候，聽過陳漢章先生的幾種課程。陳先生記性太好，他的頭腦簡直是一座圖書館，例如他做的中國通史講義，可以說是繁徵博引，下筆不能自休。

有一次聽講的同學們向他提出意見說：先生所編的講義，鈔的書太多了，是不是就算著作呢？先生回答說：「鈔書也不是容易的事，會鈔書的人也就能夠成就一部很好的著作。」陳先生是一位博學多聞的人物，當時北大教授如劉師培、黃侃諸先生都很佩服他，所以他說的話，也值得我們注意。

我還記得梁啓超先生有過「善鈔書可以成創作」一句名言，他是指着宋朝人袁樞所作的「通鑑紀事本末」說的。袁樞是以一件事爲一標題的方法分立了若干標題，依照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原文，一一地分別鈔寫出來，編成了一部大書，這樣的體例叫做紀事本末。他是在唐代史學家劉子玄所稱道的紀傳、編年二體之外，別開生面地完成了紀事本末體的創作。

我舉這樣的幾個例子，就是說，我們所編纂的國史長編雖然是鈔書，雖然是綜集史料，但是要做到有計劃有系統的鈔書和綜集史料，換句話說，不是積聚一大堆雜亂的史料，使人摸不着頭腦，而是經過精細地選擇整理，才把它一一記錄下來。古人所說的「修史要無一字無來歷」一句名言，也是我們所要遵守的條件。

這樣寫長編的方法，應該是研究歷史的初步，是寫專題研究和寫專史的準備工作，而且作這樣的整理是非常有用，不是白費工夫。

三

我再談談整理傳記資料的問題。

我在三、四年前曾經立志要編一部「民國碑傳集」，經過一年多的時間也有許多朋友幫忙搜集到四、五百篇，敍文凡例也都作了，希望有人介紹到商務印書館一類的大書店出版，如此我用的心力就不算白費。

但是經過一些先生們的考慮，以爲這裡有許多篇不合乎民國的立場，實在就是不合乎國民黨的立場，因此就把這件事停頓下來。

一直到現在，我是不是把這件事置在腦後呢？結果並不是如此，而且是作繼續不斷地搜羅。結算到現在，已經有了將近千篇傳記資料。

近幾個月偶然遇見了一位青年朋友卞君孝萱，他先給我來信說，他要編纂「廣碑傳集」，他希望我幫他的忙，要求把我搜集的碑傳，借他鈔寫，他也有一大部分碑傳資料爲我所未搜到的，允許借我鈔寫。見了這樣的青年朋友之後，又鼓勵我一點勇氣，使我重新振作起來。

翦伯贊先生也知道我整理過這一類的稿子，一再說要幫我的忙。最近幾天，我會見了他，他介紹我一位上海書店經理。他說：「你編的傳記資料可以出版了，好在是史料，是很有用的，研究歷史的人很要利用它，你可以不必懷疑，可以趕緊整理出來，好送書店出版」。這位書店經理也滿口答應，說：「我準替你出版」。這樣的事實也給我一個很大地鼓勵。

卞君所要編的廣碑傳集，是要繼續「正續兩碑傳集」及「碑傳集補」的體例，而把關於清朝末年的人物爲三書所未收到的一一地收編在內，這樣的編法就和我有點區別。

我起初的編法是和卞君一樣的，不過只就專收民國時代人物的一點，和他有點不同。到了現在就有了很大的改變。

古人曾經說過，碑傳一類的文字，多半是「諛墓之文」，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就是地主官僚軍閥和大資本家，拿出很多的金錢向當時文人名士買出來的。這一類的碑傳的價值，也就有了問題，我就要替他重新估價，而不是毫無選擇的採用。

現在我所搜集的只可說是傳記資料，而不必說是碑傳。一經說是傳記資料，凡是以往的正續碑傳集，碑傳集補都是供人採用的資料，就不能作全般的否定，說它是毫無用處。但是我現在搜集傳集資料的重點是放在革命抗敵的志士烈士、進步人士、國學專家、科學家、藝術家等等人物的身上，必須經過嚴密的整理，必須合乎上列條件的，才能入選。換句話說，不是無所選擇把它一古腦拿出來付印。

現在我們要編纂的傳記，就不叫「民國碑傳集」了，而是改稱爲「近代人物傳記資料」。所編纂的體例不專限於文言的碑傳，凡屬於傳記性質的白話作品，也要同樣的選錄，只重內容，不問形式，只可當作傳記長編看，供給作新傳記的人們參考和採用，而不可看作是一種碑傳總集。凡是易於尋找有專書可查的，只列目錄，而不必鈔錄原文，如此可不致浪費筆墨。我想以這樣的辦法來編纂傳記資料。

有人問我，你這樣的搜集傳記資料，是不是要根據這些材料寫過去正史體例的國史列傳呢？我回答說：不是的。

我要寫的傳記是要比較詳密分章分節的長篇傳記，所要寫的人物不要太多。我現在正要寫「李大釗傳」，但是材料還不够，這樣長篇的傳記也不是一兩個人所能寫出來的，而是要爭取許多作家來寫，例如過去有幾位作家所寫的「魯迅傳」就是我們的好榜樣。

過去正史體裁的傳記，是不合時代的體裁，我們既然有了新的觀點，就不必要再走舊路，應該要另走新的道路，要用新的體裁來寫必須寫的傳記。

四

總括以上所說的話，作一些結束語，也是我要向閱讀同志提出討論的問題。

第一、整理史料算不算是研究？我以爲這是研究歷史的初步工作，而且非常重要，是否正確？

第二、我以爲先寫國史長編是整理史料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寫作歷史的第一階段，這樣的看法，是否正確？

第三、我所說的國史長編，不專指編年體的一類，所有紀事本末、專題研究，以及傳記圖表各體，都要包括在內，都要先作長編，這樣的整理方法，是否正確？

第四、我整理傳記，先從收編碑傳作起也包括其他屬於傳記一類的作品，有了這樣很豐富的作品，才可談寫傳記，也可以選擇一部分的傳記資料排印出版，供給寫作傳記的人們參考，這樣的主張是否正確？

以上是我要談的「關於整理近代史料的幾個問題。」

我很自信對於整理史料工作，是很有勇氣的一員，但同時也懷疑到我有了很重的舊包袱，有了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的作風，而未能够十分照顧客觀條件，因此就過分强調了自己近於空想的主張。我要克服這樣的舊作風，也要丟掉我的舊包袱，因此就要向閱讀同志請教，也就等於向人民大衆請教。

一九五〇、十月十二日稿

康德哲學批判

鄭　昕

編者按：關於接受舊哲學遺產的問題，是值得我們展開討論的。祇有通過廣泛的討論，我們才能予以批判地、正確地接受。所以，對於這類的重要學術問題，我們歡迎在本刊展開討論。

本文是根據去年十一月中在哲學座談會一篇報告寫成的。手邊剛好有一份當日開會的通知，上面說道：『我們這次座談會（第十七次）擬請某某先生講「康德哲學的批判」，對康德哲學作個全面的而有重點的討論，像第1批判（知識論）裡的「認識和對象的條件同一」問題，「物自體」問題；第二批判（倫理學）裡的「道德律」與「自由意志」（包括歷史觀）問題；第三批判裡(美學和目的論)裡的「無目的之目的性」與「自然的體系」問題等等，想藉此看出什麼是康德在思想方法上的貢獻，什麼是他的唯心論哲學體系的弱點。』通知上還印了兩個表，「是幫忙了解他的哲學體系的」，我們也抄印在這裡，以供參考。

表（一）

心之全體大用	認識能力	先天原則	應用的範圍
1 認識的能力（感性、悟性）	1 悟性	1 規律性	1 自然
2 苦樂的情緒（感情）	2（反映的）判斷力（靜觀的判斷力）	2 合目的性	2 藝術（生物界）
3 願望的能力（意志）	3 理性	3 最終目的	3 自由

表（二）

現象界（自然）

彼岸　此岸

物自體　認識的能力

材料　形式

———→　經驗的　先天的　←——主體

物理科學　先驗的，理性批判

內在的科學

本篇因為篇幅和時間關係，只談上面所提到的知識論裡兩個基本問題。現在距去年作報告時快一年了，在這一年當中，我體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也重新考慮過全部康德哲學問題，——特別是關於知識問題——想就去年的報告，作一些必要的說明與補充。

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的第四章第一節中引哲學史家庫諾斐休話說「純理性批判要去掉理性(卽先天性)便是懷疑論……純理性批判要去掉物自體便是巴克萊的唯心論」，這就是說：「純理性批判」要保留「理性」和「物自體」，這是康德唯心論的特點。列寧在同章同節中關於康德哲學作了以下的英明的論斷：(大意)康德哲學的基本特徵是唯物論與唯心論的調和、妥協，聯合各種不相同的，互相矛盾的哲學方向，成為一個哲學體系。當他假定我們的觀念符合我們以外的任何物自體時，他是一個唯物論者。當他說明此物自體是不可認識的，超越的，彼岸的——他表現為一個唯心論者。當他承認經驗、感覺是我們知識的唯一來源時，他的哲學走的是唯覺論的方向，當他超過感覺論時，在一定的條件下是走的唯物論的方向。當他承認空間、時間、因果觀念等等底先天性時，他的哲學轉向唯心論。他的不澈底，引起澈底的唯物論者和澈底的唯心論者一齊對他作無情的鬥爭。唯物論者反對他的唯心論，駁斥他哲學中的唯心論的成份，指出物自體底可認識性，物自體和現象間原則性的分別並不存在，個人的意識和人類集體意識的逐步發展，能使物自體轉變為現象，必然性，因果性等等，不能從先天的思想律裡引伸出來，只從客觀實在裡引伸出來。存疑論者與唯心論者反對康德物自體的假定，以為這不啻承認唯物論，「唯實論」和「樸素唯實論」，此外存疑論者除反對物自體外，還反對先天性，而唯心論者則不只要求先天的直觀形式，甚至於整個宇宙也完全由純思維引伸出來，他們將人類思維推廣，擴充為抽象的「我」或「絕對的理念」或普遍的「意志」……馬赫主義者批判康德，因為他太唯物，我們批判康德，因為他不够唯物。馬赫主義者從右邊批判他，我們從左邊批判他。(德文本一九二至四頁)

列寧這段話可算得近代哲學思想批判的綱領。康德是近代哲學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他的思想領域裡反映着整個的新興的、但尚軟弱的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僧侶主義鬥爭的過程，也體現着不澈底的唯物思想和唯心思想鬥爭的過程，他一方面意識出「理性」與「物自體」的矛盾，想從唯心論的角度去克服這個矛盾，其結果造成「我」的分裂與「

物」的分裂，在分裂後的「物」「我」關係中，勉強求得統一；另一方面，在解決認識問題的過程中，也表現了辯證的精神，既擺脫了理性主義派的形式邏輯的，形而上的思想方法的束縛，（未能澈底）也克服了巴克萊、休謨的狹義的經驗主義，替德國古典哲學奠定了鞏固的基礎，確定了發展的方向；他一方面由科學出發，接受了科學的成果，將科學的精神融化到哲學中去，否定了在理論上證明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用唯心論的觀點，去解釋科學的性質、前提、假定等等，既抽象化了科學，也抽象化了哲學自身；他維護科學，又不敢開罪宗教，肯定物質，又要過分的強調精神的作用，物質成了精神的附庸，造成「怕物質」「怕上帝」的結局，進步與保守兩種動機的矛盾，加深了他的哲學內容的複雜性和行文的曲折、艱澀。一般的說，他是俱備了「偉大的理想」和「可憐的實際」的「失敗的英雄」，而就發展的觀點說，他在哲學上承先啓後的功勞，是應予承認的。——我現在採用這個綱領來分析康德知識論中的兩個中心問題：思維與存在底條件同一問題和物自體問題。這兩個問題是密切關聯着的。

唯物論者說：外界是不倚於我們意識底客觀實在，唯心論者說：外界是我們的「精神現象」，這是兩種不相容的說法。調和兩種不相容的學說似乎是不可能的。調和並等於機械的折衷、拼湊，不是平均主義，半截眞理，唯物唯心各取其半；這樣的「折衷主義」，根本不成其爲哲學，至少康德哲學不是如此。康德基本上是唯心論者，但他同時是有造詣的科學家，在理性主義混淆了科學原則與哲學原則，走到窮途末路，經驗主義否定科學底自殺政策出現之後，康德以科學家和哲學家雙重身份重新處理科學與哲學關係問題，不可能不承認科學事實，所以他的認識論的出發點是肯定科學和分析科學的性質，——也分析了形而上學的性質，將形而上學從科學中區別出來。此點留待後面申說。

肯定科學，肯定物質，首先要肯定感覺。感覺是外物（物自體第一義）對於我們感官刺激的結果，我們依賴它反映外界，它是我們的知識或經驗的「素材」，沒有它則一切概念的體系和思維的活動都要落空。它所介紹給我們的當前世界，是知識的唯一的對象。它是實在界唯一的「索引」，「凡與感覺密切關聯的，是實在的」。（「純理性批判」，「原則篇」「經驗的設準」二）即是說，沒有感覺的線索，我們無從認識客觀世界，而柏拉圖及理性主義者的與感覺絕緣的「理念界」「眞如界」等等，都是空虛的玄學領域。這個物質在先的論斷，基本上是唯物論的（像列寧所指出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認識外界，先要搞清楚我們認識外界的能力，而檢查主觀的認識能力，不等於檢查外界，不等於檢查客觀實在。檢查客觀實在是唯物論的主張，康德心中雪亮；要避免唯物論地解決問題，只有轉變方向，「發現」主觀，依賴主觀，使外界或客觀的實在在認識的過程中成立起來。他不直接叫對象依賴主體，而在主體客體的互相制約，互相依賴的關係中說明「認識底對象」。他不像笛卡兒從「我思」出發，去證明「我在」「物在」——「神在」，而是由物我對立，物我並存底邏輯的、辯證的關係去證明「我思」的必然性，和它（「我思」）對外界或自然界有必然的效準。這是康德唯心的認識論立論的張本。

就承認科學及由科學事實爲出發點說，他不能不承認「先有物質」這一命題的眞理。這是唯物論的見解。先有之物，必爲「自在之物」（物自體），它是意識以外的東西，對於它說，並不需要一個「思想者」。

就「外界或客觀實在在認識過程中成立起來」這一命題說，離開認識的主體，即無所謂外界；若無外界——這是不可能的——也就無所謂認識：認識與對象在關係中，在相倚的關係中，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同時成立的；這是道地的唯心論。

這是康德的認識論中基本的矛盾。所謂認識與對象底條件同一，是康德對此矛盾所作的「統一」方案，這是「純理性批判」主要的題目，「批判」中千言萬語，都是試圖解除這個矛盾，求得矛盾的統一。就在這個試圖解除矛盾的過程中，也就是說，在唯心唯物的思維方式鬥爭過程中，他解決了或接近解決了一系列的以前的哲學所不能解決的或尚未提出的問題，像知識的「建立」問題（知識論），思想方法問題，邏輯改造問題，玄學的存廢問題，哲學與科學關係問題等等。

認識和對象條件的同一，是以下命題的簡稱：『經驗可能性的條件，同時是經驗對象的可能性的條件』。這個基本命題，在「純理性批判」的「範疇先驗演繹篇」（第一版）的第四節「範疇之爲先天知識底可能性之暫時說明」）和「原則篇」的「論綜合判斷的最高原則」中均着重的提出過，作爲這兩篇——這兩篇是「純理性批判」的中心環節的綱領和總結。經驗可能性的條件，是指空間、時間之爲純直觀（不是概念）或直觀的形式與範疇之爲純概念（不是經驗的、抽象的概念，而是判斷的、銜接的、表示功能的概念）或悟性的形式，即是說，時空範疇，不但是我們一般經驗的條件，同時是我們所經驗到的對象的條件。我們的一般經

驗，若無空間內方所，時間內方向的分別，和因果法則中所表示的必然的先後關係，和本質附性法則中表示的必然的同時關係，則一切經驗根本不能成立；也就是這些條件，是我們生活中所經驗到的（認識）事事物物的條件。意識的統一，同時是對象的統一。『「我思」必須伴同我的一切觀念。』（「範疇的先驗演繹篇」（第二版）第十六節（「論先驗攝覺的原始綜合的統一」）。『不是我們的概念遷就對象，而是對象遷就我們的概念』，『我的變革了的思想方法是：我們所先天的認識於物的，是我們自納於物中的』。（「純理性批判」第二版序）精神活動的規律同時是物質存在的規律。乾脆的說：意識決定存在。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同時成立。「無我原非你」，「我」不成立，物（對象）也就不能成立。就在自我意識之中，成立物之意識；也就在物之意識中，陪襯出個「我」。『所謂悟性或「先驗的主體」，不外是自同一之我。有自同一之我，方有對象之認識。有自同一之我，方有自同一之物；有自同一之物，方有認識之對象。拿自同一之我，去「逼出」自同一之對象。時空範疇，均是「逼」的方法、形式。也正借「逼」的作為：認識，判斷，推理等等，才「悟」到自同一的我。其始：我與物都是曚混的，其終：我清明物也清明。有我之清明，才識出物的清明，由物之清明，才察出我之清明，是謂「大徹大悟」，也許近乎「物我同一」，「物我兩忘——而化」之境』。（鄭昕：「康德學述」六十，六十一頁）

舉凡此類說法，雖似言之成理，總究是「偷天換日」的辦法，因為我不能「創立」世界，包辦世界。我怎樣了解對象，解釋對象，判斷對象，其了解和解釋的方式是我們的，判斷的句子也是我們的，這些方式和句子的總和，並不等於所了解、所解釋、所判斷的對象——自在之物。簡單的說：精神的活動，代替不了物質的存在。

認識是求得矛盾的統一的。康德唯心論式的統一，是一個失敗的企圖，下面詳說。如果採取另一種辦法，採取唯物論的辦法：我認識對象，即是認識對象的規律；我能正確反映外界的規律，就是客觀的眞理（眞理是觀念與對象的一致）；如果我沒有正確的反映外界的規律，則所認識的不是客觀的眞理，而是錯誤。這本是「哥侖布的鷄蛋」，可垂手得之，而唯心論者偏偏不肯承認這件平凡的眞理，挖盡腦汁去排比概念，製造體系，在頭腦中作一番革命事業，（康德自詡為「哥白尼式的思想革命」）其結果仍是妙手空空，步入虛空之境，「可憐無補費精神」。

抑我年來受列寧的啓示，重新玩味康德的義理、詞章，深深感到康德的論證，還多少留下唯物論的痕迹，他對科學的事實與唯物論的眞理，並未忘情，我們只要善於體會他的對象論的另一面——對象作用於主觀的一面，了解上便迥乎不同。以前人所了解的康德，是將重音放在「我」「意識」一類字眼上面所得出的片面的，唯心論的解釋，過去傳誦一時的康德註釋，不都是用「了解康德，是說超過康德」的方式去曲解康德？然即在唯心論的解釋裡，已時時閃耀着唯物論與辯證法的火花。

康德在「範疇先驗演譯篇」給認識與對象的關係以這樣的解釋：『這裡必定要弄清楚觀念之對象一詞的眞義；我們怎樣去了解一個既符合知識又異乎知識的對象？我們很容易看出，此對象只能當作一般的什麼等於X去思想，因為除掉我們的知識，沒有什麼，可以當作符合這個知識去設想。然我們覺察出，我們一切知識與對象的關係底思想，都蘊含着一種必然性，將對象當作那種阻止我們知識的「差不多」或任意的成分，使知識在一定的先天方式下決定，因為知識既與一個對象相關，則亦必然的與此對象一致，即是說，知識要有一種統一，正是此種統一，形成一個對象的概念……當我們有直觀雜多裡的綜合統一的作用時，我們於是說：我們認識對象。』（「範疇的先驗演譯篇」（第一版）第二章（「論經驗可能性的先天的理由」）第三節（「論概念中知識的綜合」））這段重要的文章裡包含主客辯證的關係和唯物論的因素，雖然就整個的方向說是唯心論的。他一面指出對象獨立於意識的性質（唯物），緊跟着「在一定的先天的方式下決定」（唯心）。「符合知識又異乎知識的對象」是同一個對象。就本質說，它即是自在之物；不然它即是我們意識的內容，說不上「異乎知識」，不能起「阻止我們知識的「差不多」或任意的成份」的作用。然康德唯心的知識論中又容不下一個自在之物，他以主觀的必然性來混同事物的客觀性，支配事物的客觀性，所以對象要「符合知識」。符合有兩種可能：或者是形式邏輯的符合，則不能決定對象是思維的性質還是物質的性質；或者是唯心的知識論的性質，則對象的性質，是思維的性質；要是思維的性質，便無所逃於主觀的綜合。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思想革命」是這樣的：知識裡的必然性，為一切對象的思想所由出：「因為『對象不外乎是一個綜合底必然性的概念所要表示的「什麼東西」』。在感覺與觀念的繼續裡，不受偶然的統治，而是受嚴格的規律性管理，它排除每個主觀的任意的成份：正因此，對於我們說，才有現象底「客觀的」銜接。經驗特為功能的條件，同

時是從經驗所得的結果底條件；因爲一切關於對象的決定，依乎純直觀的形式與純悟性的概念互相浸潤，由此形式與概念，感覺裡的雜多，才被一個規律的系統聯繫縛起來，於是才形成一個對象。

意識和對象，同時獲得新的解釋。巴克萊的心理學的玄學，以「我」爲原始的，正確的，而「外物」的正確性，是引申出來的，在「我」之存在裡我們有直接的，不可置疑的存在，而普通所謂實在，特別是空間內事物的存在，是依賴「我」這個基本事實的。故「心靈」（與上帝的無限的精神）爲唯一的眞的，「本體的」實在。整個的我們所謂存在，即不外乎是心靈的內容，當作「被知覺的」去表示。康德與巴克萊不同：他以「我」，以自意識的心理學的統一爲「演繹」的終點，不是出發點，我們不是取絕對的玄學立場去作判斷，而是取經驗及其可能性的立場去作判斷，「我」之事實，並不優於藉知覺和經驗的思維所證實的事實，因爲「我」並不是作爲單一的本體，現成的擺在那裡，而「我」這個思想的成立，即在雜多銜接的綜合或功能之中，不在此綜合或功能之先、之外，我們也特此綜合或功能，感覺內容，才能爲經驗的內容，印象才能爲對象。

這是康德的：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同時成立的學說。

康德叫對象意識與自我意識同時成立，是「偷樑換柱」，叫對象與自我同時成立，物質與精神同時成立；事實上對象是先於自我，物質是先於精神的——這也康德所肯定的事實，他的全部知識論是由這個事實出發的。（他曾藉「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分別和「發生問題」與「批判問題」的分別來減輕矛盾，其實是逃避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康德說：我是就認識的心理程序，邏輯程序說對象意識與自我意識同時成立的，這在理論上很難駁倒，（正如巴克萊，休謨的知識論在理論上很難駁倒一樣，）他於是爭得自我（精神）之優越；所謂「條件的同一問題，實是精神優越問題，以思想律等同自然律，好去支配自然，其秘密是「我所先天認識於物的，是我自納於物中的」，「悟性不從自然中尋找它的規律，而在自然前須佈它的先天的規律」（「未來玄學導言」第三十七節），其實是抽象的自我，認識它自己所設定的抽象的自然——如是而已。

「凡一切知識我稱它作先驗的，不是窮究對象，而是窮究我們認識對象的先天的可能的方式。」這是他對先驗哲學（「純我哲學」）所下的定義。他將存在的世界都回到「先驗的主體」——「純我」：「純我」爲經驗的可能性及對象的最高原則。沒有我，無法了解經驗的對象，無法了解物之認識和物之存在。因爲我是作知識判斷的，對於我說，此判斷是有效準的。只在我的意識內，判斷的主賓詞聯繫才有意義，對於我說，此聯繫才有主賓詞的價值，沒有我，沒有我的意識，對象的認識是不可能的。然認識的意識不只是接受印象的照片，照片不自知摹擬了物。只獲有觀念也還不是知識，惟在意識裡才能衡量觀念的價值，才能合乎眞理底衡量一個對象，意識將觀念和對象比較，意識到它們間的一致。意識如何達到對象，它如何成爲關乎對象的意識？心理學不能回答。對象之於意識，不只是心理學的內容，意識要想認識對象，則必與一個對象相關，依照這個對象。我們的前提是：觀念與對象一致—是眞理。從一方面說，意識想認識對象，得依照對象，對象之對於意識，要保持它的「獨立的加號」（客觀性），從另一方面說，意識要眞能認識對象，得滲透這個對象，對於一個爲意識絕對不可企及的對象「先驗的對象」——「物自體」，認識的念頭也不會發生，（因爲認識它是根本不可能的，）遑言認識？對象既必爲認識的對象，而一方面對象之於意識，既不能是絕對的超越的，又不能是絕對的內在的，另一方面，對象既要對於意識保存獨立的加號，又要內在於意識，這豈非自相矛盾？康德作「經驗意識」與「先驗意識」的分別，來解除這個矛盾。對於經驗意識說，對象保存它的獨立的加號，對於先驗意識說，對象是內在的。至於經驗意識如何認識對象？如何作客觀的有效的判斷（先天綜合判斷）？經驗意識與先驗意識如何分別？如何聯繫？先驗意識如何「立」對象的獨立的加號？這正是「範疇的先驗演繹篇」所要回答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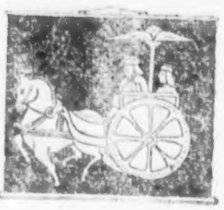
經驗意識是你我當下的，尙未作眞僞之辨的直接意識，這是容易理會的。先驗的意識是什麼？我們須藉意識的邏輯作用（判斷）方可體會得出。在每個認識裡有個判斷的主詞與賓詞的聯繫，因爲認識即是判斷，只有觀念，還無眞僞之別，惟判斷才有眞僞之別。就對象說，如果它是認識的對象，判斷的對象，則必表現爲觀念的一個客觀的聯繫，在對象裡，判斷的主詞觀念與賓詞觀念必客觀的聯繫着。然聯繫是意識的綜合作用，只能在意識裡有聯繫，被聯繫；也只能在客觀的意識裡有客觀的聯繫。此客觀的意識，是先驗意識。這個先驗意識，是藉邏輯的功能（判斷）「悟」出來的，有了先驗意識去發揮範疇的作用，才能「逼」出對象的客觀性，「立」對象的「獨立的加號」。對象的「獨立的加號」即判斷的分子（觀念）的客觀的聯繫，而執行這

個聯繫，是經驗意識的作爲（經驗判斷）；經驗意識執行這個聯繫的客觀標準，是先驗意識所「立」的標準，或曰：經驗意識，依照先驗意識。如果認識是可能的，是合乎眞理的認識，則經驗判斷所依照的（邏輯判斷）與經驗意識所依照的（對象），必得遵守共同的原則：先驗的意識，或作判斷的意識。沒有判斷的意識，一個判斷是不可思議的。沒有判斷的意識 ， 不但主賓詞的綜合實際上不能成立，邏輯的也不會有效準。故具有「獨立的加號」的對象， 必在也只能在一個判斷的意識條件下安頓，我們也說先驗意識「立」 對象的 「獨立的加號」。客觀性的思想和聯繫的思想，綜合的思想同樣的與普遍意識（先驗意識） 的思想不能分離。經驗意識與對象都要以一個共同先驗意識爲基礎。沒有先驗意識，經驗意識不能與對象關連，沒有先驗意識，對於經驗意識說，對象也不能爲客觀的。先驗意識替認識的主體與對象設計了一座橋樑，使主體能滲透對象，先驗意識是客觀的，共爲意識，却仍是主觀的。對象不只是概念——概念是要被判斷的——對象要是判斷自身，是一個客觀的判斷；先天綜合判斷。判斷之所以爲判斷，之所以能爲先天的，綜合的，需要一個理想的意識（先驗意識），在這個理想的意識裡，判斷的主賓詞合乎眞理的聯繫着。所以對象的經驗實在性和先驗理想性都以舉同之「我」（先驗意識）爲形式條件。經驗意識與先驗意識不像意識與對象之隔絕；當經驗意識下眞的判斷時，有知識時，做成經驗時，它當下即是先驗意識。如果經驗意識不能當下即是先驗意識，則經驗意識，不會是認識的意識，不會是建立科學的意識，苟如此，則無法了解經驗的可能性，只有由最高的條件同一，經驗的條件和經驗對象的條件的同一，由經驗判斷所依照的和對象所依照的先驗的「我」底同一，我們才能了解經驗的我是依照對象，才能了解經驗的我之能達到眞理。當經驗的我照準對象時，經驗的我是努力使先驗的我在它（經驗的我）之內實現。先驗的我（純我）是經驗的最高條件，也是經驗之最高的法則——此法則所表現的「形式」是範疇。一切的認識，都努力遵守這個法則和法則所表現的形式：範疇。惟如此，認識才是客觀的，被認識的，才獲得客觀性：遵守法則和遵守法則的形式（範疇），也正是對象的特殊的標幟。凡當作眞的被認識的，不是一個對象的「相」（像相拉圖及其徒所相信的），而是一個客觀的判斷，由先驗意識所下的，在經驗意識中所執行的判斷——先天綜合判斷。先驗意識所表現的形式是先天的原始的聯繫的形式，如果任何經驗判斷可能，則此類形式必對經驗意識有效，亦必爲經驗意識所認知。我們之能經驗的去判斷，共判斷可能性的條件是：先驗意識運用一定的「形式」去聯繫非邏輯的與意識生疏的感官所與的「材料」爲經驗的對象；對象的客觀性（獨立的加號）於是才成立。才能由感觀的印象形成一個宇宙：自然。經驗意識之能當下即是先驗意識，在乎它能當下即能依乎原始的先天的聯繫形式：時空範疇內表現，實現。每個對象，它之入於我們的經驗，之爲我們所判斷，它之爲一對象，必爲先天的理想的聯繫所繫縛，使材料成爲經驗的對象，就是說，雜多的材料必入於空間內一個方所，時間內一個方向，是物的一個性質，它的存在有一個因，能發生作用等等。這些決定不是在經驗裡方才頒給材料的；而是這些決定使我對材料有可能的經驗。這些決定不使孤立的材料可能，而只使在空間時間存在之物可能。凡爲知識所判斷的存在是「邏輯的」。不是一切皆爲「邏輯的」；感官所與的，在初，雖入空間時間，也還是意識生疏的，即在先驗意識按照一定的形式(範疇)所把握，才獲得邏輯的意義，雜多的材料（感覺）才能入經驗的判斷，爲主賓詞概念。一切存在的認識，因此才是經驗。一切經驗和一切經驗對象共同的以先驗意識爲基礎，先驗意識不但藉原始的先天的形式（範疇）使經驗可能，它也藉此形式爲自然秩序的立法（者）；自然有合規律性，經驗的，後天的知識才可能。證明這個道理，康德名之曰：「範疇的先驗演繹」（鄭昕：「康德學述」一一二至四頁）

這是他的「認識與對象底條件同一」的學說。

我們這段冗長的叙述，是想藉此表示康德在思想方法上，如何辯證的，結合了先驗意識與經驗意識，特別是借重判斷（過去理性派人處理知識是從「先天觀念」（我，世界，上帝）出發，經驗派人從經驗（知覺，感覺）出發，而康德與他們不同，特別注重判斷及其性質）生動的，辯證的，與經驗意識，經驗事實的結合，說明了意識統一條件即是事物統一條件。不過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一）他的論證，只辯護了對象依存於主體——不管它叫做「經驗意識」「先驗意識」「判斷意識」「純我」「悟性」還是別種名稱，這是違背了「物質在先」的基本事實（二）他雖辯證的結合了「經驗意識」與「先驗意識」使純我儘量發揮功能好像它「並不抽象」，其實，它所設定的對象，並不是具體的對象而是「科學的」、「邏輯的」精神的對象，或說將對象提高到精神的領域，脫離了大地的氣息。故雖有辯證的方法，或接近辯證的方法，只要是執着唯心論的體系，都會是勞而無功的。

（下轉第四十二頁）



魏晉玄學的社會意義——黨性

侯外廬

老莊易三玄與佛教之成爲魏晉人的支配思想，盡人皆知，本文要研究的，是它的歷史源流與其所以支配學術的社會意義——黨性。

通過漢代有一特點，「異端」之學從司馬氏父子經過王充以至仲長統，都在不同的角度，高揚道家。不但如此，當時農民叛亂所依據的粗野旗號，亦正是黃老道教，張陵張角張魯等的五斗米教與太平道，曾以他們的「廉價」宗教對漢庭讖緯的宗教迷信，發生了極大的作用。後者，如顧頡剛即據以論漢代是一個迷信世界，也有理由（見「漢代學術史略」）。我們可以說，漢代的支配思想是在朝經學與在野道學，而在野者則士大夫異端是以道家的自然天道觀爲其內容，農民旗號是以道家的符咒迷信爲其動員武器（黃巾、五斗米教皆在用粗野的具體象徵，如神君種民，米民米性之類。）及至漢末，這種朝野的分歧，而對着社會的動搖（如內亂外患以及自然災害之激變，）面對着階級的分化（如由黨錮到三國割據，）以一列一列的社會危機，被現實的歷史所驚醒，不得不在意識方面加以重新編制，即使經學家如馬鄭，士大夫如清議，也要在自己的系統內開始修正了。

道家在學術內容裡，最高的道理是自然天道思想，這一點不論是在朝經學也好，或在野道教也好，都沒有的；道家與名辯的方法論是善於巧辭取辯的，這一點又不論是在朝經學也好，或在野道教也好，都沒有的。從王朝改變最基本的對角線競走而言，也不能不使士大夫有所取捨或化合。最後，必然要在全面學風裡產生支配的指導傾向，如王僧虔誡子書云：

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王弼）何所道，平叔（何晏）何所說，馬（融）鄭（玄）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

——南齊書卷三三

然而學術的形成並不是自流自變的，至少須看執行學術任務之士，有沒有在人物方面發生變化。如果漢魏之際仍然是以家法師法所拘束的遺老宿儒高踞於博士官的地位，則搢紳端委，桎梏住思想圖案，實在脫化不出異說來的。名流名勝之所以能走向學術，以我們看來，有一點確爲不可忽視的社會變動，即漢末魏晉以來的人物，大體上都是被當時反對者指斥的所謂「高門子弟」，「浮華少年」，「當今年少」，「荒致廢業」而「輕毀禮法」的後起之秀。下面就是一個代表人物的夙悟簡表：

人名	早熟	才性
馬融	少而好問、學無常師。	美辭貌，有俊才。
鄭玄	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	鬚眉美秀，威容進偉，身長八尺。
孔融	四歲有識，十歲知名。	幼有異才。
徐穉	九歲知名。	清妙高疇，超世絕俗。
禰衡	未滿二十與孔融（五十）交。	逸才飄舉。
何晏	少以才秀知名，七歲明慧若神。	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以神自況。
夏侯玄	少知名，弱冠即官。	尙玄遠，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傅嘏	弱冠知名。	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
管輅	號神童。	好天文地理。
劉廙	年十歲知名。	好論刑禮。
嵇康	少有儁才。	曠邁不羣。
阮籍	少能論道。	曠達不羈。
王弼	幼察而辯，十歲通辯能言。	事功雅非所長。
鍾會	少敏慧夙成，五歲即知名。	有才數技藝，博學好辯。
向秀	少爲人所知。	有拔俗之韻。
郭象	年少有才理。	薄行有儁才。

謝仁祖　八歲神悟。　有顏回之譽。
山濤　少有器量。　介然不羣。
王戎　幼而穎悟，七歲神童。　神彩秀徹。
王衍　幼年知名，辯談不屈。　神清明秀，風姿詳雅。
樂廣　八歲被認爲名士。　神姿朗徹。
衞玠　五歲知名。　明識清允。
謝石　早知名。　才氣高俊。
杜育　神童。　美風姿，有才藻。
王右軍
王安期
王長豫　以上王氏三子，稱王家三年少。

由上面不完全的表看來，人物大都是少年顯名的，甚至很多稱爲「神童」的。他們少不更事的幻想，的確可以跳出了皓首窮經的圈子，別尋玄遠的抽象概念世界，在中古時代，翻雲覆雨，再沒有比此時厲害；但因了他的早熟，抑也包括着早衰，異常嬌弱，敵不住殘酷的現實。實在講來，在他們的思想裡，有追求天道自然的一套「通達」系統，代表中古形而上學的技巧，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然而又有以天滅人的變態思維，其不健康的程度有末日同盡之消極因素，所謂「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不僅社會人物的出身年齡（其出身世家相同），與漢不同，即社會儀式，亦改變了漢家法度。這樣的改變家風，並非要鼎革，而是長期在興宗，所謂「吾家麒麟，必興吾宗，」「不意衰宗復生此寶，」「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等等，都是經過八王之亂衣冠南渡的名族在巨變時代的權變想法。「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式，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若仍拘執過去，則如支道林批評王坦之說：

著膩顏恰，緰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世說新語輕詆

社會風俗習慣的變移，抱朴子譏惑篇說：

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頹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蠹役，雕民遭道綱之絕紊。……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

按冠帶衣服與膚髮修飾，從古就有一定的禮制，古代式瞻或威儀，爲君子所重，清阮元有周人尚威儀之說，詳舉列論（見拙著「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甚至孔子以披髮左衽來和社會中心制度相區別。漢代襲古春秋，故博士儒者的服飾，即採春秋的端委搢紳，魏晉喪亂，此一種威儀，因萍浮南北而自然非簡脫改易不可，葛洪所言，確是實事。魏晉人士甚重辭色，如何晏粉白其儀，衞玠號爲璧人，庾亮風姿神貌，杜弘治清標最美，甚有以騎馬回策的妙姿，蒲博下棋的容止來定人格的，章太炎所謂「以貌舉人」者是也。葛洪所以憤憤不平，就因他貌醜形粗，不足以方大雅。因了當時「所飾無常，」朝夕改易，在威儀方面須有一定的象徵，以爲威儀之式瞻，音旨之表符，於是「玉柄麈尾」與名流理致，成爲不可分離的風習。上面我們會說：兩漢之「端委搢紳」轉變爲魏晉之「玉柄麈尾」，就指此義。

按麈爲鹿之一種，體大尾長。相傳，麈與羣鹿並行，搖尾左右，可指導羣鹿的行向，有羣倫領袖之概。麈尾，用爲拂塵，猶是次要之義，蓋主共引人入勝，清談家執之，足爲儀瞻之表率。端飾玉柄，別於寒微，所謂「上品無寒門也。」我們且把當時握此儀物之風尚，列述於下：

王衍善玄言，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衍傳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世說新語言語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確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

——世說新語文學

孫盛與殷浩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煗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飯中。

——世說新語文學

蔡充詆王澄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

——世說新語輕詆

王濛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

王濛病篤，燈下視麈尾而嘆，既沒，劉惔以犀麈尾納之棺中。

——世說新語賞譽

王浚以麈尾遺石勒，勒僞爲不敢執，懸於壁而拜之。

——浚傳

——勒載記

何充詣王導，導以麈尾指其床，曰「此是君坐也。」

——充傳

王僧虔戒子，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

——見前引

戴容著三宗論，智林道人曰：「貧道捉麈尾三十年，此一塗無人能解，今始遇之。」

——齊書容傳

盧廣發講時，謝舉屢折之，廣愧服，以所執麈尾贈之，以況重席。

——梁書舉傳

張孝秀談義，嘗手執栟櫚皮麈尾。

——秀傳

陳後主所遣玉柄麈尾新成，曰：「當今堪捉此者，惟張譏耳，」即以賜譏。後主幸開善寺，使譏竪義，時麈尾未至，命取松枝代之。

——陳書譏傳

由上表看來，我們知道玉柄麈尾是優閒之士的代表儀式，指導思想向「虛處閒刀，」遠處着墨。玄家引津，如此其神秘，上品執符，如此其高深，如此其有閒，似如顏氏家訓所評：「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未有力田。……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皆優閒之過；」然而「虛價」是祟，亦有其他動因。世說新語輕詆篇注射謝安虛僞之評曰：「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虛之對面爲實，遠之對面爲近，深之對面爲淺，清之對面爲濁，漢末以來，最下流的是黃巾五斗米的現實道教，其淺近穢雜，爲「風德雅重，深達危亂」者（周伯仁之例）所大鄙棄，故麈尾引津，實有思想教條的社會意義。不管這種思想戰爭的方式有厭世的不利因素，但明白「天地四時之消息」者，並不是完全空想，正有引導愚民同化之取義，儀表的瞻視要比三玄的精善，更具作用。六朝佛教入玄，經過儒釋道的詰辯以後，融化合流，其在人民方面起最大功效者，則爲高其尊瞻的佛寺金像。（所以王衍說，「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這話歷來沒有正解，我們以爲，浮虛之道在當時「戮力以匡天下，」是對於農民的道教匡正，王衍輩雖死於外患，但他自謂，如果不尙浮虛的道家以正粗野的道教，早已亡於漢末黃巾，連晉代王朝都沒有，還能說有今日麼？）中古農民戰爭歷史是無例外地以爭取廉價的迷信宗教的現實利益爲目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火道，紫道，鬼神師，鬼民等，）而宗教神學則對農民戰爭的反抗爲對象（眞假正邪之辯，）其具體的歷史有中古與近古之分，而宗教信仰的黨性對立鬥爭，却沒有例外。世說新語自新篇有一段史實：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品藻賞識之功用，使俠士投劍，此例自明。實在講來，魏晉之士莫不想以玄道作投劍的說服。按九品分類便有極重大的社會主義，故皇侃論語義疏，謂九品爲教化法。何晏解釋「民可使由之，」謂「由者用也，」義即民可使用之。他解釋爲「君子有三畏」云：「小人直而不肆，故狎之（大人）也；不可小知，故侮之（聖人之言）也。」若化之以無爲，則所謂「不肯恃以免身。」王弼說：「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僞，則儉心茲應。」又說：「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執一統衆之道也。」（皆見論語集解義疏）

漢末方士道教，在農民變亂中發生了極大作用，他們不在體無，而是太上老君神仙與方術的號召，曹魏在思想上安撫他們，有曹植的辯道論可作證明：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而顧爲匹夫所調，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效，或沒於沙立，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族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

——弘明集卷五

當時集之魏國的方術之士，在野道教和在朝道家，自然要詰辯的，曹植「辯道」二字，頗具論難之義，並說道其「爲虛妄甚矣哉！」左慈禰衡等人都是動搖分子，雖不友王侯，傲慢權勢，而其遊士縱橫之行爲，實不足以代表農民意識。曹操不殺他們，驗其方術，正欲在眞假道學的究辨上，折服他們吧了。

（參看抱朴子彈禰篇）王弼「求其情僞，偸心茲應」之意，於此始有註脚。

葛洪這位人物比較天眞，他的玄學思想飽含敎化之意，而謀以道反道，正在於以朝的「得之者貴，體之者富」的道敎，反對壓服那些凡夫黎庶的姦邪逆亂。他說：

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夫玄道者，得之者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志之者器。……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

——暢玄篇

俗所謂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巫祝小人，妄說禍祟，……或起爲劫剽，或穿窬斯濫，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結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甲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說，誑惑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合逆亂。……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逃逋，因爲窟藪。……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

——道意篇

抱朴子內篇，發道本儒末之說，比而觀之，各篇皆在以道反道，和他的詰鮑篇反對鮑敬言無君思想而主張君統天設，相爲表裡。在明本篇更云：

曩古純朴，巧爲未萌，其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毀謗之言不吐於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末俗偸薄，雕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眞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敎戒也。夫道者，其爲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愼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

佛敎滲入玄學以後，這種以玄學反對民間道敎的反動黨性，更加顯著，其明白反對農民戰爭的論究，在弘明集廣弘明集中保存了許多寶貴的材料，舉其重要者如下：

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答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爲本，柔弱爲用，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已，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爲方技不入墳流，爲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爲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廣弘明集卷八釋道安二敎論道仙優劣第六

矯詐謀榮，必行「五逆」，威強導衆，必施「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一。……忠賢撫歎，民治淩歇，揠地沙草，寧數其罪！消流末學，莫知宗本，世敎訛辟，詭薇「三寶」（指老子三寶，慈、儉、不敢爲天下先。——引者按）老兒民等，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燼，河雒之滓穢，淪湑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鏡未然，照迷童於五鄉，顯妙趣於塵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

（按五逆者，禁經上價一逆，妄稱眞道二逆，合氣釋罪三逆，俠道作亂四逆，章書代德五逆。六極者，畏鬼帶符、妖法之極一，制民課輸、欺巧之極二，解廚篡門、不仁之極三，度厄苦生、虛妄之極四，夢中作罪、頑痴之極五，輕作寒暑、兇佞之極六，凡所指斥，皆漢末以至魏晉之民間道家。詳見本論，茲不贅述。）

——弘明集卷八釋玄光辯惑論序

以上所述，是「彼我情判」的對立鬥爭。還有當時的政治條件爲其骨幹，亦不是一種隨意的局勢。漢魏之際，曹操出身，「任性放蕩，不治行業，」陳壽評其取得政權之道，「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也。」一個「非常」時代，建立「非常之業」要「非常」之人，執行「非常」之策，這一口頭禪成了三國人的常套。曹魏政權創始者曹操的「度外用人」，在政策上是和在朝玄學息息相通的，所謂「度外」者，卽不拘於漢代博士制度的法「度」，而以「九品」題拔，爭取新的淸談少年，以對抗當時其他豪族政權，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他招撫在野的豪傑方士，使民間道敎同化於朝士玄學。他前後數次所下的求賢令，實有重大的社會意義。例如：

今天下尙未定，此時求賢之急務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

——魏志操紀建安十五年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義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魏志操紀注引魏書建安二二年

汙辱見笑不仁不義之人所以值得拔舉，除了和緩朝野的對立，欺騙農民羣衆之外，更在於「天下尙未定，」要爭取名門豪族的向心。到了天下已定呢？自然要被統治者逐次盡收了。何晏輕法重人，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論語集解，無爲而治章）他亦就犧牲於唯人是崇的名族悲劇當兒了。留給後代的佳話，卽所謂「正始之音。」至於什麼叫作「正始之音？」另文評論。

現階段土地改革的理論分析

朱劍農

一　從馬列主義的地租理論說起

「戰爭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內的……兩個『關』。戰爭一關，已經基本上過去了，已經由此而勝利地建立了全國統一的人民民主政權！但爲什麼還要過「土改」的第二關呢？「共同綱領」上曾經指明：「土地改革爲發展生產力和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但爲什麼肯定土地改革的實行可以發生這樣巨大的作用呢？是的，土地改革的內容，主要的是要廢除現存的土地制度，建立另一種新的土地制度，舊的土地制度之所以應予廢除，當不外於它的地租制度的不合理。「共產黨宣言」上論到經濟政策部份的第一項，就明白地指出要「剝奪土地所有權，以地租充國家支出之用。」「資本論」之所以斷定「土地所有權形態，和一定生產方式內的其他一切所有權形態一樣，它的合理化的論據，是生產方式自身，具有歷史的過渡的必然性。……土地所有權和其他各種所有權，是由以次的事實來予以區別，就是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即令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立場來看，這種土地所有權，也顯得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卷三，篇六，章三七）這主要的也是馬克思依據科學的地租理論才得出這樣的總結的。因爲，「所謂地租，不外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實現自己（即成就價值增殖）的形態。」（同上）對於中國現階段土地改革之理論的研究，毫無問題地也應該從這樣的路線出發。

依據馬列主義的觀點，「任何地租都是剩餘價值，都是剩餘勞動的生產物。」（「資本論」，卷三，篇六，章三十七）

地租雖然是由農業資本家（或稱租地農業家）交與地主之手的，但其對於農業資本家投資農業所應得的利潤，是不會削弱的，也就是說，這種地租的支付，對於農業資本家的「平均利潤」並沒有什麼影響。原來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不管是投資任何產業部門，都必須保障他獲得平均利潤；當然租地投資的農業資本家也就不能例外：他們每年所得的利潤，除支付地租外，至少必須等於平均利潤（社會一般的利潤）時，才肯投資於土地；不然的話，土地投資就減少，市場上農產品的供給也減少，因之農產品價格提高，而投資於土地的資本家，不久就能達到平均利潤的目的。如此說來，農業生產中所產生的全部利潤，必然是高於平均利潤了。其實，正是因爲農業生產中所產生的全部利潤，能夠高於平均利潤以上，才是地租之所以能夠發生的源泉，而地租的本身，也無非就是那種平均利潤以上的額外利潤而已。所以地租雖然也與資本家所得的平均利潤一樣，都是剩餘價值的一部份，雖然作爲剩餘價值之一部分的地租是由資本家手裡拿出來繳付給土地所有者的，但是資本家之支付地租，假如把經營農業的資本家僅爲土地所有者那種情形擱置不理的話，則其地租並不會與利潤相混同，因爲「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這種地租，乃是剩餘生產物內一個在質上在量上皆以特殊規定的部份。……實則這種地租常是利潤以上的剩餘，它是剩餘價值的一個特殊的確定部份，它和商品價值中，那被稱爲利潤並且也由剩餘價值（剩餘勞動）構成的部份是不同的，它是這一部份以上的部份。」（同上）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這種地租將會阻礙土地經營的合理化，將會阻礙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地主，大都不是自己經營土地，他們的土地一般都是出租於農業資本家去負責經營。因此，所謂的地主只是一種與土地經營不發生關係的乾領地租的不勞而獲者，關於土地的經營則是全盤交由承租土地的農業資本家去一手辦理。如馬克思之所言：「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把當作勞動條件的土地，完全和土地所有權及土地所有者分離。其結果把全部關係破壞，以致蘇格蘭的土地所有者，竟得在君士坦丁堡，度送其生涯。」（「資本論」，卷三，篇六，章三七）因此，土地經營的合理與不合理，實際上是與地主無關，而是一任經營土地的農業資本家的意願了。然而要合理經營，一則必須投下一定數額的固定資本，然後才可使其經營的土地能够獲得改良，二則必須對於土地既有的肥沃度不要施行過度或過速的攫取，用農業上的術語來說，就是不要實行掠奪經營。可是現實的農業資本家，事實上是否願將一定數額的固定資本投作土地改良之用，又是否爲了土地肥沃度的持久而不實行掠奪經營呢？關於前者，即關於農業資本家是否願意改良土地的問題，這在唯利是圖的農業資本家，因其鑒於租用土地的期間有限，而投放於土地內的改良資本，一經體合於土地之後，則非短時期所能收回，故當租約期限一經告滿，投放於土地內的改良資本，就要跟着土地一同轉歸於土地所有者所有。所以，農業資本家承租地主的土地，雖然明知土地經營的合理化，應當投下適當改良資本，但又爲了明知此種改良資本的投入，將因租約的期滿，不能由其自己獲利而將轉歸於土地所有者所有。因此，自然就阻礙了農業資本家對於土地的改良。至於後者，即關於農業資本家是否爲了土地肥沃度的持久而不實行掠奪經營的問題，這在唯利是圖的農業資本家，爲了要在他承租土地的期限以內，能够由土地上攫取較多的利潤，通常都不惜以掠奪農法去盡量的榨盡此種租用地的肥沃度。如馬克斯所說：「土地私有權，會成爲農業的障礙，並使土地的合理經營，維持，和改良，不能進行。」（「資本論」，卷三，篇六，章四七）

資本主義社會土地經營合理化的可能，既然由於現實的租佃關係阻礙他的實現，則其影響所及，勢必要阻止土地生產力的發展了。

以上雖是就資本主義的地租而論的，但是中國現階段的土地改革，是否也可以從我們的地租問題來探明它的必要呢？

二　中國農村地租形式的落後與租額的苛重及其對於農村生產力的束縛

中國農村的地租，至今仍以實物地租爲主要形式，而貨幣地租僅佔着次要地位，同時也還殘存着勞役地租，作爲實物地租的補充。根據卜凱教授過去調查二二省、一五二縣、一六八地區、一六五八六田場納租制度之結果有如下列之百分比表：（見卜凱：「中國土地利用」，頁二四三，表二四）

	地區數目	分租	錢租	穀租	工佃分租	其他	總計
全國	一六六	二二	二五	五一	二	〇	一〇〇

當然，這個表上所規定的各種地租形式，是按照習俗的說法，並不是科學的。如「資本論」之所示，地租的發展形式，歸根到底是三種：勞役地租、實物地租、貨幣地租。在此表中，不但「穀租」項下的百分之五十一，是屬於實物納租形式，而且「分租」項下的百分之二十二，通常也還是以實物來分析的，故實際上的實物地租，應爲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三。至其所謂「工佃分租」的納租形式，實際上是比實物地租形式更加古老的勞役地租形式。由此當不難瞭解：「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統治的地租形式，一般的說來，仍然是實物地租」。「這是和封建的自然經濟結構相結合的東西」。（見陳伯達著「近代中國地租概說」第二章）

近代中國農村的地租，不但可以從其納租的形式上來判斷它是和封建的自然經濟結構相結合的東西，而且從其地租的高度更可以明顯地判定這種地租的封建剝削性質。其如國民黨反動政府主計處一九三〇年所發表全國二十二省平均租額的統計如下表：

地租形態＼地租額＼土地等級	上等水田	中等水田	下等水田	上等旱田	中等旱田	下等旱田
分租占產量%	五一・五	四八・二	四四・九	四七・八	四五・三	四三・七
穀租占產額%	四六・三	四六・一	四六・二	四五・四	四四・六	四四・三
錢租占地價%	一〇・二	一一・三	一二・〇	一〇・三	一一・〇	一一・五

以上統計所列的租額，尚是一般所謂正規的租額，其實中國佃農實際所應繳納的地租，除了此種正規的地租以外，尚有所謂「押租。」此種押租，據國民黨反動政府行政院農產促進委員會調查報告：「一九三七年各省每市畝押金平均爲一五・八四元，可是此後的押金數額，各省均見增加，一九三九年增爲三二・六九元，竟增一倍有餘；至一九四一年更漲爲五五・二六元，較一九三

九年又約增加一倍。」或謂此種押租金額的增加，多少是受當時法幣貶值的影響，故其實際增漲的程度，並不這樣厲害，其實狡猾的地主，當時鑒於貨幣的貶值，早已改收實物爲押租了。舊中國地租率之高，眞是有點駭人！

再加，我國的土地購買年則是異常的短。據國民黨反動政府中央農業實驗所調查資料所計算的「購買年」，全年平均以錢租之購買年爲最長，約九年餘；穀租次之，爲七・七六年；而以分租之購買年爲最短僅約七・○九年。又據前中國農民銀行關於四川九縣一八三田塲的調查，從一九四○年春季到一九四一年春季，其中樂山的購買年是一・六六年，巴縣是四・五二年，溫江是五・八四年，萬縣是六・二三年，南充是六・六六年，綿陽是七・三○年，內江是八・○一年，安縣是一○・二七年，宜賓是一三・六八年，各縣平均是七・一三年，再據中山大學農業經濟系調查廣東連縣十七個村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購買年的變動情形如下表：

年份	上田購買年	中田購買年	下田購買年
一九三七年	五・七	四・五	四・七
一九四○年	三・二	二・三	二・四

土地購買年的長或短，是與地租率的高或低成反比例的，它更足反映我國地租率之高了。而這樣高的地租率，當然不會由租地農業家來負担，只有以實現自己的勞動爲目的農民——，主要是貧農和中農，才可以忍受這樣高額的地租剝削。這種高額的地租，既然超越了資本主義社會所謂平均利潤以上之額外利潤的範圍，而爲農業生產剩餘價值的全部，或爲農業剩餘勞動的全部，甚至侵佔到農民必要勞動的一部份，這顯然是不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地租，而爲封建性質的地租了。

上面我們說過，資本主義的地租會阻碍土地經營合理化的進行，從而也就必然地招致土地生產力的停滯。像中國這樣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剝削性質的地租，究竟是有利於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抑是阻碍着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呢？

勞動農民被剝削的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對於實際經營農業的農民既還不能以利潤的名義去佔取，而必將其全部以地租的名義納於地主的口袋，當然就將限制農業資本的積蓄，就將限制農業再生產的擴大。（這裡我們應該懂得：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資本家由農業經營中所獲得的利潤，他是可以用作農業資本的積蓄以及農業再生產的擴大的。）其實，這樣的地租剝削，因其可能甚至在事實上已經侵佔到勞動農民的必要勞動（用資本主義社會的用語來說，就是已經侵佔到勞動農民的工資），豈但不能發展農業的擴大再生產，而且連着農業的簡單再生產也將難於維持。至於資本主義租佃制度下所常患的那種弊害，即：土地使用者因爲鑒於土地租用期間的有限，而不願投資於土地的改良，以及貪圖目前的小利不惜施行掠奪農法，這在中國的封建租佃制度下，當然更是常見而不以爲奇的事了。

農業生產中相當於平均利潤那一部份的剩餘價值，不歸實際經營農業的農民所得，這在農民方面，將必因此不能進行農業的擴大再生產，也許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但其相當於平均利潤那一部分的剩餘價值既然隨着地租一同以地租的名義納入地主的口袋，在地主方面是否可以憑此收入以爲農業的擴大再生產而投資呢？不，中國的地主，照例都不會把地租用於農業生產；因爲這些地主，一般都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寄生者，他們非但沒有經營農業的知識和能力，而且根本就沒有經營農業的興趣，他們的地租所得，要不是資於生活上的揮霍，那就一定用之於積蠹土地（即吞購土地）或者是用之於高利貸款；這樣，當然都將有碍於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誠如馬克斯所說：「這種實物地租的量，可以大到這樣，以致勞動的再生產、生產手段的再生產，也嚴厲地感到威脅。這個實物地租的量，可以大到這樣，致令生產的擴大多少成爲不可能的，并壓迫直接生產者，使他們只能得到維持肉體生存的最低限量的生活資料。」（「資本論」，卷三，篇六，章四七）

德人瓦勒格於其四十年前所著的「中國農業」中就已指出：「在中國形成的佃農經濟，決不能促成農業的進步，只能阻碍這種進步。」解放後的新中國雖然已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地區，實行了土地改革，在那裡已將封建性質的地租剝削澈底廢除了，但在尚未實行土改的新解放區，據劉副主席報告：「根據我們最近在華東及中南一些鄉村的調查材料來看，一般的情況大體是這樣：地主佔有土地及公地約佔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富農佔有土地約佔百分之十至十五，中農、貧農、雇農佔有土地約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小土地出租者佔有土地約佔百分之三至五。鄉村中全部出租土地約佔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富農出租土地約佔百分之三至五，富農自耕土地約佔百分之十。這就是說，鄉村中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中農、貧農及一部份雇農耕種的，但他們只對一部分土地有所有權，對大部分土地則沒有所有權。這種情況，仍然是很嚴重的。這就是我們

民族被侵略、被壓迫、窮困及落後的根源，是我們國家民主化、獨立、統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這種情況如果不加改變，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就不能鞏固，農村生產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國的工業化就沒有實現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勝利的基本的果實。」（「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由此，當不難想見落後而苛重的封建地租，在中國是如何嚴重地束縛着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三　封建的土地制度阻礙着工業生產的發展

封建的土地制度，因其地租剝削的苛重，自必束縛着經營農業的農民無法發展他的農業生產，因其地租的收入，不作爲農業資本的積累，也必有礙於農業再生產的擴大，這都已經說過，而且也比較容易理解，但爲什麼認爲封建的土地制度也會阻礙着工業生產的發展呢？

中國的農民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料，以及工業人口所需的糧食，主要的是依靠農村來供給，而工業產品的推銷市場主要的也是依靠於農村和農民。可是如上所說，封建土地制度所統治的農村，窮困的農民，固然是無力搞好他們的農業生產以及農村副業的生產，而那些不勞而獲的地主階級，則又不把他們的剝削所得用之於農業擴大再生產，甚至根本就不投資於農業生產，相反地，要不浪費於生活方面的揮霍，那就一定投注於土地的吞購或投注於高利貸款；如此，自然就會形成農村生產的凋敝以及農民生活的困苦，那裡還談得到供給發展工業所需的原料和糧食？同時，由於廣大農民沒有土地，農產品又大都被地主拿走，所以他們生產情緒低落，生產積極性不會提高，他們更不願也不可能改進生產（購買農具、肥料、種籽等）和擴大再生產，他們也沒有能力去進行其他有助於工業發展的副業生產，因而他們就不能够更多更好地供給城市工業生產所必需的原料和城市工業人口所必需的糧食。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這樣生產萎縮下的農民，比方他們窮得連糙米都沒有吃的了，那裡還有力量去購買機米和機麵呢？那裡還有力量常常去購買新裝呢？因而礱米、磨麵、織布工廠的工業產品，就缺乏市場，當然要影響到工業的發展。誠然，我們不否認舊中國的地主階級，因其剝削所得的收入，很多並不是投資於農業生產，相反地是將很大一部分用於生活上的揮霍，這種生活上的揮霍，會有一部分的錢財用於工業產品的購買，從而可能使得工業生產的成品在這一方面獲得一部分市場，但是這一類的購買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是畸形的！這種畸形的購買力實際上并無補於整個工業生產的發展。而且我們在這裡，還必需順帶地指明：封建地主剝削所得的錢財，既不投資於農業生產，同樣也不投資於工業生產，然而舊中國的財富分配最大宗的是落於地主的口袋，因此，地主的封建剝削實際上就是阻礙工業資本積蓄的最大阻力。

封建的土地制度嚴重地阻礙着工業發展的理論，已經說明得够清楚了，我們爲了進一步說明土地改革和發展工業生產的關聯，願以今天的新東北爲例：

東北於一九四九年春天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後，農業生產量急劇增加，一九四九年農業生產量爲一千三百二十萬噸，而一九五〇年則將爲一千八百萬噸。由於農民生產力增大，因而農民購買力也大大提高，預計今年東北農民的購買力總值可達到五百六十六萬噸，卽農民將有佔其總產量三分之一的剩餘農產品，須要交換其他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由於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因而廣大農民所需的工業品的市場就大大擴展。一九四七年東北銷售布疋爲八十萬疋，一九四八年爲一百二十萬疋，一九四九年爲三百二十萬疋，而一九五〇年將爲九百萬疋。一九四九年東北工業生產佔工農業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五，而一九五〇年將上升至百分之四十三，這和農業發展的作用是分不開的。追源溯本，當然是以土改的完成爲其先決的條件。所以，認定「土地改革爲發展生產力和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這是完全正確的！

四　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所謂地租，不外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實現自己（卽成就價值增殖）的形態。」（「資本論」，卷三，篇六，章三七）而「土地所有權有一個前提，就是由若干私人獨佔地體的一部分，排除其他任何人，使它成爲專屬於自己私意的領域，而將其支配。」（同上）因此，要求落後的地租形態之廢除，自必先從一定的地租形態所依據的一定的土地所有權制度之革除而着手不可。

封建剝削關係依然濃厚的中國土地制度，原來是極不合理的，中國在抗戰之前的土地情況，大體是這樣：卽佔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農，佔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們藉此殘酷地剝削農民。而佔鄉村百分之九十的貧農、雇農、中農及其他人民，却總共只佔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們終年勞動，不得溫飽，這種不合理的情形，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和四年

解放戰爭，在東北和華北，已大體消滅，已基本上完成了土改（除華北少數災區外）；但在其他地區，則情況依然。例如四川其他地區，地主所佔土地，約達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而在另外一些地區，例如長江中游和下游地區，土地佔有情況，則是有一些分散的。至於最近在華東及中南的土地分配情況，前面已經提到，它仍然是很嚴重的。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還保存着前述的那種惡劣的佃租關係。這種情況如果不加改變，農村生產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國工業化就沒有實現的可能。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一條明確地規定要：「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因爲只有這樣，才可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爲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

依據土改法的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的具體辦法，應該是：「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財產不予沒收。」「徵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在農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但對上述依靠土地收入以爲維持費用的學校、孤兒院、養老院、醫院等事業，應由當地人民政府另籌解決經費的妥善辦法。」「地主兼營的工商業及其直接用於工商業的土地和財產，不得沒收。」「工商業家在農村中的土地和原由農民居住的房屋，應予徵收。但其在農村中的其他財產和合法經營，應加保護，不得侵犯。」「因從事其他職業或因缺乏勞動力而出租的超過當地每人平均土地百分之二百以上的土地和半地主式的富農出租的土地應予徵收。」以上的規定，無疑地都是廢除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而把地主作爲一個階級消滅掉的必要措施。因爲只有把地主作爲一個階級去消滅掉，才可以把封建性質的地租剝削徹底廢除。但是依據土改法所沒收和徵收的土地，在今日的中國情況之下，并非將它作爲國有，而是將它分給農民所有。不了解中國社會發展之實際情況的人們，或許以爲這是不够革命的。這種想法，就犯了「過左」的錯誤。因爲，依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性質來說，還不是企圖建立社會主義的時候，而是一種帶有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不過「現實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稱這種革命爲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及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大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扶助私人的中小企業，并不廢除富農經濟。」（「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因此，我們的土改法，除了正確地規定了有關於「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的一些辦法之外，并且也已正確地規定了「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具體辦法應該是：「所有沒收和徵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除本法規定收歸國家所有者外，均由鄉農民協會接收，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亦分給同樣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并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按照這種規定所實行的土地改革，爲的「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裡轉移到農民手裡，變爲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的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的可能性。」（「論聯合政府」）

五　關於富農經濟的保存問題

「發展農業生產，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滅封建制度，才能取得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報告」）這固然是製定新民主主義土地改革政策堅定不移的一個最最根本的出發點。但是封建地主的土地和農業生產必要的生產資料，既然作爲封建剝削的果實，予以沒收，爲什麼對於那些帶有半封建剝削性質的富農所有的土地財產，則不列爲沒收或徵收之例呢？最使人難解的是過去幾年東北和華北的土改，以及過去中共中央頒佈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却將富農多餘的土地和財產列爲徵收之列，而新的土地改革法則明確地規定：「保護富農所有的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及其財產不得侵犯。富農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以保留不動。」這是否新土改法所規定的土改政策比較過去有所退步了呢？不，富農經濟不應過早打擊的思想，這并非始自今日，毛主席在他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裡面早就指出：「中國的富農大多帶有半封建性并與城市資產階級聯繫着。但革命政府不應把富農看成與地主無分別的階層，不應過早打擊富農經濟的政策，因爲富農生產在一定時期中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公佈的「五四指示」中，也還規定不動富農的土地財產。但爲什麼一九四七年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却規定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財產呢？這裡的理由正如劉副主席所說：「在過去，在兩年以前，人民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還處在殘酷的戰爭中，人民力量還處在相對的劣勢，戰爭的勝負誰屬還沒有確定，一方面，富農還不相信

人民能够勝利，他們還是傾向於地主階級和蔣介石一邊，反對土地改革和人民革命戰爭；另一方面人民革命戰爭又要求農民付出極大的代價（出兵、出公糧，出義務勞動）來支援戰爭，以爭取戰爭的勝利。……在當時如果在解放區沒有一個最澈底的土地改革，不能充分滿足貧苦農民的要求，就很難克服當時所遇到的困難。」（「關於土地改革的報告」）

可是，現在的形勢已經與過去根本不同了。一則因爲戰爭已經在大陸上基本結束，打台灣雖然還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軍事上人民解放軍已有足够的力量去担負。現在國家的另一重要困難是在財政經濟方面；是恢復、改造與發展社會經濟。二則，富農的政治態度，一般地也比以前有了改變，在今天如果保存富農經濟而不動富農的土地財產，一般地是能够爭取富農中立的，并且能够更好地保護中農，除去農民在發展生產中某些不必要的顧慮。如同有些老解放區已經收得土改果實的農民，因爲不了解人民政府對於新富農的保護政策，他們一直是害怕上升爲富農，以致對於生產就不是很積極的。今後新區土改不動富農的土地財產，自然就可以解除農民的這一些思想顧慮，自然就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至於如何滿足貧雇農的要求問題，由於今日形勢的不同，也就是說由於全國的政權已經掌握在人民的手裡，當然就不難於另從其他方面來找得適當的補救了。因此，毛主席於「六六報告」上曾經肯定地指出：「因爲戰爭已經在大陸上基本結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況（人民解放軍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着生死鬥爭，勝負未分）完全不同了，國家可以用貸款方法去幫助貧農解決困難，以補貧農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們對待富農的政策應有所改變，即由徵收富農多餘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爲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以利於早日恢復農村生產，又利於孤立地主，保護中農和保護小土地出租者。」

爲什麼認爲國家貸款給貧農，就可以幫助貧農解決困難呢？很明顯地，貧農獲得國家的貸款，不僅可以解決農業生產的資金問題，俾其可以深耕細作，多施肥料，改良土壤，而且還可以將他多餘資金利用他自己的剩餘勞動力（即除去農作所餘的勞動力）從事副業生產。

「發展農業生產，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毛澤東）「土地改革的每一個步驟，必須切實照顧幷密切結合於農村生產的發展」（劉少奇）從這種原則的觀點來說，今後的土改對於富農經濟的保存，確實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因爲富農一般都佔有比較優良的耕畜，比較好和比較完備的農具，并且一般都有較大的農業投資，他們所耕種的土地（包括他們本身所佔有的和租入的），多半是鄉村中質量較好的土地。他們在生產技術上一般也是比較先進的，在富農經濟最發達的京滬杭三角地帶，很多富農使用化學肥料和戽水機，在一般地區，富農的土地也是耕作得比較細緻的。此外，在農村生產力還沒有得到更多的發展以前，富農也是餘糧最多的一種人，他們是商品糧食的主要供應者。正因爲富農經濟有這樣一些特點，所以在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以前，允許富農經濟存在和發展，對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不只沒有害處，而且有利。

富農經濟的保存政策，是否就等於要保存一部分的封建剝削，即保障富農之半封建的剝削而使其合法化呢？我們對於問題的看法，倒也不必那樣機械。舊式富農，在過去一般地帶有半封建剝削的性質，這是事實。舊式富農「大都兼收地租及放高利貸，其僱傭勞動條件亦是半封建的。」這也是事實。但在土改後人民握有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整個社會經濟又都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在這種情況下，舊式富農是可以改造的，其半封建剝削是可以不斷削弱以至消滅的。首先，在遵照人民政府規定進行適當的減租減息之後；其所收的地租和利息，勢必會逐漸削弱過去那種封建剝削的性質；在地租方面，一則因爲必須實行人民政府所規定的減租政策，二則因爲土改後的農民都已分得土地，故其對於承租土地的要求當然就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的迫切，所以今後富農出租部分土地的地租，就不會像過去那樣收取包括着全部剩餘勞動或全部剩餘價值在內，大體上只能够收取以額外利潤爲限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地租了。至於今後富農收取的利息，因爲有了國家對於農民的貸款，當然要限制農村高利貸的活動。至於舊式富農對於雇農之半封建的僱傭勞動條件，這在一般的貧僱農都已分得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後，即使仍有剩餘勞力須得受雇於富農，那就可能接受着城市勞資兩利政策的影響，逐步地改變封建性的勞動條件，而爲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勞動條件。所以，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對於舊式富農的土地及其財產的來源雖然是不加清算，但若就其今後發展的趨勢來說，很有可能逐步地被改造成爲新式富農。至於新式富農經濟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還有一定發展的前途，這當然是肯定了的。如毛主席所示：「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這種小的及中等的資本主義成份，其存在及發展，並沒有什麼危險。對於土地革命後農村必須發生的新的富農經濟，也是如此。」（「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明代蘇、松、常三府人民反官僚地主的鬥爭

丁易

一

明代蘇州，松江，常州三府，包括今天吳、吳江、崑山、常熟、嘉定、太倉、崇明、松江、上海、青浦、武進、無錫、宜興、江陰、靖江等十五縣。這一地區的人民，在現在一般人印象中都是文弱成風，缺少一種英勇强悍的氣魄的。當然，這印象也只是「印象」而已，實際上是並不正確的。在明代，這一地區人民，特別是蘇州，就曾掀起過很多次偉大的反官僚地主的鬥爭，其次數之多以及進行時的轟轟烈烈的情況，且爲有明一代其他地區所不及。

自然，這些反抗鬥爭並不是突然發生的，除了明代高度的封建專制集權政治的黑暗，以及官僚地主壓迫殘殺人民的暴行有以激成之外，還有其地域性的原因。

明代蘇、松、常三府在元末羣雄割據的時候，是屬於張士誠勢力範圍的，張士誠稱吳王，國都就在蘇州。張士誠人雖然糊塗，但究竟是私鹽販子出身，對老百姓的榨取，過不太過份。朱元璋把他消滅以後，這一地區的人民還有點懷念他。朱元璋一怒之下，便把這三府的田粮特別加重(註一)。計：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石，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石。那時天下田糧總數是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蘇州一府的田粮就幾乎佔天下田粮的總數十分之一，而據統計，那時蘇州府的田却只佔天下的田八十八分之一弱(二)。在這樣的高度剝削之下，人民自然容易激起反抗。這是一。

其次呢，蘇、松、常三府沿海瀕江，交通便利，物產富饒，是明代南方的大都市。工商業也特別發達，如明代皇帝龍衣的織造廠，在蘇州、松江兩府就是經常設立的，每處織造工匠都是千餘人(三)。其他手工作坊也很多。人口集中，聚會較易，這樣，便造成了人民集體行動的有利條件。這是二。

此外呢，這三府在明代是被稱爲「人文淵藪」的，所謂「人文」，實際上就是科第官僚出得多，這樣，對人民說來，便是所遭受的壓迫特別來得大，這也是激起人民反抗的一個因素。

由於這些原因，所以明代這三府人民反官僚地主的鬥爭次數之多，就爲其他地區所不及了。

二

先說反官僚的鬥爭：

明代這三府人民反官僚鬥爭發生在蘇州府城的共有五次，發生常州府江陰縣的有一次。

蘇州人民第一次反官僚鬥爭，是在明憲宗成化十九年(公元一四八三年)，對象是太監王敬及其走狗千戶王臣。事情經過如下：王敬和王臣借了替皇帝購書採藥爲名，跑到南方，到處索取財物，搜求奇玩。到了蘇州府，却異想天開，拿了幾十本妖書叫做什麼「子平遺集」的，「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賄，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學官。有生員王順等數十人大怒，適樵担至，遂各取一木，將擊臣，臣懼避匿，其下人皆被毆」(四)。這次反抗雖是生員們發動的，但這一反抗運動却也代表了人民的要求。

第二次反官僚鬥爭是在明世宗嘉靖二年(公元一五二三年)，對象是織造太監張志聰。明人朱國楨記這一事件經過甚詳：

「織造太監張志聰恣睢橫索，長洲(按長洲今併入吳縣)縣令郭波持法挫之。志聰忿甚，誣令撓御造龍衣，執而倒曳之車後。(縣尉蕭)景腆聞，領所部弓兵奪迫，直前手批志聰，落其帽。市民從旁觀者盡爲景腆張氣，梯屋飛瓦，羣擲志聰。志聰阻折去，竟奪令歸」(五)。

參加這次鬥爭的主要的是市民羣衆了。

第三次鬥爭是在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對象是織造太監兼管稅務孫隆。那

時孫隆駐在蘇州，帶了走狗參隨黃建節等，勾結地痞湯莘徐成等十二人，剝削機戶織工，勒索稅款，令每機一張稅銀三錢。於是織工大譁，家家罷工。由崑山人葛賢爲首，率領織工羣衆二千餘人，分作六隊，一人搖着蕉扇在前領隊，其餘的拿着棍子跟在後面，跑到稅監衙門，當場將黃建節打死，還綑綁了六七個稅官拋到河中，又放火燒掉地痞湯莘等的住宅。行動的時候紀律極好，對人民的房屋財產秋毫無犯。這點就是當時應天巡撫曹時聘在奏摺中也不得不承認他們「不挾寸刃，不掠一物，預告鄉里，防其燃燒，毆死竊取之人，拋弃買免之財」。甚至明神宗後來降旨也不得不說：「蘇州府機房織手，聚衆誓神，殺人燬屋，大干法紀。本當盡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懷一絲，只破起釁之家，不及無辜一人，……原因公憤，情有可矜」。那時當地官員見了這樣有組織有紀律情形，也有些害怕，於是長洲知縣鄧雲霄把湯莘逮了枷責示衆，蘇州知府朱燮元出來勸解，羣衆方才散去。而孫隆則早已嚇得逃到杭州去了。

孫隆事件發生後不過一年，即萬曆三十年（公元一六〇二年）五月，蘇州織工和人民又發生一次反官僚鬥爭，對象是太監劉成。領導這一鬥爭的是管文，神宗實錄云：「蘇松常鎮稅務改用劉成，因陸邦新等營幹機務，衆機戶嫉之。土人管文等藉口激變，煽衆搶掠，地方官擒治首惡，解散餘黨。」當時羣衆還散發有傳單，其中有「天子無戲言，稅監可殺」等語（六）。

蘇州人民第五次反官僚鬥爭是在明熹宗天啓六年（公元一六二六年）三月，對象是魏忠賢派往蘇州逮捕周順昌的東廠校尉。

周順昌是一個正直的人，疾惡如仇，得罪了魏忠賢，於是忠賢便栽誣他貪汚，派緹騎來逮他。那時魏忠賢屢興大獄，屠殺善良，特務縱橫，肆虐海內，人民已經恨入骨髓，於是便借了這事暴發鬥爭。東廠緹騎是三月十五日到蘇州的。領頭的是錦衣千戶張應龍、文之炳兩人。那幾天連日陰雨，景色慘淡，但是消息傳出去以後，蘇州各處人民，紛紛前來，據說「日不下萬人」，可見事件發生並非突然，前幾天早就醞釀了（七）。到十八日宣讀詔旨，地點在巡撫衙門裡，情況就非常緊張，據當時姚希孟目擊情況是：

「衆聞順昌將就檻車，傾城而赴。執香者烟漲蔽天，寃號聲音數十里。至使署，衆益集。門猶未啓。署逼城闉，衆登城林立，雉堞皆滿。香焚雨中如烈炬，城上下遙呼相應，聲震天。順昌出不意，再拜請解，衆不爲動。比一鷺與按臣徐吉至，命啓門，士民蠭湧人。堂上設幃幕儀仗，二錦衣列侍，羣尉鵠立指揮，堦下置扭鐐，爲被逮者蒲伏之所。衆悲憤」（八）。

這情況已經萬分緊張，當時生員文震亨、楊廷樞等便上前請求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暫時緩辦，但是緹騎們却「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鋃鐺於地，聲琅然。衆亦憤曰：『始吾爲以天子命，乃東廠耶？』譟擁大呼，勢如山崩」（九）。於是便發生一場大的鬥毆：

「衆怒，忽如山崩潮湧，砉然而登，攀闌折楯，直前奮擊。諸緹騎皆抱頭竄，或升斗拱，或匿廁中，或以荊棘自蔽。衆搜捕之，皆摶顙乞命，終無一免者。有蹴以屐齒，齒入其腦，立斃，疑卽李國柱云。其踰牆出者，牆外人復痛捶之」（十）。

這次大打以後，老百姓仍堅持不許逮周順昌，散發了許多傳單，貼在大街上。於是官方嚇得偷偷的把周氏藏到縣署，一方面宣稱「候旨始發」，藉以緩和民憤；一方面和周順昌暗下計劃，在二十六日夜間，由府縣調動水陸大兵，護送周氏及緹騎乘小舟由間道出滸關，緹騎們才算脫離了險境（十一）。

領導這次鬥爭是市民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五人，事後這五人爲不願牽連過多，便挺身出來自首，爲毛一鷺所殺（十二）。後來，蘇州人民將他們合葬虎丘之旁，題曰「五人之墓」，並且立了一個祠堂。

這事結束以後，蘇州人民還是憤怒不已，於是便倡議不用天啓錢，以示反抗，而且「各府州縣皆和其說，將天啓錢積下。後傳至京中，各省直出示曉諭，錢乃行，私禁凡十閱月」（十三）。

就在這一年同月，江陰人民也發生了毆打緹騎的事，那是魏忠賢派去逮捕李應昇的。其經過如下：

「李公被逮之日，未開讀先，當民一時集者數千人，與蘇州不約而同，欲擊官旗。知府曾櫻再三曉諭撫慰，始得解散」（十四）。

但是到了開讀詔旨那一天，還是出了事件：

「時至江陰逮御史李應昇，開讀時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執短棒，直呼入縣署，殺逆璫校尉，諸尉踉蹌越牆奔竄。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擧削蔗刀劘其片肉，擲以飼狗」（十五）。

「我恨極矣」，咬牙切齒之聲，儼然紙上，可以想見當時人民對統治的憤恨到了如何的程度，這不僅是賣蔗童子的呼聲，而是那時明代天下人民的呼聲了！

三

以上是明代蘇、松兩府人民反官僚鬥爭的情形，至於反豪紳地主鬥爭的事件則蘇，松，常三府都曾發生，從明世宗時起也有四次之多。

在未說這些事件之前，先概略地看一下明代豪紳地主在鄉里中橫暴情況，也許可以幫助瞭解人民的反抗鬥爭。

明代鄉紳在地方上是有無上威權的，即如他們可以隨便立法殺人一事，便可概其餘。明憲宗時的狀元永豐羅倫「請告里居，立鄉約以整頓風俗，其法甚嚴，莫敢不遵，獨有强梁二人不服，且屢違教令，乃命其徒共執投水中」（十六）。可以立法，可以殺人，這個威權還不是「無上」麼？

至於他們在鄉里橫暴情形，可以從明初「名臣」楊士奇和楊榮說起：楊士奇是泰和人，當他在宰相任上，他的兒子楊稷在家鄉就橫行不法，常常借故殺人。消息傳到京師，御史們提出了彈劾，但是皇帝還袒護士奇，不予懲戒。後來實在鬧得太凶了，泰和人民才揭發楊稷許多暴虐事件，其中人命案便是數十起。這回政府大概也覺得太不成話，才把楊稷逮捕下獄。泰和人民恨之入骨，於是便預爲祭文，歷數他的罪惡，各處散發（十七）。楊榮是建安人，他的兒子和家人親戚在家鄉凶橫不法，直到他死後，建安人才敢告發（十八）。楊士奇、楊榮都是宣宗、英宗時的宰相，到明世宗時宰相南海方獻夫，也是「家人姻黨，橫於郡中，鄉人屢告訐」（十九）。福建副使茅坤「家人橫於里，爲巡按御史龐尚鵬所劾，遂褫冠帶」（二十）。神宗時烏程尚書董份，祭酒范應期，里居不法，以致人民千人向巡按遮道訴寃（二十一）。熹宗時延綏巡撫董國光兒子「居鄉貪暴，民不聊生」（二十二）。莊烈帝時宰相王應熊的弟弟應熙「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一百七十餘萬」（二十三）。

這些貪暴不法的事實不外乎下列幾種：

一是爭搶田地，挾怨殺人。如：景帝時宰相陳循爲了葬自己太太，和家鄉人爭墓地（二十四）。武宗時宰相梁儲的兒子梁次德和另一富豪楊端爭奪老百姓田地，楊端把田主殺掉，梁次德一怒之下，竟把楊端全家二百餘人都殺盡（二十五）。梁次德更有一種滅絕人性的殘忍性格，便是歡喜用繩子緊縛人臂股或陰莖，使血液蓄積，然後突然用鐵針刺入，血液激射而出，高達數尺，他却拍掌大叫痛快（二十六）。

二是役使民工。如：武宗時宰相焦芳在家鄉泌陽建築住宅，宏麗萬分，動員好幾府民工來替他建築（二十七）。世宗時宰相張孚敬在家鄉每次修建亭樓都是役使民工（二十八）。「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於役者，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担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二十九）這個故事很有趣，但由此也可見鄉紳不僅無代價的役使老百姓，連磚瓦也是要老百姓供給的。

三是搶佔良家婦女。如神宗時尚書山西陽城王國光告休後年已八十餘，「時陽城民白好禮者病亡，其妻李氏國色也，王夙慕其艷，托諸生田大狩等誘以爲妾。其翁名白書仞，執不從。後以威脅，再以利動，遂許焉。李氏誓不更適，又力逼之，以刀刎死」（三十）。又神宗時祭酒宣城湯賓尹「先年奪生員施大德之妻徐氏爲妾，徐氏不從自盡，合縣不平，致激有民變。至是後佔生員徐某妻賈氏爲妾」（三十一）。

以上是明代地主豪紳橫行鄉里的大概情形，當時人民對這種橫行的反抗鬥爭，也是以蘇，松，常爲最多，最激烈。

明世宗時宰相華亭（按華亭今併入松江）徐階的家人在鄉里魚肉人民，無惡不作，當時華亭老百姓曾跑到他家門前，指名咒罵，其勢洶洶，徐階究竟是老奸巨猾，他知道和他們鬧起來，自己就要先吃眼前虧，便以謾罵不屑的口氣告誡家人說：「慎勿報復，譬如犬嚙人，人豈可嚙犬耶？必有人持杖擊之者」（三十二）。這樣總算沒有鬧出大事。

但到了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華亭人民終於掀起了一個偉大的反豪紳惡霸運動，這豪紳惡霸便是以「文采風流」自負的書畫名家董其昌。

董其昌是那時禮部尚書，和他的兒祖常，家丁陳明、劉漢卿、陸春、董文等，橫行鄉里，爲非作歹，是當時華亭天字第一號的惡霸。其橫暴情況據後來松江生員翁元升等申訴云：

「折東日用數十張，無非關說公事，迎賓館月進八九次，要皆漁獵民膏……謀胡憲副之孫女爲妾，因其姊而奸其妹；擴長生橋之第宅以居，朝逼契而暮逼遷。淫童女而采陰，干宇宙之大忌；造唱院以覓利，壞青浦之風聲。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遊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收納叛主之奴，而世業遭其籍沒；尅減三倉之額，而軍士幾至脫巾。……兼以惡孽董祖常，一丁不識，濫竊儒巾，萬惡難書，謀充德行，倚藉父勢，玩藐官

常。」（三十三）

這些惡霸行爲，華亭人民已經恨入骨髓，終於因爲一件事的觸發，而爆開一個轟轟烈烈的反抗鬥爭。

事件經過是這樣的：

當時華亭生員陸兆芳家有個婢女綠英，被董祖常奸淫後便想據爲已有。於是就於萬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一五年）九月間一個夜晚，祖常率領家丁二百餘人，拿着火炬、兵器，打進陸家，搶去綠英，並擄掠陸家財物，呼嘯而去。於是引起府人公憤，有些人就把這事編成「黑白小傳」，「五精八魂記」等小說曲本交給說書人錢二在街頭演唱。有一天，生員范𣉻也在旁聽唱，被董其昌僕人看見，便報告其昌，其昌便將錢二捉拿鎖打，並栽誣范𣉻主使，逼范和錢二跪在庭中。范回家後氣憤而死，這時已是四十四年三月初二日。及至初七日，范的母親馮氏妻子龔氏攜帶僕婦四人，到其昌家訴寃，不料其昌父子竟大出打手，「喝僕陳明、董文等將馮氏龔氏撇髻剝鞋，手毆廳前，急拖出外。二氏且跌且走，見而憐之者，扶掖至坐化菴中。其使婦四人，祖常俱紮縛之於太史椅上，剝去其褌，百般辱治，有不可出口者。又將自破蓬脚，每人亂打腿足，當時青腫寸許，反妄報府縣捕官，謂范氏登門打搶，及捕官至，只見馮龔二氏毀衣破面，蹲仆菴中，羞啼不勝而已。嚴知事至宦茶廳之後，猶見縛一少年婦女，去褌露醜，亟掩面而出。」（三十四）這樣，便激起全府人民的公憤，大家刊刻傳單，大書「獸宦董其昌」，「梟孽董祖常」，於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散滿街衢。兒童婦女也編出「若要柴米强，先殺董其昌」歌謠傳唱。甚至各地客商以及娼妓龜子游船等也印出傳單各處散發（三十五）。

那時人民雖然這樣激憤，但還是幻想官府來解決這事，但官府却迴護其昌，拖延不決。於是民怨益甚，日甚一日，到十五日，便開始行動，羣衆聚集街道兩旁，不下百萬，高聲喊罵，聲聞數里。董其昌看到事態嚴重，便雇了許多打手在家看守，於是老百姓也就動起手來：

「百姓爭先報怨者，至其門先撤去旗竿，防護者將糞溺從屋上潑出，百姓亦上屋將瓦礫擲進，觀者羣持磚助之，而董宦門道俱打破矣。百姓皆曰：『陳明橫甚，先破其居可也』。於是一人揮手，羣而和之，數十間精華廳堂，俱拆破矣。午後稍稍散去，至未申時分復集，欲起火燒房，而天適雷雨，百姓料雨可滅火，今夜無益，姑止之」（三十六）。

到第二天十六日，羣衆越聚越多，仍繼續行動：

「至次日十六日，百姓仍前擁擠。加以上海青浦金山等處，聞知來報怨者，俱夜早齊到。於本日酉時，兩童子登屋，便捷如猿，以兩卷油蘆席點火，著其門面房。是夜西北風微微，火尚漫緩，約燒至茶廳，火稍烈而風比前加大，延及大廳，火趁風威，迴環繚繞，無不熾焰。時百姓有赤身入火中，搶其櫈桌櫥椅，投之烈焰中以助火勢者」（三十七）。

第三天其昌第三個兒子祖源的房子二百餘間又被燒掉。羣衆在這三次行動中，秩序紀律都非常之好，對董其昌隣居的房屋，保護十分周到，「東邊唐宅楊宅，西坐化菴與王宅，俱大書此係某宅房，此係某姓房，又將燈籠高揭，樹立於屋傍，百姓見火稍侵及他家者，即羣爲救滅」。甚至其昌長子祖和平日行爲較好，他的房屋都沒有被燒（三十八）。

這次華亭人民對其昌眞是恨到萬分，連其昌寫的字扁也都一律劃毁。如其昌所居之樓自題「抱珠閣」扁額，就被羣衆投入河中，忿恨地說：「董其昌直沉水底矣」。坐化菴正殿上有其昌寫的「大雄寶殿」扁額，也被羣衆砍碎，說是「碎殺董其昌也」。有人拿了董其昌寫的扇子，立刻便被扯破。董其昌的字在忿怒的羣衆目中，竟成了骯髒穢紙了！

參加這一事變的，不僅是一般老百姓，也有大部開明士紳，像華亭縣生員們就曾共同具文爲范氏稱寃，但是眞正動手行動的，還是老百姓。

到了莊烈帝時，崑山和宜興兩地又發生人民鬥爭豪紳地主的事件：

崑山人民鬥的是宰相顧秉謙。顧是魏忠賢的走狗，回家後橫暴鄉里。莊烈帝即位，削職爲民。崑山人對他積怨太深，崇禎二年（公元一六二九年）便「聚衆焚掠其家，秉謙年八十，倉皇竄漁舟得免。乃獻窖藏銀四萬於朝，寄居他縣以死」（三十九）。

宜興人民鬥的周延儒及陳於泰於鼎兄弟。周延儒是莊烈帝時宰相，「其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爇其廬，發其先壟」（四〇）。至於陳氏弟兄，據明史載：「宜興故多豪家，修撰陳於泰編修陳於鼎兄弟尤橫，遂激民變，羣執兵鼓譟，其勢洶洶」（四一），並且和鬥周延儒一般，也燒掉了他們的房屋，掘開了他們的祖墓（四二）。

四

明代蘇松常三府人民反官僚地主的鬥爭已如上述，總起來看，這些鬥爭進行得轟轟烈烈，表現也很英勇，對當時官僚地主，的確是個沈重打擊，但由於

歷史條件的限制以及本身的弱點，也使這些鬥爭有些共同缺陷：

第一是領導和參加這一鬥爭的主要的是市民層，這一階層本身就缺乏團結性，浮動而不堅靱，當一個鬥爭開始的時候，由於浮動，所以熱情奔放，會忘其所以的轟轟烈烈地幹起來；但高潮一過去，眼看着統治階級的殘酷屠殺，便開始胆怯、恐怖了，於是這一階層所特有的一些猶豫、顧忌、自私等等劣根性就趁勢伸出頭來，開始把握不住自己而萎縮動搖，這樣的情緒自然是無法維持一個長期的鬥爭的。

第二是參加這些鬥爭的市民，在他們認識上，多半是從個人的復仇主義出發，所以他們只知道打擊直接加害自身的官僚地主，復仇的目的暫時達到，鬥爭也就跟着完結。由於當時的社會發展的經濟條件，他們固然不可能認識到要消滅官僚地主必須先消滅產生官僚地主的封建制度，但他們連支持官僚地主為非作惡的皇帝也沒有認清，所以他們在鬥爭過程中始終沒有提出推翻政府的口號，他們只是「民變」，而不是「造反」。

不過話雖如此，這些鬥爭終究是給當時的專制政治和官僚地主幾次嚴重打擊，它是歷史進化的動力，也是中國人民對統治階級鬥爭的寶貴傳統，今天研究歷史的人是應該予以特別重視的。

註：（一）明會要卷五十四
（二）顧炎武日知錄卷十
（三）明史卷一八三周經傳
（四）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十引寓圃雜記
（五）朱國楨湧幢小品卷十一
（六）神宗實錄卷三七二
（七）周順昌燼餘集卷四附錄姚希孟開讀本末
（八）同（七）
（九）明史卷二四五周順昌傳
（一〇）同（七）
（一一）燼餘集卷四附錄殷獻臣所著周氏年譜
（一二）毛一鷺是魏忠賢走狗，蘇州人恨之入骨，曾有人在他衙門鼓上粘了一副對聯是：「拔一毛一毛不拔，殺一鷺一路太平」。見吳應箕剝復錄上。
（一三）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七
（一四）文秉先撥志始卷下
（一五）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七
（一六）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卷二
（一七）參用明史卷一四八楊士奇傳二申野錄卷二
（一八）參用明史卷一五八魯穆傳陸深玉堂漫筆摘抄
（一九）明史卷一九六方獻夫傳
（二〇）明史卷二八七茅坤傳
（二一）明史卷二三五王汝訓傳
（二二）明史卷二九〇姬文允傳
（二三）明史卷二五三王應熊傳
（二四）明史卷一六八陳循傳
（二五）明史卷一九〇梁儲傳
（二六）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引朝野異聞錄
（二七）明史卷三〇六焦芳傳
（二八）野獲編卷七
（二九）文林瑯琊漫抄
（三〇）野獲編卷十一
（三一）文秉定陵法略荊熊分稿條
（三二）參用明史卷二一三徐階傳李紹文雲間雜識
（三三）民抄宦事實
（三四）同上
（三五）同上
（三六）同上
（三七）同上
（三八）同上
（三九）明史卷三〇六顧秉謙傳
（四〇）明史卷三〇八周延儒傳
（四一）明史卷二四五周宗建傳
（四二）明史卷二七五祁彪佳傳

關於中國原始藝術的發展

常任俠

一 勞動創造藝術

中國藝術，當它在原始社會中最初萌生的時候，便是與勞動的人民血肉相聯系的，這也即是說，由於勞動人民，纔創造了藝術。一切藝術的起源，均從勞動羣衆中間來，爲全體的經驗智慧所創造。伴隨着生產技術的進步，物質資料的豐富，藝術的成果，也從低級向較高的階級發育，而臻於成熟。

古代人類的文化，留下物質記錄，可以讓現在考察的，是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從舊石器時代的打製石器，進步到新石器時代的磨光石器，再進步到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這是世界人類社會勞動生產發展的規律。中國原始社會的歷史程序，便是這樣演進發展着。當古代人類爲了勞動的需要，選取一小塊岩石握在手裏的時候，用其尖利的一面，帮助工作，這對於形象便有了審辨。逐漸把自然的石塊，經過打製而成爲更適用的勞動工具，這便是造型藝術的開始。舊石器的石材，有顏色晶瑩，非常美麗的，則原始人除取其實用價值之外，對於顏色的美，質料的美，也已開始有了認識。由這樣的勞動工具，更發展成爲藝術品，如古代人的圭璋琮璧，起初皆是勞動用具的演變。這些原始人遺留下的物質資料，尙足供我們推考出它的原始形式。

在西歐有些地方，原始穴居人在岩洞中曾留下粗野宏壯的圖畫，以狩獵、戰鬥、牡牛和野鹿等等作題材；在中國這一類的遺品，現在尙未發見。從原始的繪畫演變而成的古代象形文字，中國卻有豐富的遺存。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給了古代文化藝術所蘊藏的物質以不少的收穫。殷代的社會，已到達使用着大批奴隸，從事農業種植和畜牧的生產工作，在那時，石器時代已成了尾聲，銅器的創造已有了光輝的成績，我們單從甲骨文字說，可知其爲原始繪畫晚期演進發展的結果。

甲骨文中的繪畫是豐富而多樣的，從太空中的日月星雨，到地面上的草木蟲魚鳥獸，水土田疇等等，都依類象形，一望而能辨別。當時由漁獵進入畜牧農耕，所以獸類的圖象，特別豐富；穀類的圖象，也已具備。獸類有馬、牛、羊、豕、鹿、犬、象、兎、熊、虎等等。牛馬羊等牲畜，由於牧養馴習，觀察更爲仔細，所以牛馬又各區別爲數種，馬的形狀，多到三十餘種，羊的形狀、則多到四十餘種，這一定是在勞動中觀察得很久，纔能畫出的成績。穀類有米、麥、禾、黍等圖畫，禾黍的垂穗之狀，維妙維肖，也應是長期勞動的農人所創作，與不辨菽麥稻粱者不同。甲骨文的『美』字，原從羊的形狀得來；甲骨文的『藝』字，便是勞動人民正在種植的姿態。牧人把自已畜養得肥大的羊子，描繪出來，便是『美觀』。農人把自已熟練種植的方法，描繪出來，便是『藝術』。『美』與『藝』從畜牧與農耕上有了具體逼眞的表現，可知其是勞動者的創造。古代的文獻說：『樹藝五穀』或『藝我黍稷』，這正是『藝事』的開端，是從土地上生根的說明。中國畫至今尙以線條爲基礎，也正是從原始繪畫演變到甲骨象形文字以來留給我們的方法。

二 由工具發展到工藝

最原始的藝術都是實用的藝術，由於勞動的需要，最早的藝術品的前身，便是勞動工具。到人類生活上有了餘裕，文化上有了進步，粗拙的生產工具，同時伴隨着社會發展，逐漸改良，細心打磨加工，以增加使用的效能。或更雕刻上圖案，銘記上文字，塗飾上顏色，嵌鑲上寶石，若是金屬的則更鍍上黃金的光，這個進程所費的時間是很長的。推原其始，最早製造的都是實用的工具。人類爲了狩獵與戰爭，而有兵器的製作，人類當發明用火煮食以後，而有容器的製作；爲了保護其生命與延續其生命，這兩種便是人類隨身的寶物，特加鍾愛。在中國古代流傳下的遺品中，以這兩類特多，便是這個原因。

中國最早的人類，就現在所能知道的，是在周口店所發見的『北京人』的

遺跡。在山頂洞所發見的穴居人類，他們便已知道裝飾自己，增加美觀。據裴文中氏的發掘，周口店山頂洞發現的遺物，除了許多打製的石器外，尚有堆積的鳥獸和魚類的骨，並有火燒的痕跡。這些鳥獸魚類，實爲當時人類主要的食品，由這證明在漁獵時代。當時人類使用的是打製的舊石器，去打擊鳥獸和魚類，用石刀剝開，用火灼燒，食其肉而寢其皮，生活是很簡單的；但在他們的遺品中，就有了裝飾品。 在山頂洞中，發現了用美麗顏色的石子，中間穿了孔，製成大的和小的佩飾，這也可能便是紡錘一類的勞動用具。他們更把獸牙、貝殼和魚骨，也都磨穿了孔，或利用原有的孔（如魚骨），穿成裝身的飾、品。又曾發現一塊磨過的赤鐵礦。很能推想出當時人類已經知道塗飾顏色的藝術。其中的獸骨也有着刻過的痕跡。根據這便留下最早的人類美術的記錄。

這裏引起我們可以注意的幾點：

貝類很早就成爲人類寶愛的東西，後來所謂『錫我百朋』，就是把成串的貝殼，用爲餽贈的禮物。其後把子安貝當作貨幣使用，大概也基於愛玩而成爲珍異貴重之物。古來從貝的文字，多是具有價值關係的。貝類的殼一直到今天還成爲人類的裝飾品，不過落後的民族多用其自然的形狀，而進步的民族則更加工製做而已。

當漁獵時代把獸類的爪牙作爲裝飾；一直到今天這風尚也還存在，落後的民族固不必說，就是今天的中國鄉村社會，把猪牙虎爪作爲兒童的佩飾，到處還不難尋見。據說日本的史前遺物，用做裝飾的『勾玉』，也是爪牙的變形。

火的發明與使用，在人類文化發展進程上，是一個重大的紀程碑，與現世紀發明電、發明原子能相等。人類對於火的驚奇與崇拜，據說一切古宗教多與火有關。有人且以爲基督教的十字，佛教的卍字，以及日爾曼人古宗教的卐字，都是鑽木取火的符號。至今奧侖匹克的神廟，尚保存着古代的火種，當作神聖的東西。當原始人敲擊石塊製造工具時，可能迸出火花；但中國自古相傳的燧人氏鑽木取火，比較正是一種可靠的取得火的方法。經驗告訴人類火如何可以去使用，有了火於是有了可以控制的光和熱，最初用以熟食和取煖，用以防禦野獸，其後焚林烈山，纔有了農耕的基地。陶器藝術與銅器藝術的產生，更是火的能力造成。

光與色的辨認，是人類視覺官能發展的成就。人類能使用色彩，也是由於悠久試驗各種有色物質而來。原始人所用的顏色，對比都很强烈，試觀史前的洞窟壁畫，可爲證明 。原始人的視覺與聽覺，都需要强烈的色調與音響去激動，遠不如後世人的視官聽官，日益發達，可以辨色審音，達於細微。强烈的色調與洪大的聲音，正是野蠻社會的特色，也是其共同的愛好。周口店的原始人，似乎已知道顏色的使用，但尚無更充分的證明。胡蠻美術史以爲人類愛好顏色，是經過了長久的羣體的部落的生活鬥爭，爲了標記着自己的一羣和敵人的分別，就如同現存的野蠻民族『紋身』的樣子，把有色泥土塗在身上（圖騰社會），遂漸發展了對於色彩的辨識，又遂漸形成了官感上的愛好，而推廣使用色彩到器物的標記上和裝飾上去。這也是一種解釋。在周口店原始人的遺物中，關於這點，尚無更多的資料，可以使當時的情況，更加清楚。

周口店的遺物中，還有『尖骨器』和『刻劃的骨骼』。據發掘者裴文中氏說：『周口店的骨器中，尚有尖骨器，和經過製作而用途不明的骨器如鹿角等。關於骨骼上有人工刻劃痕跡頗多，皆用途不甚明瞭。計有刮的平面，刮或刻的半圓形長溝，刻的三角凹入，及刻的深溝等；凡是這種刻劃的痕跡者，大概都是碎的骨器或裝飾品，現已不能推測原形，然可斷定是人工有意的製作。』（裴文中：周口店猿人之文化）胡蠻美術史對此亦有說明，他說：『這種「尖骨器」和「骨骼上的刻劃」同時同地的發現，給與美術起源以極重要的解答，「尖骨器」就是在骨版上刻劃線紋的工具；而那些「半圓形長溝」和「三角凹入」的刻劃，正是美術上之一種原始的形式。』這種『骨骼上的刻劃』，便是後期殷代甲骨文刻劃的濫觴，及殷墟發見的「花骨」的前奏。原始人把他的獵獲物吃了以後，把爪牙骨角保留下來作爲飾品，生活得到滿足，藝術也向高度發展，這正說明勞動創造了工具，創造了藝術，把人類文化發展向更高的階段。藝術從勞動中逐漸生長，這在周口店的原人遺蹟中，是給我們對於藝術起源的一些重要的觀察。

三 舊石器時代的工藝

由於周口店原人的遺跡，使我們知道從猿到人，文化漸進的狀態，和由勞動創造藝術的情況，在那時已經留下很可觀的成績。舊石器時代的遺物，散布於北中國的黃土高原者，還有多處。周口店的原人遺跡，考古學者稱之爲「舊石器時代的前期」，除此以外，還有法國人桑志華 (E. Licent) 於一九二〇年在甘肅慶陽縣北方，發現過屬於舊石器時代的石英岩裂片；於一九二三年他又與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在陝西榆林縣南方油房頭中衛等地，發掘出六個加工的石器石片，是用白色和灰色的石英岩製成的。此種遺物，大率皆從黃

上層之下的砂礫層發現。從石器的形式上看，却沒有發現石刀，與周口店舊文化的特質近似。發現的石器，甚爲豐富，雖沒有發現人類的骨骼，但可以認識這是原始人勞動中創造的工具。

關於「舊石器時代的後期」遺物，有桑志華於一九二二年在綏遠錫拉烏蘇河附近發現的舊石器，和他於一九二三年在寧夏附近鄂爾多斯部西南角的水洞溝、斯賈拉、阿索葛爾等地發現的舊石器和破片，其中大率爲細石器，黑色透明質的石英岩，與赤色的石英岩製成的鋼皮尖刄，硬度很高。伴出的哺乳類動物遺骨，如馬、羚羊、牛等甚多。在斯賈拉、阿索葛爾附近，發見了兩面雕刻的骨版，並且發見一顆人類的上大齒，已成化石，可以被認爲是第四紀人類的遺齒。在這些地區發見的打製石器，無論形式上和技術上，都較周口店遺物有很大的進步。勞動改善工具，正在一步一步成功。此外在東北一九三三年的發掘，在蒙古一九三〇年的發掘，在新疆一九二〇年的發掘，都有舊石器時代後期的遺物發見。在蒙古高原的呼倫貝爾、多倫諸爾所發見的細石器，其取材有燧石、瑪瑙、玉髓等等，有紅色、絲紅、白色、黑色、灰褐色、深蒼色的，還有帶着透明花紋的。色彩與樣式都很講究。從河源中去選擇石材的美，選擇各種顏色的美，選擇它的硬度，與打製的那樣精工，均係積久的勞動經驗，纔能有這樣的成績。這些細石器中，有石鏃、石矛頭、石刄、種種形式，用手工打製得如此完好，是一件勞做，戰爭、狩獵的用品，也是一件美術品，一直到今天，尚能勾住我們的眼睛，在這些物品上放出一種英勇的勞動的光。當舊石器時代以後，轉入新石器時代，人類的文化更加展放光彩，在工藝美術的成就上，也更加向前躍進了。

四　簡短的結論

憑藉以上的物質資料去觀察研究，使我們得出一些簡短的結論：最早的藝術是由勞動人民所創造。人類從勞動中創造了工具；又由工具的進步，發展而成爲工藝美術。有些工具和戰鬥的利器，本來是實用品的，漸漸的也加上了文飾色彩，進而演變成爲藝術品，從周口店山頂洞的原人遺物中，已有了穿孔的裝飾品，刻劃的獸骨，和礦質的顏色；從知原始人類在勞動過程中，觀察體驗，發現了美的諸韻律，以形體、線條、色彩、開拓了最初的藝術領域。原始的洞窟繪畫，在中國雖則尚未發見，但由原始的繪畫所演變發展出來的文字，如殷代的甲骨文，其中豐富的形象，已是推考從其以前的舊石器新石器時代的藝術，所給與的基礎：因此到銅器時代，纔能有這樣的成績表現。所謂『美』，所謂『藝』，原來都是畜牧與農耕中的具體事物。藝從農耕勞動中產生，美從畜牧勞動中創造，其與勞動的關聯，更得到確切的證明。勞動創造了人，創造了高級智慧的人，從勞動中創造的藝術，不斷發展增高，便是其智慧最好的表現。

（上接第二十五頁）

（三）「經驗的意識」和「先驗的意識」等等所處理只限於「經驗的對象」而不及於「先驗的對象」（物自體）

關於物自體問題，不想多說。就康德的知識系統：承認「物質在先」，即已承認了物自體（第一義）。他的「條件同一」的學說，應該包含物自體，它應該內在於對象的統一，而爲「先驗攝覺原始的綜合」所「綜合」，因爲現象與物自體並無原則上的分別（如恩格斯、列寧所指出）。然而康德是二元論者，知識的領域在他只是現象界，而現象背後的眞如界才是人類靈魂的故鄉它只能是認識的目的——永遠達不到的目的（不是認識的對象）「永遠做不完的課題」：它是「先驗的對象」（物自體）（第二義）：理念。在這裡康德碰到兩難境界，對於第一義之物自體說，他所持的知識是眞而不實，對於第二義的物自體說，其爲認識，實而不眞。眞而不實，是說，你所認識的物，是你所自家規劃的「物」，所以不够實在；實而不眞，因爲照你自己說法，你只認識了現象——現象後面還有實在（我，宇宙，上帝）；無實在的認識，所以不眞。他作前一種抽象論，因爲他恐懼物質，怕物質先於精神；他作後一種假設（第二義）因爲他恐懼上帝，因此造成了客觀實在的分裂（實在的二重性：於「經驗的實在性」之外，設不可知，只可信，不可見，只可思之「先驗的實在性」，也造成了「我」之分裂：經驗之我與純我之分裂，好像個體的我之上還有一個精神的我，替自然立法，飄飄於各個個體之我之上，指揮若定——黑格爾的「絕對的精神」爲康德「純悟性」與「直覺悟性」之合一，爲康德之唯心論的成見加重加深而已。

一九五〇，十，十六夜初稿。

「嘎達梅林」和「阿那爾漢的歌聲」

——略論兩篇民間記事詩——

臧克家

過去，我們對于少數弟兄民族的生活、遭遇、鬥爭等等的情況知道得眞是太少，也不够關心，這固然是由于相去的遼遠、生活方式的懸殊以及文化程度高低的參差，但主要的原因，得歸于國民黨反動派對他們的高壓政策，這不但不能使中國成爲一個多數民族手足情親的和樂大家庭，反而造成了疏遠、對立、仇恨，弄得彼此隔閡起來。我們也偶爾從報紙上得到一星半點的消息，那多半是他們的反抗運動爆發了，國民黨在動刀兵實行屠殺的時候。

至於文化、文藝方面的創造，不但沒有見過，幾乎懷疑它們存在的可能與程度，偶有機緣看到他們的一些文物展覽、聽到他們一二首情歌，都是以獵奇的心情去接受的。中國作家也有向蒙古取材的，那不過是爲了給自己的作品加一種「異域情調」引動讀者的好奇心，其實那也是百中無一，而且作者本人就根本沒有到過他在紙上寫得十分「動人」的那個地方，想從這作品裡窺探出弟兄民族的一點實際生活情況、苦痛與希望，那，等於白天做夢。

然而，到底我們聽到了他們的歌聲—內蒙古、維吾爾民族的心聲。我們從「嘎達梅林」（「人民文學」一卷三期）聽到了這聲音，我們從「阿那爾漢的歌聲」（「藝術生活」創刊號）聽到了這聲音。這幾乎是第一次聆聽這聲音，它那麼樸素、那麼有力，那麼富有磁性的一下子吸引住了我們。這聲音是這麼親切，這麼動人！我們聽到了這聲音立即從心裡響應起同情，如同最近在「音樂堂」前幾千人眼巴巴的望着穿紅戴綠的少數民族兄弟姊妹們立刻迸響出熱烈的掌聲一樣。

天地變了，生活變了，人也變了。然而今天的幸福並不是憑空掉下來的，是從被迫害、被剝削的長年累月裡走過來的，是反抗、流血、鬥爭的結果。

在今天的日子裡，想到了昨天；在今天的日子裡才有那份自由，自由的、公開的去唱出、去控訴那個石頭壓在頭頂上的昨天。

「嘎達梅林」是一首翻譯過來的內蒙民間敘事長詩，而「阿那爾漢的歌聲」却是一篇漢文的紀錄詩，（想也是經過翻譯的）雖然是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的創造，但我們讀過以後，很容易把它們聯系起來當作姊妹篇看待，在情節上，也有彷彿的地方，（在他（她）們將遇到不測的時候，同樣有同情者給他（她）們送消息；他（她）們同樣因爲被劫獄獲得自由，然後結合羣衆成爲反抗運動的領導人物，最後終於悲壯的犧牲作了民族英雄。） 如果是兩篇個人的創作，那可能有餘地叫我們想到它們之中的後來者容或受到了產生在先的那一篇的影響，尤其它們出世的年代是十分相近—— 陳清漳在「關於『嘎達梅林』」一文裡（同期「人民文學」）說「這故事發生在民國十幾年時」，而「阿那爾漢的歌聲」則是「一直流傳了二十多年」。可是事實上，彼此的影響或啓發作用是不可能的。因爲，這兩首詩都可以說是人民的集體創作，同時，它們又都是事實的紀錄。關於「嘎達梅林」的故事，寫了「開不敗的花朵」（也是以內蒙爲背景的）的馬加也曾在文章裡提到過它，足見它在內蒙流傳得是很寬廣的。

雖然事實是如此，但我們把它們聯系在一道的那個感覺却是極爲合理而且自然的。

首先，這兩篇詩的主題一樣是被壓迫的羣衆裡突出了英雄人物，起來領導他們武裝反抗壓迫者，不同的是維吾爾女英雄反抗的是楊增新及其爪牙馬提台，而內蒙英雄嘎達梅林反抗的是「達爾漢王」和張作霖。這同樣的主題不謀而合，正意義深長的令人意識到，在國民黨反動派大漢族主義的高壓政策下每個少數弟兄民族的命運是相同的—被壓迫、反抗、連失敗的悲慘結局也不兩樣。從這裡邊可以取得敎訓：反抗運動在它沒有和革命的主導力量取得聯系並作爲它的一部分的時候，反抗運動在沒有取得一個偉大思想作爲指導方向的南針的時候，這反抗是無力的，是注定了要失敗的。

這兩篇詩的結局雖然賺得了讀者對功業未成身

先死的男女英雄們的同情，因而增加了它們的感動力量，但這結局到底是不幸的，慘痛的，令人悲傷也令人扼腕的。

在結構方面講，「嘎達梅林」的情節更複雜曲折一點，讀它時候的感情也隨着故事的發展波動起伏。雖然「阿那爾漢」的父親同情他的姨子——一個可憐的老婦人對「阿那爾漢」唱出了：

「我們這一輩子的痛苦
使我們不能抬頭
掉下血的眼淚
能在沙灘上推動水磨」

雖然同情她們行動的「烏滋卡」也沉痛的唱出了下面的歌：

「馬大人家裡的金元寶
是窮人一輩子的辛勞
馬大人的肚皮很大
吃窮人的血總吃不飽」

但對於那個令人不能生活的環境，那壓迫者奢侈的生活與淫威，沒有「嘎達梅林」描寫得比較具體、比較深入——它用階級利害關係的一條線，把「達爾漢王」，張作霖，「台基」（貴族。同「嘎達梅林」一道去向張作霖請願，後來被收買又偷偷溜走了）串連起來，同另一個陣線——「嘎達梅林」和他的同志們被壓迫的人民羣衆，鮮明的成了對照。當然，在後一點上那兩篇詩的情節是相同的。還有，「嘎達梅林」是因爲目睹同胞們不堪的痛苦自覺的起來的，這同「阿那爾漢」被動的情況有些不同；「嘎達梅林」並不是一下子就拿起武器來號召向敵人反擊的，在幻想（進諫，請願）給釘子截破了之後，才走上最後的反抗之路的。這足够說明一個英雄和英雄事業的道路，也把那現實的眞實面貌和它的力量給我們畫了出來。

這兩篇不同民族的民間英雄紀事詩所以對於我們富有那麼大的吸引力和感動性，除開主題的意義之外，它們所共有的那一種傳奇味兒和特別情調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有些我們認爲不可能的，他們使它成爲可能，創造它們的多數人民的情感和心情，我們是十分了解也十分同情的。他了爲了使自己敬愛的民族英雄更凸出，更動人，就從他們的行爲裡抽出了一些平凡的——爲了顯出那些英雄的；他們同樣賦予自己英雄賴以行動的場所和事件以奇特的力量去配合，助成他們轟轟烈烈的功業，（世界上有名的民族史詩，往往是如此的）這些成分釀造成一種誇張的、傳奇性的味兒，使我們讀它們的時候從內心湧出一種昂奮的情感——既同情他們，又爲他們的冒險而驚心，爲他們的結局而悲憤。

另一種所設特別情調，是由於不同的民族性和不同的生活環境所製造出來的。我們試把這兩篇詩裏的兩個女性的性格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她們的特點來。

「喀什城一年到底是黑暗
今天才見了太陽
喀什城是一片沙漠
今天才開了鮮花
喀什城過着嚴冬
今天才是春天
因爲來了一個小姑娘
她是美麗的阿那爾漢」

這是阿那爾漢到城裏賣菓子（連一點爛了的果子也買了去他們還說「買不買是小事」，）衆人圍繞看她唱出來的歌。

「一千個麻雀一千顆蛋
一千個人
祇愛一個阿那爾漢
喀什城裏有一萬種花
祇有阿那爾漢
才是一朶永不凋謝的牡丹」

羣衆圍起這「民族之光」歡呼、狂歌、醉舞，像一團火一樣。讀了這些詩句，我們很自然的想到了「陌上桑」裏的羅敷，但她決不是羅敷。她是維吾爾的女英雄。

「大風大雪來自天山
吓不了我阿那爾漢
大戈壁的狂沙飛來
姑娘渾身是胆」

這是從她口裏唱出來的歌。我們再聽她唱：

「我的寶劍磨得雪亮
刺透壓迫者的胸膛
我的槍扛在肩上
描準剝削者那些魔王
我阿那爾漢
寧願死也不後退
除非喀什城裏
馬提台的棺材在戈壁中埋葬」

這歌聲就是發自那朶「牡丹」——阿那爾漢的口中嗎？是的，這些英雄的歌就出自那個美人的口。美麗、聰明、溫暖，這是她的一方面；雄壯、英勇、對敵人猛烈，這是她的另一方面，這雙方面合攏起來，才成爲一個偉大的性格（民族性格的集中表現），偉大的人格，才成爲維吾爾的「民族之光」，才成爲萬人寵愛的女英雄。

再看另一位女英雄——嘎達梅林的妻子牡丹。爲了親手去救她的丈夫，親自殺死了自己的心肝寶

貝——天吉良，同時放火焚燒了自己的老屋：

「十轉的匣子槍子彈壓滿槽，
有一顆給了孩子天吉良，
幾輩子的院子點起了火，
『浩林莫道』化成灰，自己的家鄉。」

這種行徑使我們憐憫（天吉良向媽媽乞命的唱辭是以使一顆鐵石心腸爲之粉碎！）更使我們驚奇！她有那些多的好鄰居，不可以把這個孩子留在那兒嗎？這些地方就正是造成特別情調的因子，它也表出一種倔强的民族性格來。她的這種不得已的悲痛、忍心行爲是有一個偉大目的支持着她的。她一心去救丈夫，去復仇，這種破釜沉舟的精神更增加了她的仇恨心，成爲今後行動的一條有力的支柱：

「不要多說費話，烏力吉巴圖，
我是殺了親生女兒天吉良出來的，
不要多說費話，哈斯敖其爾，
我是把全家都燒燬了出來的。」

這種倔强勇敢的性格也表現在一般人民的身上。當壯丹殺死了自己的女兒，焚燒了自己的老屋的時候，鄰居親朋們「都不服氣，決定聯合起來，要幫她一同去劫獄，救出嘎達梅林。

「馬羣裏挑胖馬牽了出來，
沒有槍的從姐妹那裏借來，
十幾個發誓的人一同前去，
去劫獄救出那嘎達梅林。」

這種見義勇爲的豪俠行爲給人一種崇敬的觀感，同樣情況也存在於另一篇詩「阿那爾漢的歌聲」裏，而且那歌聲也是極爲動人的：

「伊沙雅爾在牢裏
我們日夜不安
搶走了阿那爾漢
我們對不住祖先」
「河裏的魚要水
籠裏的鳥要飛
我們的阿那爾漢
拚命也要救回」

這兩篇英雄的歌並沒有留下作者的名字，它是這兩個民族的人民大衆的智慧的結晶，天才的表露，不但它們的主題、人物和故事使我們感動，就是表現了這些的形式——民歌，那一般新鮮、濃烈、素樸、天眞的氣息也沁人心脾的香。「嘎達梅林」用了很多的對唱，故事的進行藉助散文的地方也比較少，主要是四句一節，每行的字數也相去不遠，所以顯得頗爲齊整，令人在齊整中體會到它的莊嚴與精鍊；在和「嘎達梅林」比照之下，「阿那爾漢的歌聲」的形式就顯得更爲活潑與自由，它每一節的行數、每一行的字數都較爲參差錯落。例如：

「我們要戰鬥
打死馬提台這隻惡狗
不給他送羊
不給他送牛
要叫他餓死在喀什城裏頭」

這打破了兩句相聯四句一節的成例，第三四五句並排齊下越來越緊、越有力的（恰好表現出人民深沈的重重憤怒）逼出了最後的一句。

總之，無論從主題、內容或表現形式上着眼，這兩篇民間紀事詩都是頗爲動人的。它們是內蒙古、維吾爾弟兄民族的人民的心聲，這聲音一觸到我們心上即時引起一種親切的回聲，這回聲，迴繞、縈綿、好久好久不肯散去。

一九五〇、十月十五日

本刊三卷一期目錄

紀念太平天國

金田起義一百週年紀念　范文瀾
百年前的人民武裝組織——太平軍　劉桂五
太平天國革命人民如何對付外國侵略者　王忠

專著

關於幾個哲學問題　艾思奇
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與方法　王學文
馬克思的週期恐慌學說　樊弘
資本主義各國勞動人民的貧窮化　沈志遠
論「新解放區農業稅條例」　千家駒
肅清舊法學底影響　何思敬
國際法與侵略戰爭　梅汝璈
新中國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　何幹之
向蘇聯學習科學普及工作的經驗　袁翰青

譯文

論商品與貨幣（上）　吳恩裕譯
生產爲藝術的基礎　朱光潛譯
討論日丹諾夫關於亞歷山大洛夫西方哲學史的發言（座談紀錄）　中國新哲學研究會
關於「米丘林」選集（書評）　舒始上譯
學術文摘（五篇）
學術簡訊（十五則）

學術問答

〔問〕**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有那些根本的區別？我們今天還有研究形式邏輯的必要嗎？**

（常州　黃仲衡提）

〔答〕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的根本區別，按照列寧的說法，在於前者是低級的思惟方法，後者是高級的思惟方法。恩格斯在指出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的根本區別時，曾用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的關係來打譬，認爲初等數學是形式邏輯在數學方面的應用，高等數學是辯證法在數學方面的應用。

這是非常明確的說法，這種說法把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的互相關係及其根本區別都規定下來了。

爲什麼說形式邏輯是低級的思惟方法呢？因爲形式邏輯的研究對象是普通事物的最簡單的關係，這些關係是我們經常要碰到的，而且是在我們自己的生活實踐中重覆了不知多少億萬次，因此，恩格斯用『家事』來打譬，認爲形式邏輯認識的範圍，是屬於『家事』的範圍。對於這樣的事物的關係，形式邏輯的規律是經常在起作用，而且是可以達到它的一定的正確性的。例如，我們問：『美國是什麼國家？』我們只能答：『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在過去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在將來也必然要走到帝國主義國家的否定，變成社會主義國家；但在**此時此地**來說，美國**只能是**帝國主義國家，而不是別的任何性質的國家。又譬如，問：『你到什麼地方去？』只能回答：『我到天津去』，或說：『我先到天津，再到上海去』。你總不能回答：『我到天津去，同時又到上海去』。因爲到天津和到上海不能**同時**都去，只能在**不同的時間分開先後**的去。如果我們說：『我到天津去』，**同時**又說：『我到上海去』，這就把思惟的確定性破壞了，因此也就不能使人明瞭你到底是到天津去還是到上海去。在這場合，形式邏輯的規律是完全可以達到它的正確性的。

但如果把問題推向前進，提高到事物比較複雜、比較本質的關係上去時，形式邏輯便無能爲力，這時候，就須要應用唯物辯證法的規律才能達到思惟的正確性了。以上舉美國爲例。如果我們深入美國的內部，我們就看到美國作爲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充滿着矛盾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社會性的生產與私人性的佔有之間的矛盾，形成美國內部錯綜複雜的各種矛盾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美國不能不是一個「紙老虎」（像毛主席所說的），而且益走上它的崩潰的道路，而最後必然要被社會主義來代替。——對於這一切，就只能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才能作全面而本質的深入分析。

那麼，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是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爲在初級和高級之間，雖然有一定的區別，但這兩者却又是可以貫通的。自然，初級的思惟方法不能代替也不能包括高級思惟方法，但高級思惟方法却可以包括初級思惟方法，並須以初級思惟方法爲起點，在初級思惟方法的基礎上提高。

因此，形式邏輯的規律並不在唯物辯證法的規律之外，與唯物辯證法的規律相對立，而是在唯物辯證法的規律之內，作爲辯證思惟規律的一個簡單的必要要素（但不是唯一的要素），而爲唯物辯證法所容許。以上舉『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這個判斷來說，它是應用形式邏輯的規律所獲得的，但這個判斷，從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看，也還是完全正確的，因爲美國在此時此地之所以成爲帝國主義國家，正是由於它自身的社會經濟結構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

由此可見，把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當作兩種完全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對立的科學，是不妥當的，不正確的。同樣，把這兩種科學完全等同起來，或者平列起來，認爲可以互相補充，也是不妥當的，不正確的。它們的關係，應當是像列寧所規定的初級和高級的關係，而不能是其他任何別的關係。

對於這樣的形式邏輯，我認爲可以而且應當研究，作爲研究唯物辯證法的一種準備。研究這樣的形式邏輯，必然可以幫助我們用正確的思惟方法，達到對事物的正確的認識。

（馬　特）

〔問〕中國的農業稅和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初期時的糧食稅有什麼不同？今天中國和當時蘇聯的經經情況，是不是有些類似？（天津　蘇一民）

〔答〕中國的農業稅與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初期的粮食稅，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兩者同樣是要把國家所必需的粮食，作爲稅收徵收起來，而其餘的粮食，則用工業品去交換。自然，兩者的稅率是可能有輕重之不同的。蘇聯一九二一年的粮食稅，是用來替代軍事共產制的餘粮收集制的。所謂餘粮收集制即『從農民手中徵發了全部的粮食，甚至有時還不僅是餘粮，而是農民的一部分必需粮食。』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否則的話，蘇維埃政權『便不能在這經濟破壞的小農國家內，戰勝地主和資本家』（列寧）。由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國內戰爭，使蘇聯在革命後的生產力受了很大的破壞，再加以一九二〇年的歉收，更阻礙了蘇聯運輸業與工業的恢復。列寧認爲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首先要改善農民的生活。因爲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必需要有粮食和燃料，而要提高粮食產量，增加燃料的採辦和運輸，祇有改善農民生活狀況，提高農民的生產力入手。如何提高農民的生產力呢？他們就決定了改變粮食政策，即用粮食稅來替代餘粮徵集制，使農民在繳納農業稅之後，能有一部分在自由市場交換工業品。列寧說：『在小農國家實現自己專政的無產階級，其正確政策是要用農民所必需的工業品去交換粮食』，而『粮食稅是走向這種粮食政策的過渡』。當時蘇聯經濟受十月革命後長期戰爭的破壞，他們還不可能拿出工業品從農民那裡換取必要的粮食，粮食稅『就是要把最必需（對軍隊和工人）的粮食量作爲稅務徵收起來，而其餘的粮食，我們則用工業品去交換（列寧）。這就是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實行粮食稅的經濟背景。我們中國沒有經過軍事共產時期，因之也沒有實行過餘粮徵集制，我們的農業稅是爲着保障革命戰爭的供給，照顧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及國家建設的必需而徵收的。兩者在稅率上自然不會相同，但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即就其國家用稅收方式徵取農民粮食的一部分，而讓農民將其餘部分在自場出賣以換取工業品這一點說，是完全相同的。（千家駒）

〔問〕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的基本內容有那些不同？當一個國家違犯國際公法的時候，誰來執行國際公法上的規定呢？（濟南　馬必章）

〔答〕國際公法的任務，主要的是規律各個國家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它規律，例如，下列的事項，而這種事項都是有關各個國家間的權利義務的：（1）新國和新政府的承認，及承認的法律上的效果；（2）國家領土（包括領陸、領水、和領空）的範圍，及其取得和喪失；（3）國家的屬地主權的內容；（4）國家的屬人主權的內容；（5）國家間的交往和使節；（6）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7）國際條約的訂立，效力，和終止；（8）國際爭執的各種和平與非和平解決方法；（9）國際戰爭和中立。

國際私法的任務，主要在於解決一個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關係，應適用那一國或那幾國的法律，以資決定當事人間的權利義務。例如：設一個朝鮮男子和一個越南女子在中國結婚；在中國的婚姻法，朝鮮的婚姻法，和越南的婚姻法中，我們究應適用那一國或那幾國的婚姻法，以資決定這個婚姻是否成立和有效呢？假如這個婚姻是成立和有效的，那麼，這對夫妻間的身分上和財產上的關係，我們又應依那一國或那幾國的法律決定呢？在我們通常遇到的事件中，在中國舉行的婚姻，婚姻當事人也都是中國人；在這種情形，當事人間的婚姻關係，可被稱爲純粹「中國的」民法關係，因此我們當然應該適用中國的婚姻法，以資決定這種婚姻的是否成立和有效，以及婚姻當事人間的身分上和財產上的關係問題。但在這裡，婚姻當事人既是外國人，這個婚姻便是一個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關係（在這裡，婚姻當事人雙方都是外國人；但縱令婚姻當事人僅一方是外國人，而另一方是中國人時，有關的婚姻關係仍不失爲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關係）；因此，我們究應適用那一國或那幾國的法律以資處理上述的問題，便有疑問。解決這個疑問，是國際私法的任務。這裡我們可注意的是：不僅外國人在中國的行爲可發生國際私法問題，即外國人在外國的行爲，以及中國人在外國的行爲，也可發生國際私法問題。例如：設兩個外國人在外國結婚，或兩個中國人在外國結婚，他們的婚姻的是否成立和有效問題，如在中國法院中發生時，中國法院的解決這個問題，亦須根據國際私法。

依若干國際私法學者的見解，國際私法的另一任務，爲解決外國人的地位問題。依這見解，例如，在中國的蘇聯人或其他外國人有無購買房地產的權利，有無遺產繼承的權利，有無組織公司或設立工廠的權利等問題，亦屬國際私法的課題。其他學者更有主張國際私法法應包括國籍法問題的解決

者。我們認爲：這些問題構成國際私法的「毗連帶」，而不屬於它的固有領域。

國際公法是名符其實的國際法，因爲它的主體是國家，它所解決的是國際間的利益衝突，它的淵源主要是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國際私法則不然：它的主體，基本上不是國家而是私人，它所解決的基本上不是國家間的利益衝突，而是私人間的利益衝突，它的淵源，絕大部份不是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而是各國的國內立法和判例。故國際私法實在不是國際法而是國內法：中國有中國的國際私法，蘇聯有蘇聯的國際私法，各資本主義國家也各有它們的國際私法。它之所以獲得「國際」的名稱，只是因爲它所規律的民法關係，越出一個法律秩序的範圍，而與另一個或幾個國家的法律秩序相接觸的原故。

在任何國家內，設有專門負責制裁犯人的警察及法官。例如：當一個人違犯一國的刑法而殺死了另一個人時，該國的警察就會把犯人抓住，移送法院，由法官予以審判處刑。在國際間，由於各個國家都具有主權的結果，現在還沒有相當於各國國內的警察機關及法院。在聯合國中，有一個國際法院，可以受理國家間的爭執，但這個國際法院對於任何國家的具有裁判權，以該國表示願受其裁判爲前提。故這個法院與無須得到犯人同意卽可予以制裁的一般國內法院不同，至審判戰犯的國際法庭——例如紐倫堡法庭——不是常設，而是經過一次大戰後臨時設置的。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負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爲達成這個任務，它須執行聯合國憲章所定的原則及程序。但安全理事會組織並不健全，因此它容易爲美帝等國家所操縱。國際間現在尙無一支常備的國際軍以制裁違背國際公法而侵略他國的國家。國際間現在也尙缺少其他的執行機關，以執行國際公法的規定。在這種情形之下，當一個國家違犯國際公法時，除國際輿論有時可以發生制裁作用外（例如：保衞和平簽名運動的目的，卽在建立制裁侵略戰爭的國際輿論），執行國際公法規定的責任，不得不大部份落在受害的國家和同情於受害國家的國家身上。因此，當一個國家違反國際公法而侵害另一國的利益時，受到侵害的國家常以抗議，絕交，報仇，及從事自衞戰爭等方法對付違法的國家，以維護國際公法所賦與的權利，而結果國際公法的規則也就被執行。同情於被侵害國家的第三國也可以干涉（這裏指對於違法國違法行爲的合法干涉，而不是指，例如，美帝對於朝鮮及台灣的非法干涉），及支援被侵害國的自衞戰爭等手段對付違法國家，俾後者的違法企圖不能成功，而國際間的法治可以伸張。（李浩培）

浣溪紗

柳亞子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夜，懷仁堂觀各民族歌舞晚會，毛主席命題此闋，以紀盛况云爾。

火樹銀花不夜天。弟兄姉妹舞翩翾。歌聲唱澈月兒圓（哈薩克族有民間舞「圓月」演出）

不是一人能領導，那容百族盡駢闐？今宵良會喜空前！

編後記

第一期發刊後，我們收到一部分讀者來信，希望把長篇大文，稍加壓縮，騰出些篇幅，多登一、二篇現實性的學術論文，這點意見，是很寶貴的。所以，在這一期，我們對於每篇的字數，已儘可能做到了精打細算，關於紀念太平天國的座談紀錄，我們也割愛了一部分，敬希各方面的朋友能够鑒諒。

這一期和讀者見面的時候，對愛好和平的世界人民來說，適逢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三十三週年紀念；對我國新解放區的廣大人民來說，又剛好開始進行土地改革；柯柏年、王亞南、朱劍農和丁易四先生的文章，將幫助我們認識這兩方面的問題。

徐特立和嵇伯贊兩先生都於病後爲本刊撰稿，眞使我們覺到不安和感激。其他各位先生也都在百忙中賜稿，謹此一併致謝。

從本期起，我們增闢了「學術問答」，願意特約各科專家，爲讀者解決一些疑難。最近，我們已收到了一批問題，有些提得不够明確，問題又不集中。我們希望讀者所提出的問題，要具體扼要，不要在一個問題裡，牽涉到其它一連串的小問題。

下一期，我們還要新闢「學術討論」一欄，對一些重要的學術問題，歡迎各方參加討論，來培養和展開學術界自由討論的風氣。當然，我們的討論，是以追求眞理和服從眞理爲最高原則的。

譯文

科學和宗教

蘇聯·Б·А伯格達諾夫
周邦立 譯

近月來，各方對於宗教問題，都很關心。帝國主義正想利用教會，進行危害中國人民利益的活動。在這篇譯文裡，使我們對於宗教的本質，可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並可提高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警惕。

——編者

科學和宗教是兩種世界觀的型式，按照它們的本質來講，它們兩者不僅是互相有差別，並且是完全反對的，不兩立的，互相撕殺的。眞正的科學不論在過去和現在，始終依據着唯物論的世界觀，這就是說，這種科學把自然界觀察作和瞭解作它是一種具有眞實性的東西，並不靠了任何一種超自然的神秘的因素。也就是說，它並不用上帝這類東西來作世界的創造者和主宰的說法，去解釋自然界的現象。對於這一點便有一個最好的例子來說明，就是以前有一位學者拉普拉斯（Laplace）曾給拿破侖大帝一封覆信，他提出了在他的太陽系起源的理論裡，並沒有安插進一個上帝的座位在內，拉普拉斯對於這件事曾這樣說：『我並不需要這一種假話』。這才是一位眞正前進的學者的回答。

世界是不是上帝所創造出來的或者是它本身早已存在的——這正是各種世界觀的最基本的問題。恩格斯曾指出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是思惟和存在的關係、精神和自然界的關係的一個問題；他說：『這是關於思惟和存在相關的問題，就是一種基本的：精神或者自然界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違反教會的，是一種採取着尖銳形式的，討論世界是上帝所創造的呢或者是它早在創世前就存在的問題』（見「馬恩全集」，第十四卷，費爾巴哈論，第六四四頁）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有各種不同的標準，不僅有關於基本的哲學上的世界觀——唯心論和唯物論——方面，並且也有關於科學和宗教方面。哲學上的唯物論自從開始起直到我們這時代達到它的最高形式——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爲止；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始終是一種眞正前進的科學的象徵。而各種形形色色的哲學上的唯心論卻正是宗教的孿生兄弟們。列寧曾把哲學上的唯心論特稱做一種走向僧侶說教的指南或一種洗鍊過的、細琢過的僧侶說教。

遠在二千五百年以前，有一個古代的希臘哲學家，唯物論者和辯證法者格拉克里特·埃菲斯（Гераклит Эфесский）曾指出：『整個世界是一體的，不是任何一個神和任何一個人能夠創造出來的』。因此，列寧曾對格拉克里特的這個觀念作了很大的評價，說它「眞是辯證法唯物論基礎的一個很良好的敘述」，（見列寧著「哲學筆記」，第二九四頁，一九四七年版）

這一個用它本身來解釋世界，而不用一種片面的空想來解釋世界的原則，始終是眞正科學的基礎。在科學知識的逐漸發展中，它被加上了肉和血，採取了更加具體的形態，而排斥了各種不同的反科學的宗教和唯心論的觀點。

宗教和哲學上的唯心論，便和上面相反。各種宗教的主要教義，是承認世界是神創造的。恩格斯對這一點曾指出來說：『哲學家們所提出的，例如黑格爾所提出的世界的創造，較之

基督教正教所傳教的東西，具有着更多的愚蠢和紛亂的形態』。（見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論」即「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四四頁）。列寧曾把這一種玄妙而非物質的基礎所派生的，所製造出的東西來作爲自然界、作爲世界的說法而教導人們的哲學，特稱做一種最塑造的僧侶說教的哲學。『如果自然界是一種派生的』，列寧寫道『那末顯而易見，它只可能是從某一種比自然界更大的、更豐富的、更廣泛的和更強有力的東西所派生的。爲了要有這一種「產生」自然界的東西存在，它就必需獨立存在於自然界之外。就是說，有一種超自然界的東西存在着，並且它又能產生出自然界來。用俄羅斯話來講，這種東西就叫做上帝。唯心論的哲學家們始終企圖着來改換上帝這一名字的稱呼，把它揑造成一種抽象的、曖昧的、同時又是（對於蓋然性）接近於「心靈上的」，好像是「間接的綜合」好像是一種間接的原理，用不到證明的東西。絕對主義、宇宙精神、世界意志、和生理上相近的一種心理上的「一般的代用品」——這都是一種相同的思想，只不過是用了不同的形式來表明着吧了。』（見「列寧全集」第八卷「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第一八七——一八八頁）。

各種觀念論都是存在的反映、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反映。但是在人們的認識中，存在的反映由於他們的本性而可以有差異，並且在事實上也時常有着這些差異。有一種反映是直接的、積極的、正確的、越來越接近於，也就是符合於對象物的反映；例如全部眞實的科學、哲學上的唯物論以及現實主義的藝術等。但是也有着另一種性質的反映，歪曲而顚倒的反映。在這種反映裡，眞正的事物和關係便變成了脚朝天和頭頂地的東西了。這一種在人們的認識裡把事實造成歪曲而倒置的反映，便是各種各樣的宗教和哲學上的唯心論。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們把宗教規定做一種幻覺的反映，一種顚倒的世界觀。在反映外在現實世界的幻覺、倒置和虛像中，在對於超自然的本質的信仰中，恰正構成了各種宗教的觀念論的本質和特性。

恩格斯曾給宗教作了一個極好的定義。這個定義是：『……各種宗教並非別的什麼東西，正是一種在人們腦子裡，在他們整個一生裡所控制着他們的外界力量的幻覺的反映——把地上的力量看作是一種空虛的力量的反映』。（見恩格斯著「反杜林論」第二九九頁，一九四八年版）

在人類歷史的初期，這種反映出幻覺的對象物，首先是自然界的力量；但是後來隨着自然界的力量又逐漸地參加進了一種人類社會的力量，壓迫者的力量；這是和自然界力量一般使人們感到奇特而不能明瞭的東西。

所以，宗教的世界觀，按它的本質來說，是和科學所得的眞正知識毫不相同的，而且是澈頭澈尾地和這種科學知識相對抗的。科學作成了更加正確的、深刻而且完備的關於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知識。宗教却和它正相反地，在人們的意識裡放進一套千篇一律的幻覺的虛構，神話和傳說等等，把它們揑造做眞理，好像是「神」親自報導給人們的眞理。這些「眞理」正適宜地配合着人類在歷史初期，所發展着的水準。恩格斯說，宗教生根在野蠻時期人們的有限而粗淺無知的想像裡。他曾寫道：『宗教是在原始時期中，從人們對自己本身和對外在自然界的最愚昧而原始的想像裡所產生出來的』。（見「馬恩全集」第十四卷「費爾巴哈論」第六七三頁）

因此，宗教無論按它的起源，無論按它的內容來說，總是一種上古時代的殘餘。因爲在那個時代中，人們還不能獲得對他們四周世界的科學知識 。可是，爲什麼這一種殘餘會這樣活躍起來呢？爲什麼它還能維持一千多年呢？作着宗教禮拜的僧侶們和信徒們就把宗教存在的古代和永久性來引用做它的眞實性的證明。可是這一種「論斷」却經不起批判。這些偏見和迷信是不是能在人民中存在呢？難道這就可以證明它們的眞實性嗎？

宗教所以會活躍起來，首先就是因爲在階級社會裡，它受到了剝削的統治階級的支持和扶植。宗教是有利於剝削階級的，它正是一種「駕馭人民的繮繩」，一種剝削者的統治工具。列寧曾教導說：『宗教主要地具有着社會的基礎。』又說：『宗教對人類的壓迫，祗是一種在社會內部的經濟壓迫的結果和反映吧了』。（見「列寧全集」第八卷「宗教和社會主義」第四二二頁）

馬克思曾指出宗教對社會的作用，認爲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他曾寫道：『宗教——這是壓迫者的謊話』，無智的世界觀無理性的不合時宜的精神。它就是人民的鴉片』。（見「馬恩全集」第一卷第三三九頁）

列寧認爲在宗教問題上，馬克思的這一種觀點，正是整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一塊奠基石。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就因爲它用一種無孔不入的偏見毒害了勞動者們的意識 ，使用在「彼一世界」中的天國生活的神話來禁錮人們的意志，並且引誘勞動人們脫離開眞正在地球上的，爲良好生活而進行的現實奮鬥。列寧曾把宗教的社會作用和基礎，赤裸裸地描寫成下面的一些字句：——

『宗教是一種隨時隨地依附在人民大衆身上的精神枷鎖，用永恆的著作（經典）來壓迫着那些孤獨而貧困的人們。被剝削階級在和剝削階級的鬥爭中的軟弱無力，也會不可避免地產生出對來世有良好生活的信仰，正像是「野蠻」

人民在和自然界鬥爭中，軟弱無力地產生出對上帝、偶像和對奇蹟等等的崇拜一樣。宗教强調着那種一生勞動着和貧困的人們，要在現世的生活中馴服和忍耐，用一種進天國的希望，來安慰人們。而對於那些專靠剝削別人的勞動而寄生的人們，宗教便稱許他們要在現世的生活中行善，並向勞動者建議，要他們廉價式地忍受一切剝削，並且用同樣低廉的價格，出售可以享受天國幸福的入場券。宗教是一種精神上的劣酒，在這種劣酒中，使那些爲資本家服務的奴隸們沉沒了自己的人的形象，忘却他們本身對於人類應享受的一些生活上的需求』。（見「列寧全集」第八卷「宗教和社會主義」第四一九頁）

斯大林同志曾說：『宗教的偏見是反科學的，因爲任何一種宗教，都是和科學發生衝突的』。（見「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二，一三三頁）

宗教對科學的仇視，就早表現在最基本的關於人的創造和關於第一批人們的罪行的宗教傳說裡面。在這裡面，很重要地叙述了這種罪行是怎樣構成的，上帝爲了這種罪行而懲罰大家，使人們一生永遠當着奴僕，使男人們滿面流汗地去獲得麵包，而使女人們痛苦地去養育子女。在聖經裡，在那些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聖書裡，就載着這些說教。上帝在創造了第一對人——亞當和夏娃以後，便把他們二人送到樂園裡去，送到一個美麗的花園裡去。上帝曾在樂園裡種植了二棵樹。他給亞當和夏娃一道極嚴厲的命令說：『不准採摘和吃食這二棵樹上的果子』。一棵樹便叫做「生命之樹」；吃了這樹上結着的果子，便可以使吃到的人，變成像上帝一樣長生不死。另一棵樹叫做「明善惡的智慧之樹」；咬吃了它的果子的人，便能够變成像上帝一樣聰敏和全能。於是按照聖經的說法，第一批人的罪行，也就是亞當和夏娃所開端的。由於夏娃受到了蛇形魔鬼的教唆，跟着亞當也聽了夏娃的話，二人便一同勇敢地去吃了「智慧之樹」上的果子，而造成了這種罪行。

宗教向人們教訓道：『智慧的開始——就是主的恐怖』；因此對於知識的渴求，便是一種世俗的、對上帝不利的事業，是人類驕傲的表現；人們應該忽視對世界作科學的認識，而只要關心靈魂的拯救和來世的美滿生活就行了。

也就從這個時候起，誕生了科學，在科學和宗教中間始終進行着不調和的鬥爭。在這個鬥爭裡，對科學和科學家的情勢，首先是很不利的。因爲在宗教和它的僧侶們——一方面正有着——就是到現在的資本主義國家裡也還存在着——一種議會式的「最高權力機關」。在那時候，不僅僅是反對宗教和教會的一種直接行動，不僅僅是公開的表示懷疑，不信仰和無神論，甚至連極起碼的「自由思想」，不遵守教條和教規，也要受到裁判和嚴厲的處罰。例如最重的罪行，便要判作「異教徒」而處以死刑：上絞架或斷頭台，或用火活活燒死。在西歐的教皇統治時代中，爲了對「異教徒」的鬥爭，就是對一切參加或表示反抗宗教和教會的人們的鬥爭，便設立了宗教裁判制度，就是一種以它的殘酷而出名的特殊的審判機構。對異教徒的判決總是寫着：『把犯人交付議處，讓他們溫和地，毫不流血地給他處罪……』。這一個僞善的公式便表示了：要把犯人活活燒死。因宗教裁判而犧牲的人有數百萬。在意大利各地的宗教裁判幹得特別凶惡，祇在托爾克維馬特的一所「天主教裁判法庭」中，就已經活活燒死了八千多人。這一類宗教裁判所並不專門屬於天主教會，同時也存在在新教（耶穌教）和希臘正教的教會以及猶太教的團體中。

在「異教徒」——宗教裁判的犧牲——中間，有不少的殉難者是偉大的科學人物。在這裡，僅能舉出幾位有名的人物。恩格斯曾指出，自然科學所以能從神權的世紀中解放出來，脫離「神學的奴婢」的地位，是在尼古拉·哥白尼的不朽著作「天體運行論」一書出版這一天（一五四三年）才開始的。哥白尼本人，是一個天主教徒，出版這本書的時候，他已快死了，所以宗教裁判所沒有把他處刑。而哥白尼學說的後繼者們，便在幾世紀中遭受到嚴酷的刑罰。今年二月十七日就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兼唯物論哲學家，哥白尼的後繼人，白魯諾（G. Bruno），在羅馬被判處火刑而燒死的三百五十週年。偉大的科學家伽俐略曾爲了鼓吹和用實驗證明哥白尼的宇宙系統而兩次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拘票，雖然沒有被判處火刑，却要他宣佈和哥白尼的「異教」斷絕關係。

到今天，羅馬的神父們仍舊出版着那種禁止正統派的天主教徒們去閱讀的「禁書目錄」。

在西歐，不僅是天主教會對科學和學者們進行着迫害，並且也有新教的教會。而在俄羅斯境內，便是希臘正教的教會。加列文教的新教徒們，就曾燒死了自然科學家米哈伊爾·謝爾維脫（Михаила Сервета）。猶太教教徒們曾長期迫害一位無神論的哲學家烏里葉爾·達可斯特（Уриеля Дакост），折磨他而使他走到自殺的路上去。

教徒們在他們的壓力下，曾迫害過俄國的偉大學者羅蒙諾索夫（M. B. Ломоносов），爲了他是一個唯物論者和曾要求神父不去干涉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事業，正教的僧侶階級尖銳地站立在保護他們自身利益方面，並且迫害着各種「異教」和自由思想，尤其是對付直接衝突的無神論。哥白尼的太陽中心學

就在我國境內一直到十八世紀都是被禁止閱讀的。進步的學說和理論始終遭受到教徒們的種種迫害。在一八八九年，帝俄時代的「教務院」的檢察總長波貝特諾斯契夫(К. П.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正式宣佈謝恰諾夫(И. М. Сеченов)的有名著作「大腦反射」一書和他的其他著作是有害的；而彼得堡的希臘正教大主教更進一步要求沙皇把謝恰諾夫充軍到沙洛維茨基修道院(Сблове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去。由於僧侶集團的要求，曾把米契尼可夫(И. И. Мечников)所著的「四十年來對合理的世界觀的探究」一書禁止出版。

但是隨着時代的變遷，這種作用逐漸改變了。科學愈來愈從宗教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不再成爲「神學的奴婢」，並且以無比的飛躍向着科學進步的道路邁進着。科學的原理更加日甚一日地驅逐了虛幻的宗教的偏見，暴露出它們的愚蠢和毒害。宗教的維護者不得不轉向防衛科學的攻擊了。宗教和它的僧侶們被迫向科學低頭，把自己的「學說」來適應科學。例如，聖經上關於上帝在六天裡創造世界的神話，就被解釋作創造世界的一日並不是普通的一晝夜，而是一個地質時代；對於聖餐式以及對於把麵餅和酒轉變成基督的聖體(麵餅)和聖血(酒)的神秘「解釋」，便附會到化學上去，等等。

在神父的京城梵帝岡裡，現在還存在着一個「科學的神學院」。這件事提出來，眞是不倫不類的。從這類的事實，正證明着它(宗教)正在研究用什麼東西和什麼方法穿鑿附會到科學問題上去。當量子論公佈到世界上來的時候，「科學的神學院」便乘機提出了一個懸賞一萬里拉(譯註：里拉是歐洲大戰前通行的意大利銀幣，每個曾值87.5戈比)的獎金來，『徵求關於量子論在物理中的最優秀的批評著作，要含有對神的量子本質的指示』。神父的「學院」把這類提議毫不羞慚地也寄送到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來給我們看。

在宗教所要求的僞造科學的事業中，不僅有教會的僧侶們在活躍着，並且也有無數資產階級學者們出身而獲得獎狀的教徒們的僕從們在活躍着。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科學和文化的情況，正反映出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危機。它們正在腐朽中。在美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觀念論和科學中，目前正加强扶植着一切可能的反動觀點和「理論」，倡導着各色各樣的神秘宗派和直系的僧侶集團。甚至把世界上學問最淵博的學者們，例如A.愛因斯坦，也歪曲地描寫作擁護科學和宗教聯盟的人物。還有些人，更直捷地把最新的物理發現敘述成爲宗教的證據。例如，根據了海森堡.愛丁頓的「測不準原理」，便宣佈說，從一九二七年起，就是從量子發現那天起，宗教便對有理性的人類來說，是能够存在下去的了。

資產階級的學者們，正特別狂熱地參加着反抗在科學中的唯物論，反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哲學。科學的任務便被宣佈作並不是客觀現實的認識，而祇是它們中間有機聯繫的現象和規則。他們正作着原子不是一種物質的說教。電子在它們的轉換中，便被解釋作意志的解放。他們進行着反對因果律，規律性的原則，而這些原則正是解決着各種科學的途徑。他們確證着宇宙的終極性、有限性；甚至推算出世界的創造，也正是在二十億年以前。顯而易見，全部這些說法祇能使宗教的教徒們藉此聊以自慰吧了。

在一九四七年，A.A.日丹諾夫在出席哲學討論會時曾說：『現代的科學正配備給僧侶集團們一種新的論證的信仰哲學。這種信仰哲學是必須無情地予以揭露的』。他同時也强調說：『一切反動的和極端反動的力量在今天正在爲反抗馬克思主義的戰鬥而服務着。資產階級哲學的武器，原子武器加上金元的「民主政治」的效忠者們，便把那些被修理好的極端反動思想和教徒集團——梵蒂岡和人種學說——的盔甲等等都重新請到世界上來和應用起來了。此外，還有狂暴的民族主義和年久失修的觀念論的哲學；還有受到收買的黃色刊物和頹廢的資產階級藝術』。(見一九四七年第一期「哲學問題」雜誌第二七一頁)

首先，在我們的陣營中，必須對滲入科學中的一切那些神秘主義的東西和僧侶說教的東西作不能兩立的鬥爭，正因爲我們蘇聯是一個最前進的科學和文化的國家。這種科學和文化已成爲全體蘇維埃人民的財產。

在資產階級國家中，前進的學者們在過去和現在正不斷英勇地大聲疾呼着他們的擁護辯證唯物論的呼聲。在這些對抗着反動勢力和極端反動思想的戰士們中，最能使人讚揚的學者，是法國已故的郎之萬和現在的約里奧·居里夫婦，英國的勃拉凱特和貝爾納等人。

我們的國家正在逐漸地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在這個時期中，剷除資本主義在人們意識中的殘餘，例如那些像宗教之類的野蠻無知的殘餘，對於勞動大衆施行共產主義教育方面，正具有着一種非常重大的意義。和宗教的偏見作鬥爭，宣傳科學和無神論，便是對蘇維埃人民大衆的共產主義教育方面的一個牢不可破而且十分現實的部份。全蘇聯政治及科學知識普及協會，也正在這一方面盡力服務着。(本文譯自一九五〇年二月號俄文版科學和生活)(Наука и Жизнь)第三四——三七頁)

論商品與貨幣（下）

約翰·伊頓等著
吳恩裕譯

貨幣：一種普遍可交換的商品

可是，在古代，不僅是拿某一種特殊的商品來估算物品的價值，而且人們逐漸趨向於用物品專換取那種旁人能够，並且也願意，拿到交換場所來的商品。以物易物是商品交換的一種最古的方式。這種方式的範圍有限，機會也較少。一個農人，當他能够這樣做的時候，他就要賣掉他的農產物；而且，儘管他最終的目的是要買布或鐵，可是他常常是把他的穀物或菓實換成牛，準備在有利的機會來到的時候，再拿牛換布或鐵，事實上，在由以物易物的交換方法過渡到新的交換方法的期間，常常發生這種中間性質的交易。在早期的希臘（約紀元前一〇〇〇年），用牲畜進行交換（同時也把它們當作衡量其他商品的尺度），是相當普遍的。被人們這樣使用的一種商品，它的作用就是當做交換價值的一種暫時的貯藏所；同時，在出賣剩餘生產品和購買要利用其使用價值的商品（如穿的布，吃的糧）的空隙時間，它也發生着橋樑的作用。

在這種方式下，由於商品交換的發達，交換的方式就進步到超過簡單的以物易物的方式了。（註一）這種能够普遍交換的商品，這種當做賣出和買進之間的「媒介」的商品，也就是，當做價值的尺度的商品，就叫做貨幣商品或簡單一點說，叫做貨幣。

為什麼把稀有的金屬當做貨幣使用

當然，牲畜並不是一種很實用的貨幣。在過渡期間，它能够多少發生一些貨幣作用。但是當貿易發達以後，牲畜和其他被世界上某些地方當做貨幣普遍使用的一些商品，如獸皮等，就得被另外一種比較適合的貨幣商品所代替了。

菲尼基人，希臘人，埃及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在紀元數百年前，就發展了相當程度的海外商業。第一，對於這種商人，運輸那些當做一種交換手段的牲畜，是辦不到的。假如沒有一種更方便形式的貨幣，那麼貿易就沒有方法進展了。其次，一羣牲畜固然可以分成幾頭羊或牛，但要把「頭」再往小分下去，就不可能了。再次，牲畜還得飼養，照顧等等。一種合乎理想的當做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貨幣，必須是一種易於運輸、不易損壞、並且全然可分割的東西。

金屬，特別是稀有金屬，如銀和金，就具有這種可以當做貨幣的屬性。即使生產很小重量的金，也需要很多的勞動時間。因此一小塊的金，就包含着很大的交換價值。況且它又便於處理、攜帶和收藏。金又是可以分割而不會有所損失的。所以，一塊金裡所包含的交換價值，可以很直接簡便地由它的重量計算出來。實在，照我們下節所舉的一些理由，金是異常適合於担任：代表其他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商品，這個任務的。

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

當人們做工的時候，他們同時是在做兩件事情：第一，他們是在做某種手藝或行業（如木工製造椅子桌子，紡織工製造布疋）；第二，他們構成了一個社會總勞動力的一部份：這個社會總勞動力在生產中的集體活動，就供給這個社會以所有其『生活上的必需品和便利物』。當人們做木工或紡織工時，他們是在做一種生產某種使用價值（如桌、布）的特殊的工作（具體勞動）。可是

，如果把他們的勞動力當做全社會總勞動力的一部份，那麼就得把他們的勞動視爲一般的勞動（註二），而不涉及那項勞動的特殊性質或目的，也就是說，把它當做抽象勞動。

在交換的過程中，是要把不相同的生產品或不同類的工作的價值，彼此加以比較的。但祇有在它們是相同的前提下，它們才能被我們加以比較。因此，一羣人所生產的價值（交換價值）較多或較少，就要看他們的勞動能够構成較大或較小部份的「社會勞動」而定。也就是說，把所有一切從事生產的工人們的努力，都看成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在創造交換價值的時候，是何種特殊性質的工作（具體勞動），倒沒有關係；有關係的是：在做這種工作中，一般的勞動（抽象勞動）是支付在裡面了這件事實。抽象勞動這個名詞就描述一切生產性的勞動中的同一的東西——或「共同的成分」。把它叫做抽象勞動，因爲它是把每個人的工作的特殊性質（木工、機器工、或五金工），「抽出來」、或分出去，的結果。這種特殊的性質對於創造交換價值是沒有什麼作用的。我們在這裡祇注重那種相同的成分，亦即，這相同的成分是一般的勞動這件事實。正如金幣和銀幣都可以被鑄成各種不同的形態（例如圓的或方的）和不同的數量（如一兩或一磅）一樣，勞動也可以採取形態上的不同（木工或織工）和數量上的不同（一天或一小時）。在勞動裡也和在金裡面一樣：在它們不同的形態之中，都永遠具有這種使我們能够加以比較的共同的成分存在。

當金和銀逐漸廣泛地被用做交換的媒介之後，那麼商人們頂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知道：他們在交換物品中換取的金或銀的確實重量和品質。這種核對重量和考驗品質的工作是很麻煩的，而且有時是很困難的。爲了節省麻煩和冒險，便把一塊一塊具有標準重量和品質的金屬加上印記，這樣就等於有了公共權威的保證。這就是遠在鐵器時代初期就發生、直到紀元前第八世紀還流行的硬幣（參看革登・齊爾德著：歷史中有些什麼事件，塘鵝叢書版，頁二三和頁一七一）。並不像人們有些時候所設想的：金是由帝王的想像、或其他魔術，而賦予一定價值的。使金成爲度量其他商品的價值尺度、和交換手段的，乃是生產金所必需的勞動時間。

熟練和非熟練的勞動

金的成分或成色是不同的（十二克辣，十八克辣等。譯者註：克辣英文爲 Carat，俗稱「開」）；可是同樣，勞動的熟練程度也是不同的。在這一點上，金也可驚地反映着「創造交換價值的那種實體」，亦即，抽象勞動的性質。正如一塊塊不同成色的金可以使其相等（二兩十八克辣的金等於三兩十二克辣的金）一樣，在交換的過程中，也可以使比較熟練的勞動和比較不熟練的勞動相等。『熟練的勞動祇被看做是强化的或加倍的簡單勞動。一定量的熟練勞動可以被認爲和比它量大些的簡單勞動相等。……以不熟練的勞動爲標準，把各種不同的勞動，都計算成爲這種簡單的勞動的那些不同的比例，都是由生產者們背後所進行着的社會過程確立的，因此，也就像是由於習慣確立似的』。（馬克思，資本論，卷一，頁十一——十二）

可是，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大部分勞動力是由不熟練的工人們消耗在例行的動作上的時間而組成的。他解釋說：把不同類別的勞動，核算成爲一致的、相同的、品質上同一的簡單勞動，似乎祇不過是個抽象作用；但是，他接着又說：『這可是在一切社會生產過程中，天天發生着的抽象作用：……（它）眞正存在於一定社會裡平均每個人的平均勞動之中——一定量的人類筋肉、神經、腦力等的生產性質的支付。每個平常人都能做、並且在一種或別種方式下所必做的祇是簡單勞動……簡單勞動構成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用的大部份勞動』。（政治經濟學批判，頁二五）

價格與價值

一個商品表現在貨幣中的價值，就是它的價格。在起初，商品的價格就是那含有和商品相等的社會必需勞動量的黃金的數量；這個黃金量現在仍然做爲任何一個商品價格的基礎。

馬克思說：『價格是實現在一個商品裡面的勞動的貨幣名稱。……商品的價值量表現一種社會的生產關係，它表示着：某一個商品和生產這個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勞動時間量之間的必然關係。當價值量變成價格時，上述這種必然的關係，就表現爲一種商品和另外一種商品（貨幣商品）之間的、多少是偶然性的，交換比率形態。這種交換比率既可以表現那個商品的眞正的價值量；也可以表現和那個價值量不相等的黃金量。在一定情形下，這個商品是可以按照這些相等或不相等的黃金量讓渡出去的。所以，商品的價格和它的價值量之間的這種數量上的相等或不相等的可能性，是存在於價格形態之內的。這種可能

性，並不是價格形態的缺點。相反地，這種可能性，反而使價格形態異常地適合於那個以無規則的盲目的平均法則爲內在法則的生產方式』（資本論，卷一，頁七四——七五）。歉收和豐收，由於使用代替品而發生需要上的變化（例如因金屬缺乏，而使陶製器皿增加了需要；或者相反的，大量的陶製器皿的供給，斷絕了金屬器皿的需要），和開闢新的供給來源地的交通，社會各不同階級現有購買力的變化，以及許多其他這類事實，都可以使價格上升或下降，而暫時和它們的價值不一致。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在物價暴漲時，價格高出於價值；在物價暴跌時，價格低於價值。但是平均在資本主義商業循環時期（常常是十年左右），價格大體上和價值相符合。

價格變動的原因

在前一節已經說明了，價格發生變動是因爲：

（一）價格和價值不相符。可是價格也因其他理由發生變動；那些理由與價格和價值不相符的事實無關。特別是由於

（二）商品的價值發生變動（這是由於：從事於商品生產的勞動生產率變化的結果），

（三）貨幣商品的價值發生變動（這是由於：從事於貨幣商品，即黃金，生產的勞動生產率變化的結果），

（四）通貨貶值，或（紙幣）膨脹。

例如，由於紡織方法改進的結果，織布所需用的勞動時間減半，那麼，用貨幣所表現的布的價值，亦即，它的價格，也將減半。相反地，假如生產黃金需用的勞動時間減少，那麼，所有其他物品的價格就要上升。這種所有物價一般地上升現象，由於西班牙的殖民地征服者們開闢了新的黃金礦穴，在十六世紀曾經實際發生過。這種現象又在十九世紀發生過，那是由於在脫蘭士淮（Transvaal）地方有了金礦的開採。

價格是用人所共知的形狀、大小、和鑄字的硬幣來表現的。例如金圓、騷物倫（英國一鎊金幣——譯者）、達布龍（古時西班牙通用之金幣——譯者）等等。可是，常有的現象：當鑄成這種硬幣的黃金或白銀攙進一些賤價的金屬，而把其中的貴金屬的數量減少時（註三），那麼，這些硬幣所包含的價值就自然照樣減低了；但是它們的名稱却還和原來一樣。硬幣是貶值了，每個硬幣包含較少量的勞動時間了，而用這些硬幣來表現的價格就必定增加了。因此，價格不必和價值分開，就可以因爲硬幣的貶值而變動。和這類似的情形：在用紙幣代替黃金的國家裡，通貨膨脹，也可以產生同樣的結果。

流通的過程

當紡織者把他的布帶到市場的時候，他出售他的布照例不是爲了保存他所換回來的貨幣，而是要用這項貨幣購買個人的消費資料或原料，也或許購買他繼續工作所需要的工具。貨幣在這種過程中的作用，是一種媒介物的作用，聯繫着出賣和隨即發生的購買行爲。這個過程是用下面的公式表出的：

商品——貨幣——另外的商品。

這出售（商品——貨幣）是和購買（貨幣——商品）全然分開來的。因此就十分可能有下列的現象：當紡織者賣出了他的布以後，就無力或不願再買進他想要買的鞋子或穀物。這個交易的完成是停滯住了：對於出售（商品——貨幣）並沒有相應的購買（貨幣——商品）。這件看來似乎是平常的事實，很值得我們密切的注意；因爲當我們研究發展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危機時，這種現象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可是，資本主義以前時朔的「簡單商品生產者」，出賣自已商品的手藝人或農人，却照例是要把他們所得到的貨幣用來購買商品的。流通過程中的商品，在到達最後的消費者以前，至多不過轉幾次手而已。然而商品雖然是爲了使用而被購買到手、並且脫離了流通過程，但貨幣却仍然繼續由一手到另一手地流通着。

當做價值貯存的貨幣

在某一意義上，貨幣當做價值貯存的功能，是和它當做交換媒介的功能，相輔而行的。在交換中，放棄了一個商品，得回來的是這件商品的貨幣形態的價值（即上面的「商品——貨幣」的公式）。然後爲了買進所需要的商品，又把貨幣支付出去（貨幣——商品）。這樣，商品交換的循環就算完成了。但假如這個商品交換的循環沒有完成，假如商品已經賣出但却沒有買進什麼東西，那麼，商品所有者出賣商品所得回來的並不是其他商品，而是商品的貯存成爲

貨幣形態的價值。

象徵的貨幣

以貨幣爲流通的手段而把它使用出去，必定包括着一些對於有價值的商品貨幣的實質損失。因此，當商品交換擴展的時候，一種表徵的或符號的貨幣，就代替了貴金屬本身，而流通於交換者們的手裡。猶如金幣祇有經過長久的習慣及其表面鑄字的權威取得信賴後，才自然地被普遍接受一樣；表徵的硬幣或價值的符號，也祇有當它由於習慣或權威的支持而建立了它的地位後，才能够通行。

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上最古的表徵貨幣的形式之一，就是古代加太基用以象徵一定數量的黃金的戳記錢幣。在比較近代時期，紙幣成爲最普遍使用形式的表徵貨幣。（我們可以在這裡指出：當紙幣「膨脹」時，那代表一定的通貨公認單位的紙頭，例如英鎊或美元，就不會像膨脹之前，代表那麼多的價值了。固然它們看來是一樣的，而且印着同樣的名字。例如，一鎊紙幣從前能買到包含五小時勞動時間的物品，現在祇能買包含三小時勞動時間的物品了。）爲了找零用的硬幣，也是表徵的貨幣：因爲它們的價值是拿它們所代表的價值來決定，而非以鑄成它們所用的金屬價值來決定的。比如，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一個先令的價值等於它所代表的一個金鎊的二十分之一，而不等於它所包含的銀。所以，在許多不同方法中，爲了行使以貨幣爲交換手段的功用，價值的符號已經漸被用以代替了貨幣商品的本身。

這樣，即使在交換行爲中當做「媒介」的符號本身沒有價值，但商品也可以依照它們所包含的價值的比例，進入交換過程。

當做支付手段的貨幣

象徵的貨幣的普遍使用，是和商品交換高度的發展階段相配合的。如果商品交換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就會產生：購入行爲和支出行爲在時間上的一種分離。例如，用一種延期付款的辦法來購買貨物。這種用法律有效的方式所開具的「滙票」，已經變成現代商業交易中普遍應用的辦法了。普通銀行的支票，又是另外一種通行的辦法。

商業發展之後，就產生了一個全面的金融交易組織，以及長於從這種交易獲取利潤的金融機構。在專門從事這種事業的金融公司和銀行手裏，就用根據收款權利所收到的期票，在每個商人的賬目上，來把他們的債務同債權，或債權同債務，互相劃消。這樣，商業支付就趨向於透過某些中樞機構，而買進和賣出，也不必有貨幣商品直接參加，就可以進行了。貨幣商品在這種時候，是當做了在「結賬日」的再支付的手段，而不是當做一種在每一個個別交易中的直接媒介。

當做世界貨幣的黃金

當商品交換普遍到全世界以後，國與國間施行買賣的手段，也發展起來了。在這個階段，按照一個國家的權威的通貨標準而鑄成的標誌和形狀的硬幣，就不能再有它以前具有的那種意義了。到了現階段，要計算的乃是粗屬、金、銀條的重量。計算通貨的方法，祇看它們能够變成多少金，或者說，祇看它們能够支配多少勞動時間。這樣金和銀就變成爲世界的貨幣。『在不同國家的流通範圍之內，商品的交換愈發達，世界貨幣那種當做解決國際收支的支付手段的功用，就愈加重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頁二〇四）在整個資本主義時代，黃金（在一定的限度上由銀來補充）就這樣地一向被當做世界的貨幣使用，在國家與國家間的貿易和金融交易中未清結的差額，都是用黃金來結算的。

（註一）事實上，原始的社會用許多商品的價值來估算另一些商品的價值。這可以用下面所引荷馬的意利亞特，卷七，第四七二行史詩證明：『然後這長髮的亞其安人就買了酒，有的用青銅付價，有的用黑鐵，有的用獸皮，有的用牲畜，有的用奴隸。』

（註二）在英國語言中，「工作」(Work)和「勞動」(Laboar)就表示這種區別。

（註三）要注意：我們現在所說的，並不是象徵的硬幣，如英國今日所用的銀的或銅的硬幣。

本刊歡迎：批評、投稿、訂閱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週年

——中國新史學研究會及本社聯合舉行座談會記錄

時間：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上午九時
地點：中國社會科學各研究會聯合辦事處
出席者：范文瀾等八十八人
速記：李興和　陳堤　孫燕　劉凡
主席：范文瀾

范文瀾：今天新史學研究會，新建設雜誌社聯合舉辦一個紀念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金田起義百週年的座談會和小型展覽會，我史學界同仁們踴躍參加，一屋子坐得滿滿的，表現出對太平革命的關心和熱情。我代表新史學研究會、新建設雜誌社向同仁們致敬。沒有北京圖書館、北大文科研究所和歷史博物館的多方幫助，這個展覽會就辦不成。我代表新史學研究會新建設雜誌社和展覽會的參觀者，向北京圖書館，北大文科研究所，歷史博物館致謝。

中國是老而大的封建大帝國，統治這個大帝國幾千年的封建地主階級，資格很老，力量很大。但是和它對立的，被它壓迫剝削的中國人民——主要是農民階級，也是資格很老，力量很大。歷史上幾十百次農民戰爭，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發揮了强大的反抗精神，中國人民鍛鍊成爲革命的老手。當然，必須認識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兇惡性、反動性，它也是一個老手，反人民的老手。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老大封建帝國裏添加了一個新東西，那就是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從南京條約起，中國社會開始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擺在中國面前的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殖民地化的道路，一條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道路。誰願意走前一條道路？帝國主義要中國走這條道路。國內呢；也大有其人。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和還兩個階級的結晶體官僚資產階級，都願意走，死心塌地的走。其特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段祺瑞、汪精衛、蔣介石、衣鉢相傳，變本加厲，要中國做菲律賓第二，好一夥子可恥的大漢奸、大賣國賊！

可是這夥子漢奸賣國賊，和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者，觸霉頭的是碰見了積數千年之經驗的革命老手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中國走前一條道條，堅決主張走後一條道路，即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道路。一百年英勇戰鬥，成百萬成千萬的偉大人民隊伍，前仆後繼，奮不顧身，奔赴戰線，殺敵致果，就是爲了要實現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理想而自强不息。

去年，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基本勝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告成立。上距金田起義九十九年。帝國主義者割奪中國土地，變個名字叫做租借地，條約上訂定租借期九十九年。割奪了中國土地還對中國人民開玩笑，這是多麼可恨的侮辱。好！中國人民對敵人是不客氣的，你們來一個反動的九十九年，中國人民還你們一個革命的九十九年。把一大羣帝國主義趕出去，把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乾脆消滅，基本完成這個偉大艱巨的工作，九十九年。

各位先生！不要聽我說得那樣順口，以爲革命也是那樣順手。不！完全不！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聯合陣營是非常强大的。帝國主義夠兇惡了，還加上一個牛鬼，一個蛇神，它們怎肯在中國人民面前自願倒下去？必須牢記，中國人民革命走的是出人想像的困難路程，而且還有很多新的困難橫在我們前面。

要打倒强大的敵人，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要經過幾次三番的大鬥爭才能達到目的。孔夫子留給我們一本書，叫做論語，第一句話是『學而時習之。』這句話說得很好。宋朝有個開國宰相姓趙名普，據他自己說，用半部論語治好了天下。我說句笑話，中國人民用一句論語，就打倒了帝國主義及其兩個走狗，那就是『學而時習之』，洪秀全向西洋傳教師學了一點新道理、新方法，組織一個拜上帝會，結合中國農民起義的老經驗，太平革命武裝實習了十多年，把滿清王朝幾乎打垮。康有爲向日本君主立憲學了一套新道理、新方法，組織一個公車上書，結合中國士大夫聖主得賢臣的老理想，戊戌變法文裝實習了一百零三天，結果無所得，反陪送了六條性命。孫中山向歐美資本主義學了一整套新道理、新方法，組織一個興中會，後來擴大爲同盟會，結合太平革命、戊戌變法的新經驗，軍事行動兼文字宣傳實習了十八年，辛亥革命終於推倒滿清統治，但並不曾改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中國人民經過六、七十年的學而習，懂得了改良主義行不通，舊民主主義也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向西洋資本主義那位老師學沒有用，那末，怎樣辦呢？當然還是要學而時習之。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中國人民開始聽到世界上有馬克斯列寧主義這個新道理、新方法，好得很，找到眞正的老師了。『五四』運動就是中國人民願意學馬列主義而習之的明白表現。自從中國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開始用馬列主義的方法，治中國社會的病根，這才眞

是對症發藥，一服而愈。除非瞎了心，誰也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病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治好的。

依據現在已被事實証明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回頭看看百年前第一次大規模學而習的太平革命，那些事情做得有道理，那些事情做得不對頭，仔細研究一下，將給我們很多的經驗教訓。特別要指出的，是太平革命表現出來的中國人民堅強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中國人民幾千年的寶貴傳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了無可比擬的表現，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與國際主義精神緊密結合，把舊傳統的愛國主義提高到新發展的更高階段。還有一點要指出，今天展覽會上擺着好幾種版本的『賊情彙纂』，有一本可能是大漢奸曾國藩親筆修改的。敵人派遣暗探在革命陣營裏調查情況，分門別類，詳細明白，大大有利於破壞革命，反之，大大有害於革命的鞏固。現在中外反革命對新中國正在加緊特務破壞活動，這是值得十分警惕的。

為要我們這個座談會活潑進行，我在這裡拉拉雜雜的說了一套，算是給先生們開鑼喝道打頭陣，希望大家踴躍發言。

金毓黻：今天我趁著這個座談會和小型展覽的機會，向諸位作點報告。

為了配合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北京大學的五十二週年校慶，而要舉辦一次太平天國史料展覽會。同時計劃出版兩本書，一本叫「太平天國史料」，一本叫「太平天國史參考書目。」這幾件事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與北京圖書館合辦的。

今天為應新史學會及新建設雜誌社的要求，檢出一部分比較重要的史料，作一次小型的展覽，也為配合這次座談會供給諸位作些參考。

這次展覽的史料，可分為下列三種：

1太平天國文書：向達先生抄本史料七冊，王重民先生照像本史料八本，又一百三十九張。謝興堯先生收藏太平錢幣十五枚，照片兩張，又砲台題字拓片兩張。歷史博物館藏照片兩張，拓片兩張。

2關於太平天國的軍事地圖四張， 都是謝先生的收藏。

3清代官私紀載：共十五種。其中最重要的是：北大圖書館所藏精抄本賊情彙纂。謝先生藏賊情彙纂不全本。與前書有不同處，可資比較。王重民先生抄藏之遐邇貫珍七份，係一八五三—五五年英人在香港出版之報紙。

最後，我們希望諸位先生把所知道的太平天國史料多提出一些，供給我們， 好來充實本年十二月內的紀念展覽。

徐特立：關于『太平天國與滿清政府的對外態度及關係』：當時中國的政治情況，其特點是：滿清、帝國主義和太平天國三種不同性質的政權同時存在在中國領土之內。租界成為一個獨立國，向雙方宣佈中立，而承認滿清和太平天國為交戰團體，帝國主義竟把租借中國的商埠宣稱為中立地帶，抹殺中國的領土權。可見當時在中國領土上儼然有三個國家存在了。

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需要傀儡政府，想在滿清與太平天國之間，選擇一個可靠者，在徘徊觀望中宣佈中立。北京條約以後，看清它的眞正代理人，於是就以軍事幫助滿清，這裡就可以說明太平天國與滿清對外態度的反照。國內的階級矛盾與國外的民族矛盾是聯系着的。要研究太平天國革命的情況，主要的是看三種政權和二個矛盾（階級的和民族的）力量的對比。

關于『太平天國各種政策』我說一說下面兩種政策。

一、宗教政策：中國農民起義多利用宗教，他們常是利用多神教，祇有太平天國却是一神教。一神教只有人類共同的一個上帝，沒有人種民族國家及地方性的區別，是商業民族（如希伯來和阿拉伯）開闢國際市場的宗教政策。至於農業民族為着保守領土而過土著生活，就各有自己的保護神，所以宗教政策是多神教。在這一區別上，太平天國的宗教政策是進步的。但它沒有製訂一個如摩西的教條作為政治綱領，因此，在行動時，不是統一在共同綱領，而是臨時向上帝請命，以命令代替法律，在宗教上仍然帶有若干封建性。

二、軍事政策：如在南京建都或棄南京全軍北上問題。棄南京北上，則成為無後方作戰，百萬大軍無大後方糧援的供給，已經可慮，舍舟登陸北上，又無騎兵，且攻敵人必衛的腦部，這是一種軍事冒險。太平天國在南京立都後，遣偏師北上，而以大軍西上，奪取江南八省中心的武漢是適當的。林鳳祥北上雖然全軍覆沒，但發動了北方的革命力量，這一北上的偏師有必要，雖失敗也不是基本上的軍事錯誤。軍事上最基本的錯誤，就在於他沒認識反地主階級的革命，首先要把農民組織起來。曾國藩却知道反太平天國不能單依靠軍隊，而是要靠廣大地主組織起來，所以他在團練方面，用團而不練的政策，且號召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說：『儒家殺人此其時也。』並說：『遠賊必有近寇。』認為貧苦農民同情太平天國者，都是屠殺的對象，給地主以直接殺人之權，並規定錯殺不准翻案。太平天國缺乏這一對策去組織農民，把自己武裝起來去鎮壓反動地主，總的說來，太平天國的基本失策是：曾國藩組織了地主，太平天國沒有就地組織農民自衛武裝。

馮友蘭：新哲學研究會最近草擬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關於太平天國的思想，由我負責擬稿。恰好遇見今天這個機會，我向在座的各位歷史學家提出一些問題。剛才徐老說到太平天國的宗教政策，這跟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發展的過程，是很有關係的。研究太平天國的思想，『太平詔書』是很重要的材料，但是『太平詔書』有不同的板本。根據有一個板本，其中引用了不少儒家的話。另外一個版本就把這些話刪去了。關於這一點，有兩個說法。一個是說太平天國原來宗教性很濃厚，後來在裡面已經滲雜了中國的儒家思想。另一種說法；則說太平天國的思想，本來滲雜了些儒家思想，後來宗教性越來越濃厚，就把『太平詔書』中所滲雜的儒家思想刪去了，我贊成王重民先生及郭廷以先生的考証，主張後說，就是說原來太天天國是利用宗教作為團結羣衆的號召，到後來宗教性越來越重，結果被宗教所麻醉了。不知道關於這一點還有新的說法沒有。

另外一個問題，在新建雜誌上看到范先生的文章，說

太平天國有修鐵路、開工廠、礦山等企業的計劃，是準備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不知道關於這一點有甚麼材料，可以參考。(主席范文瀾回答，關於這一點史料根據是洪仁玕的資政新篇)

宋雲彬：今天座談的第一個題目，是「太平軍起義的原因與上帝會所起的作用」。太平軍起義的原因許多歷史書上(例如范文瀾先生的中國近代史)都已講過，我沒有什麼新的意見，現在只說明一點，就是：太平軍起義跟歷代的農民起義不同，因爲它在鴉片戰爭以後，那時候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們侵略勢力正在中國伸展，中國的農民受着兩重壓迫，封建剝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掠奪。

中國歷代農民起義，往往先有人借宗教形式來聚集徒衆。例如東漢末年的張角傳「五斗米道」，宣傳「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作爲起義的準備。洪秀全還是這個老辦法。他得到了那本「勸世良言」以後，就趁在大病發燒的時候造出許多神話來，證明他是「眞命天子」，裝模作樣了四十多天，叫人家相信他是受了上帝的天命，手握乾坤殺伐權」，到人間來「斬邪留正解民懸」的。但是，因爲時代已經是十九世紀了，已經發生過鴉片戰爭，所以他不假借中國舊有的道教之類，而利用了外國傳來的基督教。剛才徐老說，封建社會適宜多神敎，資本主義社會適宜一神敎，這話很正確。洪秀全利用基督教，還給基督教補充了一些新道理，例如如「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專」之類，破壞了封建制度的等級精神，它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他還依據了「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視之皆赤子」的原則，主張貧富無分，經濟平等，正符合了農民的迫切要求，所起的作用自然更大。

不過洪秀全究竟還是採用了舊方法，借「上帝附身」來發號施令，雖然一時取得信仰，可也發生了許多弊病。例如他離開鵬化山的時候，楊秀清爲了團結羣衆，代替他來裝作「上帝附身」，據說到後來，楊秀清裝作「上帝附身」的時候，洪秀全得向他下跪，這樣一來，洪秀全的宗教權一半被楊秀清拿去了。就種下後來楊韋內訌的禍根。

葉蠖生：我現在想談一談太平天國的土地政策。一般人都以爲太平天國的土地政策是受了古代井田制傳說的影響，是受了基督教義的影響。我覺得這些並不是主要的。因爲太平軍的主要領袖是從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人物，總不會毫無根據地採用一種教條理論來盲目推行。他們要推行一種政策，主要依據自己革命運動中實踐的經驗。現在我看到一些材料，證明太平天國的田畝制度，是有其自身革命實踐經驗作根據的。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開始的時候，參加革命的人都帶了全家老小到軍隊中間來。間雜着婦女兒童，軍隊行動就不方便，因此作戰起來也就很困難，太平軍爲了克服這個缺點，到了永安之後，就創立了「女營」制度，把婦女們編成獨立的隊伍。既然全家都參加了軍隊，一切衣食都祇能依靠公家供給，太平軍適應這種需要，實行統一供給制。這種嚴格的軍事共產主義制度，使太平軍軍費開支很節省，幫助了革命獲得初期的勝利。

等到太平軍定都南京之後，就把在軍隊中行之有效的供給辦法，推行到農村中去，制定了一套天朝田畝制度。按這種制度，土地全歸國有，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土地的收穫物也全部歸公，存入公庫，農民按實際需要，照一定限額向公庫支領，不管勞力強弱，工作勤惰，一律平均支用公糧。這是一種阻礙生產發展的平均主義空想。和現在蘇聯的集體農莊制度也不同，實行集體農莊制度還是要有一定的條件，農民還要經過一定的教育的。在某一種環境下的好東西，如果不顧客觀條件，機械地硬搬到另一種環境中去，就會變成不好的東西了。太平天國把在軍隊中的好辦法搬到農村中去，結果不能實行，造成了廣大農民的失望。太平軍領袖們了解這種情形後，就不得不把天朝田畝制度的推行停止下來了。

禹一寧：我在這裡只說一說太平天國政策裡的商業政策問題，當時商業政策可分國內與國外兩方面來談，對國內的商業政策：首先是對稅制的改革，按照規定，公平合理來徵收。當時滿清政府的稅率是相當的高，就拿船鈔來說：在道光六年商船每隻捐銀二十兩，在太平天國只稅千錢尚合不到一兩銀子，這樣我們就知道那方面的稅率輕重了。關於徵收稅務的機關，太平天國都是很有規律的；反過來說，滿清政府的稅率既高，收稅的機關也特別多。基於太平天國的稅輕，所以對當時商業的發達極有幫助。就像在太湖西岸的大浦地方的商業發達，就是一個突出的典型。

其次、對商業當時是締取了公賣制度，太平天國不但鼓勵和保護私營商業，同時太平軍本身也做生意。除了一般老百姓大力供給國家所須用的物質外，另一方面是沒收地主官僚和外國人不按規定走私的物質，將這些東西很便宜的賣給老百姓，這種貿易現象一方面幫助了太平軍的供給，另一方面使老百姓得到需要的物資。

至於對國外貿易雖然是自由的，但我們知道，太平天國富有極濃厚的民族自尊心，對外國的貿易往來，是有條件的；外貨進口，要按照需要來決定，當時所需要的，就是槍砲火藥；而對於鴉片之類的東西，是絕對禁止入口的。

其次，太平天國對國外貿易，是堅決執行自己政策的，嚴禁走私漏稅如英國亞但孫公司到中國買貨物沒有納稅結果東西被扣留，關於這些材料在太平天國外紀上記載的很完全。

朱啓賢：太平天國運動，在基本性質上，是一個羣衆性的革命運動。就它的宗教性這一點來說，有兩點似乎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點：基督教，經過中世紀，到了十九世紀，就全世界說，早已成爲一個很反動的東西了；而那時走到中國來，居然能在它含有一般宗教所共有的超自然主義的保守性之外，還含有羣衆性、革命性，居然能搞出來一個主張羣衆起來革命的上帝，居然能恢復並發揮原始基督教所含有的羣衆革命精神，從宗教史上看，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件大事。

第二點：可以看出充當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的基督教與含有羣衆性革命性的基督教，兩者是不相容的。與一個地方的封建反動勢力相結合來絞殺那裡的革命的進步的民衆運動，在帝國主義方面說是很自然的。這裡也正是說明

宗教的結合是表面的，階級的關係是根本的。

向　達：剛纔聽了諸位先生的發言，得到不少的啓示。我現在說一點太平天國的史料問題。供諸位先生的參考。研究太平天國一代歷史的史料，大概可分為三方面：(一)太平天國本身所有的刊物和文件；(二)清朝方面的紀載，如官書以及私家紀述之類；(三)外國人的紀載。關於太平天國本身所有的刊物和文件，在當時清朝方面禁燬甚烈。所以從太平天國滅亡以後至今，不過八十多年，國內發見的太平天國刊本書只英傑歸眞一種，此外故宮博物院所藏一些文書，以及寥寥可數的若干遺物罷了。忠王供狀原本，現在還藏在曾國藩後人曾若農處，不肯公諸於世。由此可見湘軍消滅太平軍遺迹的徹底、乾淨與兇惡。但是太平天國所刊書籍以及其他文件，保存在歐洲的却還不少，這都是那時候一些教士或其他人士從中國帶回去的。流傳歐洲的太平史料，是由日本的學者如內藤虎諸人首先介紹到東方來的。中國方面到民國以後，纔有人注意流傳在歐洲的這一部分太平史料，如徐大紱之攝照德國柏林所藏，程演生劉復刊印法國巴黎所藏，蕭一山之影印英國倫敦所藏，於是歐洲所藏太平史料，我們逐漸能夠看到廬山眞面。我於一九三五年到英國，首先看到牛津大學 Bodlean Library 藏的太平天國所刊諸書。一九三六年夏天到劍橋去，又在劍橋大學圖書館看到所藏太平天國刊印的一些書。劍橋大學所藏，都是以前所不知道的，後來由王重民先生全部照相，並爲文介紹。牛津所藏，大部分與倫敦大英博物院所藏重複，已由蕭一山爲之影印。一九三六年夏天轉到倫敦，在不列顛博物院的圖書館東方部閱覽室作一點研究工作。我於是利用空閒，在抄本部閱覽室裡翻閱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資料，抄了幾本戈登文書。戈登文書是戈登死後，由其家屬送給不列顛博物院的，其中所收大多數是戈登保存的同時清朝將官往來的書翰，太平軍的文件等等。李鴻章於蘇州殺降之後所出的大告示原件，也在其內。我翻閱這些文件時，最使我感動的是蘇州城陷之前，戈登致慕王譚紹光的一封信。慕王接到戈登的信，剛剛打開，便被部雲官從後刺殺，原信擲在地下，因此信上幾處濺有血點。戈登入城後至慕王處，立即將原信收起。這一封信的原文發表於戈登自著的 Events in the Taeping Rebellion 一書，A. E. Hake在這一封信下注明有數字殘缺。所謂殘缺者就是被血點浸蝕，以致原文漫漶。這是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悲劇，這也是七十多年前所灑留傳至今的幾點革命英雄之血！至於當時外國人紀載太平天國一代的著作，僅就法國漢學家 Henri Cordier,Bidliotheca Sinica 一書所載，書籍論文已有好幾十種之多。當時上海出版的 North China Herald 報，關於太平的報告就很不少，羅孝全 (Rev.Roberts) 從南京所發的信，也登在這上面。可惜我當時沒有力量注意到這些文獻。說到這裏，我想附帶的報告一點流傳在英國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史料情形。僅就不列顛博物院圖書館抄本部而言，除了戈登文書等太平史料而外，還有不少關於鴉片戰爭的史料。這都是鴉片戰爭開始以後，英國的軍人在中國沿海如寧波定海一帶所虜獲的文件。其中有很多的地圖，都是當時清朝官方關於軍隊砲台佈置的地圖。還有當時英國僱用的漢奸所作的報告，題爲廣東探報。至於英國外交部所藏有關中國的檔案，在一九三七年，還只開放到一八六〇年爲止。像英國不列顛博物院和外交部，以及法德諸國所藏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史料，實在是多不勝數。希望將來我們的史學界能在這一方面下一點工夫，派專人和有計劃的把這些史料中的重要部分，都用照相照回來。

王重民：我想就向達先生的話，再補充一些鈔書的故事。當一九三七——八年，我們在歐洲鈔輯史料的時候，向先生的確是一位「大鈔公」，至於我本人所鈔的，一部分國內已經有了。當我在倫敦博物院圖書館看敦煌卷子的時候，主管人小翟理斯 (Dr. L. Giles) 一天只給我兩三卷看，若遇到卷子太短或他請假的時候，便無事可作了。我們最苦的，是沒有參考書看，除了「大鈔」以外，就是用手頭現有的材料來校對。在一九三五年我校出了太平天國頒行的官書，前後頒行本的文字有些不同，便想根據這一點來說明太平天國「政策」的變化，嘗就巴黎和柏林藏本，寫了兩篇文章，雖說觀點是很幼稚，很錯誤，但也可算是研究上的一種方法。

范文瀾（總結）：我們這個座談會開得很好，就我個人收獲來說，覺得實在不少，想各位也有同感。各位發表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好比我們國家今年秋季大豐收，農民們把稻子割下來，需要隨手捆一捆，以便裝上大車，運到家裡去。我想學農民們的捆一捆，花費一點時間，把寶貴意見歸納出幾點，作一結束：

（一）太平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的序幕

太平革命本質是農民戰爭，但不同於歷史上陳勝吳廣直到滿清天理教白蓮教的農民戰爭。這是因爲鴉片戰後，新的歷史時代開始了，社會性質發生變化了，農民戰爭也自然要加入一些新的因素，那就是不多的但確實存在着的資本主義思想的因素。

過去的農民戰爭，都是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的階級鬥爭。太平革命則是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這是主要的）之外，還反對外國侵略者（這是次要的）。它不單是反封建的階級鬥爭，而且也是反外國侵略的民族鬥爭。因之太平革命帶着空前的激烈性和廣泛性。

太平天國方面，敵人有兩個：一個是滿漢地主階級，一個是以上海租借地爲據點的英法美資產階級，敵人方面，兩個勾結起來鎮壓一個太平天國，天國領導集團犯了不少錯誤，固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但階級力量對比相差懸殊，也不能不說是失敗的重要原因。

從太平天國的土地商業以及其他政策看來，從準備行施的資政新編看來，天平天國主觀上要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社會，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有人說，洪秀全有『取而代之』的帝王思想。其實，洪秀全旣要推動社會前進，那就是進步的，爲當時人民所歡迎的。他要取地主階級外國侵略者在中國的統治地位而代之，是大好事大妙事。他愛稱皇帝，愛稱天王，人民是不會反對的。反之，帝國主義走狗如袁世凱蔣介石之徒，自稱『大總統』，人民可不能允許，無情地把他們打倒。

太平革命要求中國社會前進一步，雖然遭受失敗。但近代人民民主革命的序幕卻從此揭開了。

（二）拜上帝會在太平革命中的作用

因爲太平革命是農民戰爭，組織農民羣衆，一般是用宗教作工具的，中國如此，外國也曾如此。

拜上帝會的教義，不同於反革命所利用的儒學聖道，又不同於適合封建割據的多神教（正統的道教、佛教、巫教），也不同於組織舊式農民起義的五斗米道，魔教，白蓮教，天理教等等。更有一點，它雖然借用了舶來的上帝和耶穌，但不同於當作侵略工具的外國基督教，它是一種獨創的含有新內容的宗教，即含有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新宗教，在當時特別在革命前期是進步的革命的。到了後期，革命走下坡路，迷信色彩愈益濃厚起來，原有的進步性革命性也就愈益淡薄下去。

（三）太平革命的弱點

太平革命創造許多新制度，新辦法，今天看來，還不能不贊歎當時革命者思想力的豐富，但初次革命，不可避免的要犯空想病幼稚病以及農民階級應有的若干老習慣老毛病。例如克復的地方，人民選舉鄉官，維持地方秩序，這是很好的。可是組織農民地方武裝去反對地主武裝的所謂團練、鄉團，注意得很不夠。結果農民被地主屠殺，鄉村與城市不能很好的互助，太平軍所佔領的城市，往往陷於孤立，被反革命軍隊集中力量，各個攻破。

（四）廣泛搜集史料

研究近代史必須廣泛搜集史料。第一、有關革命本身的史料。第二、有關反革命方面的史料。第三、保存在外國的革命史料及外國人所記載的史料，祇有勤於採訪，才能從大量的史料中瞭解革命的實際情況。希望史學界同仁們對搜集工作多加注意。

書面意見（以收到先後爲序）

萬斯年： 我所要談的，是在太平天國革命陣營中究竟有那些民族成分的問題。

在太平天國革命初期的領導集團的七個人中，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石達開都是客家人，這是大家公認的。蕭朝貴是廣西武宣農民，洪大全是湖南衡山人，似乎都是漢人，沒有什麼疑問。關於韋昌輝，則有「金田韋氏，原爲土著徭民而兼能講白話客話者」的記載，那麼，昌輝，按血統來說，應當是徭人了。整個說來客家人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的主要成分了。我們根據關於客家研究的論著，可以說：客家人是保持着漢民族的優良傳統的一個支派，他們是由於在歷史上屢次地受到了異民族的統治者的侵略，而由中原漸次地移居到西南各省的。

太平天國革命，是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相互錯綜的革命，又是民族關係掩蓋了階級關係的革命。所以在表現上便成爲漢民族反抗滿清統治的革命了。這樣的革命，自然是一般漢人（包括客家人）尤其是廣大的農民羣衆所積極參加的。

我們知道，太平天國的政治主張是平等的。這不僅是漢民族的理想，同時，也是或者更是少數民族的理想。所以：在太平天國革命陣營中一定有很多的少數兄弟民族參加。

我們的根據，是：

第一、秀全、雲山曾在八排和廣西桂平等地傳教。而在金田起義的時候，平南、貴縣、武宣、陸川、博白各地，又都同時響應。而這些地帶，正是徭山範圍和接近徭山的地區。所以，在這一革命陣營中是會包括了徭人、和獞人的。

第二、太平革命的時代，正是國內少數民族，熱烈地普遍地要求革命的時代。我們除去西北的及其他的民族起義不談，只就在湖南、廣東、廣西的少數民族起義的事件來談，在太平天國起義前較近的時期中計有：

一七九五——一七九八年，貴州湖南的苗民起義。

一八三〇——三一年廣東崖州黎民起義。

一八三二年，湖南江華錦田鄉徭人趙金龍起義，有千餘羣衆。廣東連山八排徭民也起來響應。同年，廣西賀縣、曲江也有徭民起義。

一八三四年廣東儋州黎民的起義。

一八三六年湖南新寧徭民藍正尊倡龍華會，起義，稱徭王。

一八四七年徭民雷再浩集結全州五排梅溪口徭民及人民起義。在廣西湖南一帶作戰。

這些或大或小的少數民族起義，雖據記述，都被清軍鎮壓下去。我的看法，是可能有些參加了這些起義的少數民族兄弟，匯合在太平革命的陣營裏的。

現在，中國人民在人民領袖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已經基本勝利了。共同綱領中明白地規定了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我們少數兄弟民族是翻身了。我們正應當好好地蒐集這類的資料，寫出少數兄弟民族的光榮歷史。

房鴻機： 太平天國在中國革命史上，有着承先啓後的作用：承先，表現它還是一種較大規模的反地主、反封建壓迫的農民運動，這和中國社會半封建的性質相應；啓後，表示它結束了這類性質的農民運動，而開拓了適應當時環境的反封建，反外國侵略，要求解放與民族平等的新面貌，成爲資本主義民主革命的前奏。

王可風：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興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農民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因而革命人民組織起來進行武裝戰爭。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一是軍事鬥爭的失利。戰略的錯誤，表現於沒有在取得南京後，集中兵力進攻北京，推翻滿清統治。二是土地問題沒有解決。

丁易：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不同於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的農民起義，它不但接受了過去農民起義的一切優良傳統，發動了廣大農民參加戰爭，而且還有組織有紀律地進行了教育與訓練。更重要的是它適應了人民的要求，提出了土地政策，要消滅封建制度。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中國歷史上任何革命運動都沒有這樣明確的提出過的。

其次，它對帝國主義的態度是堅決站在平等互助的立場的，和滿清的無恥媚外，恰是一個强烈的對照。它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它不承認滿清和帝國主義訂定的一切賣國條約，而且以實際行動表現了出來。

王　忠： 太平天國革命本質上是農民反抗地主的階級鬥爭，但第一，因爲在異族統治的時代，必然有民族問題，從革命一開始便是漢族反滿的民族革命；後來英法美等帝國主義和滿清勾結，更將民族問題提高一步，有了反外國侵略者的性質。第二，因爲這時候資本主義已經侵入中國，連同帶來了宗教，於是上帝教和中國固有的宗教完全不同。革命人民最先在外國宗教保護下便於進行革命，但由於階級不同和民族不同，上帝教發展爲新的宗教，爲外國侵略者視爲異端，竭力反對。

因此，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化過程中的農民起義。它有反異族統治，反外國侵略者的民族主義性質和打倒地主平分土地的反封建性質。它的成功一定是發展資本主義，將中國社會向前推進一步。

牟安世： 關於上帝會所起的作用，基本上表現在對羣衆的宣傳鼓動和團結組織兩方面。就上帝會教義的中心思想說來，是以上帝爲唯一眞神和天地人物的創造主，來打倒一切木石泥團紙畫的偶像以及相關聯的偶像崇拜。羣衆們在洪秀全領導下，到處搗毀神像，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就是一八四七年九月象州甘王爺廟的破壞，可見上帝會的教義確實解放了農民羣衆的思想，發揮了宣傳鼓動的作用，使他們敢於以行動來反對一切敬若神明的偶像。

上帝會的第二個中心思想是平等思想，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專』？『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視之皆赤子』（洪秀全：原道救世歌）。『天下多男人，盡皆兄弟之羣，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呑我幷之念』（洪秀全：原道醒世論）。但在現實生活中，滿清統治者的封建地主政權却是專制制度和剝削制度的維護者，那能有絲毫平等之可言呢？如要平等，就只有排滿。

打倒偶像和排滿革命的教義，鼓動了農民羣衆的熱情，給予了他們一個共同的了解，因之也就產生了團結組織的作用：使『入會之人，固結不解』。每一個村莊，都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忠王李秀成自述）。這種情形不得不使反動派驚異了。

劉鈞仁： 我以爲洪秀全的金田起義，固然是要推翻異族的滿清政府，一半也是受了外來帝國主義的壓迫；因爲鴉片戰爭以後，英帝勢力侵略的途徑，無疑的是首先在沿海尤其是在兩廣的邊境上，他們政教並行，所以洪秀全才利用了這個原因建立了自己的上帝教，以抵制之。就看太平天國的戰略，始終不肯和帝國主義妥協，黃畹上書勸他和洋人通商，不要派兵圍攻上海，（見故宮影印太平天國文書）堅決不肯採納，就可以知道了。

田餘慶： 天地會和三合會的活動持續得很久，他們的活動是零散的，沒有統一的堅固的思想領導。他們或者在太平軍未到之先打前鋒，或者在太平軍已過之後堅持本地的武裝鬥爭，其中有的已融合在太平軍中，與太平軍完全合作，在組織上和思想上都接受太平軍的領導（這種情形不算太多），有的只用太平軍的名號，而在太平軍組織系統之上另外設上一個假想的朱明皇帝，有的則在組織上似乎受太平軍的領導，但是在倫理觀念上却堅持自己土生土長的一套。他們只在反對官僚地主的政權、特別是在反對滿清官僚地主的政權這一點上與太平軍取得了一致，這就是太平天國革命之所以異於我國封建時代傳統的農民革命的地方，而天地會三合會在當時却仍然走着傳統的農民革命的道路。這裏就產生了在當時具有嚴重意義的統一戰線的問題，這一統一戰線的綱領，既要堅持使中國革命不再走傳統的止於更換朝代的老路，又要團結有着各種要求的各種革命分子，首先是天地會三合會，在反對官僚地主的壓迫和剝削以及使中國停止半殖民地化的鬥爭上，各盡所能，各得其所。這一點，太平天國的領袖曾經作了，但他們是作得很不夠的。

張秀民： 中國歷史方面的書籍，相當豐富。可是要研究一個專門問題時，又總覺得材料太少。譬如太平天國政府出版的書籍三四十種，國內只有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藏有幼學詩等三種，以及前幾年發現的英傑歸眞一種。現在通行的都從海外攝照回來的。講到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本來面目怎樣，誰也不知道。過去出版的歷史書把天德王洪大全當作洪秀全，給忠王李秀成畫的竟像外國女皇了。我想當初他們可能有畫像，祇是失傳罷了。至於記載太平天國的書籍檔案，亡失的很多。現在算起總賬來，清朝人與近人著述，有關於太平史事的，連短篇論文在內（有關方志暫時不算），也只有五六百種。西洋人用英、法、德文寫的，雖然有二百多種；已翻成中文的也不過三四種而已。所以金田起義至今雖只有一百年，因爲史料散失、文獻無徵，有的地方已經不能知道它的眞相了。要研究歷史，第一步先要掌握充足齊備的史料。爲此我建議對於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特別是太平天國史料，應作全國性大規模的徵集。

陳仲篪： 關於太平天國的各種政策我想談一談「天朝田畝制度」。天朝的這一制度在當時是否實行，現在還沒獲得肯定的說法。不過爲了研究這問題，應該先追溯他的來源。天朝的田畝制度，是分爲九等，這與孟子和周禮所說的井田制度極相近，那麼洪秀全既是反封建，反孔孟的革命領導者，會取法於此嗎？我覺得是會的。因爲這制度擬訂人是出於洪秀全、馮雲山兩個人，而他倆都是生在所謂「乾嘉」(1750——1820)文風最盛的時代，井田學說也是當時研究經學的一個課題，流風所被，對洪馮二人的學術思想不無相當影響。而洪馮二人都是兩試不第的舉子，他倆爲了應試，就不得不鑽研經學，也就是說他倆爲了應試，對井田的學說，也不能不有所致力。但是井田學說傳流了二千餘年，除了王莽一度試行之外，一直就沒有實現。他倆最富革命思想，在組織起義方面，他們沿用了歷來農民所慣用的宗教方式，而獲得了成功。但在若干年來壓迫剝削農民最甚的土地制度方面，在當時除了採取井田學說而加以改進外，是沒有其他再好的方法所能解決的了。不過中國農村社會爲若干年來的傳統習慣所束縛，驟然改變土地私有制度，一時是很難做得到的。在太平天國克復的地區內，有的或已實行，有的或未實行，或實行不久而又廢掉，這是很可能的事。總之，這問題還需要在文獻中找尋新的證據。

韓壽萱：太平天國的史料在美國也有一些。我個人在一九四五年的暑假中，曾參觀美國東部的一些博物館，在麻省 Mass.，薩萊木 Salem 地方的一個博物館裡，曾看過不少的華爾的遺物。其中有華爾和他中國太太的畫像，他們兩人所用的衣飾，和他們家裡的陳設指子等等，都在陳列室裡展覽着。這些遺物都是由他的家屬捐贈予這個故鄉的博物館的。華爾是常勝軍的首領之一，或者值得我們注意，我個人收到的，是華爾傳一本，和華爾夫婦的像片兩張。在該地的另一博物館裡，我記得陳列着不少關於中國通商海口的油畫，如十三行、黃浦和澳門等。我只收到十三行的照片一張。至於這兩個博物館沒有陳列的資料，究有多少，因當時目的在參觀博物館，沒有詳細調查過。

賈岩：我提議今後能夠多開這樣的座談會，而且希望在必要與可能的情況下，聘定專家先作系統的中心發言，並適當地試行分組座談（或以問題劃分），與大會結合的辦法，進行更廣泛而深入地研討。

彭明：太平天國的土地政策，一方面有其反封建的偉大意義，一方面具有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的缺點。而農民缺乏教育，不能配合政策，也爲失敗的主要原因。毛主席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從歷史的教訓中來體會這句話，就更深刻了。

馮拾：徹底地理解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需要我們從歷史上作深入一步研究，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爲我們提供了研究過去歷史上農民運動的一個好典型。希望我們大家再深入研究。

楊人楩：自朱九濤倡上帝教以至洪秀全之將其應用到實際政治上，其間有一個發展過程；明白此一發展過程，應當會有助於整個太平天國史之了解。太平天國之採用基督教，和歐洲各次農民起義之憑藉基督教，在背景、教義、應用、及發展上是彼此不同的；明白太平天國和基督教的關係，便不難找出這些同異之所在及其原因，進一步，對於了解東西社會發展同異的工作，也可能有些帮助。

葉孟源：一八五〇年太平軍金田起義的時候，正是兩廣（尤其是廣西）人民普遍起義的時候。領導起義的，多半是天地會（亦稱三合會）、上帝會所領導的太平軍，不過是各起義軍中的一枝部隊。因爲這一枝部隊有較明確的政治綱領，有較嚴密的組織，有較嚴格的紀律，所以經過半年期間（到一八五一年初），它成爲各起義軍中有力的一枝部隊，再經過半年期間，它成爲各起義軍中的主要革命力量；各地起義軍多投入太平軍，各地天地會與其他秘密結社多發動起義來響應太平軍。太平軍對於天地會採取團結政策，與陳亞貴（廣西起義軍中有力部隊之一）聯絡，吸收羅大綱，蘇三娘等參加太平軍。太平軍從金田起義到永安突圍，連破清軍；使滿清統帥賽尚阿感到「此『賊』不是尋常『賊』！」從永安到長沙，由一萬餘人的隊伍擴大到幾萬人；有天地會沿途起義響應，很快地佔領了南京，隊伍擴大到幾百萬。總之，團結各地起義軍，是太平天國初期能迅速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當時，團結的條件是有的。首先各起義軍的階級成份，都以農民與貧民爲主體。他們與太平天國反滿清反封建的鬥爭目標基本上是一致的。天地會的口號是「滅清復明」，「順天行道」，「殺富濟貧」；捻黨的口號是反對「鹽店、當商、燒鍋、油坊」；杜文秀宣佈：「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漢，」「回漢一心，以雪國恥（意爲推倒滿清政府）」；其他起義軍地主階級儘管誣衊爲「賊」爲「匪」，但是不能不承認「所至窮民德之」，這個鐵一般的事實。在共同的鬥爭目標之下，各起義軍是願意和太平天國團結的。

當然三合會，捻黨，八卦教……等，比較起太平軍來，其政綱是模糊的，其組織是散漫的，其紀律是鬆弛的，一時不能提到太平軍的水平；甚至一些人，如張釗等曾因爲受不了嚴格紀律的拘束，還會脫離太平軍，直到叛變革命，投降滿清。不過那樣的壞份子，畢竟是少數，廣大的羣衆在太平軍的教育和帮助之下，是會進步得很快的；其首領如羅大綱已經變爲太平天國忠勇的將軍了。但是太平天國的首領從攻長沙的時候開始排斥天地會，會都南京以後，積極排斥天地會，拒絕援助劉麗川，以致天地會與滿清軍隊和外國侵略者苦鬥一年半終於失敗；不與各地天地會聯合，以致華南起義的天地會被滿清政府各個擊破，太平天國不能向華南發展。太平天國雖然和捻軍聯合作戰，但是僅限于某一戰役的臨時性的聯合，並沒有密切的合作，以致捻軍不能發展，太平天國也不能鞏固長江北岸的領土；後來太平天國失敗時，賴文光曾與捻軍合一，走遍了華北各省，但是大勢已去，在滿清政府集中全力攻擊之下，無能爲力了。由此可知，太平天國不能團結各地起義軍，又是它後來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太平天國與各地起義軍不能團結，在客觀上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是一個原因，在主觀上太平天國與各起義軍都有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安樂思想，尤其是宗派思想成爲不能團結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們也不能苛責太平天國。一百年前農民階級的太平天國革命，因爲農民階級本身的特性，自已不能解放自己，不能團結全國的革命力量，以致失敗，給我們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同時太平天國革命初期，上帝會聯合天地會取得迅速的勝利，也給我們留下了模範的榜樣。

丁曉先：現在研究太平天國歷史，應該跟人民解放戰爭尚未勝利的時候有所不同。我們應該在人民的立場上，對太平天國的一切歷史事實好好的重估量一番。抹煞革命意義和誇大革命意義同樣都是偏差。

吳廷璆：太平天國初期，上帝會在動員組織廣大人民參加革命這一點上是起了重大作用的。本來在社會物質生活處於低度發展水平時，宗教往往可以成爲反抗舊統治的外衣，不過歷史上作爲宗教反抗形式的，多半是自己的民族宗教，或在本國有深厚基礎的宗教（如基督教在歐洲，佛道兩教在歷代中國的農民戰爭中），當時的上帝教却不如此，然而它終於發生了極大的影響，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上帝教包含了原始基督教的共產主義思想與宗教改革時代的新教精神，這二者在當時中國一方面反映着廣大人民——農民的要求，同時對於封建統治具有强烈的革命作用。

書評

美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崩潰

——評陳伯達著：「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

蘇聯 乃查斯拉夫斯基
茹 普 譯

中國偉大的歷史家和政治家陳伯達教授，是蘇聯讀者熟知的人。他的『中國四大家族』一書，已經翻成俄文。本書對於買辦資產階級上層集團、即壟斷資本家——金融資本強盜集團在中國的統治，是一幅鮮明的圖畫，這個集團是把它的全部生活和活動與外國的、殖民地的掠奪資本聯繫起來，而把全中國拍賣給帝國主義者的。

四大家族——蔣、宋、孔、陳構成買辦封建資產階級的上層集團，他們以裙帶關係勾結起來，而以蔣介石爲首。陳伯達的這本書指出了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集團，在中國人民破產和被奴役的情況下，怎樣發展了他們的金融和政治勢力，數十億金元怎樣從中國流入了美、英、日的銀行裡。但是，中國反動資產階級無情地迫害中國勞動人民和使全國破產的時候，他們也爲自己的毀滅，造成了種種經濟的前提。工人、農民、先進知識分子和某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變成了強大的革命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了這個運動，並且沿着勝利的道路前進。

陳伯達預言了四大家族的滅亡。在一九四七年所寫的這本『人民公敵蔣介石』新書（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由中文翻譯，外國文書藉出版局，莫斯科，一九五〇年，三百頁，定價八盧布七十五戈比）裡，著者根據對蔣介石反動政治和軍事的詳細分析，做出了劊子手暴政統治必然垮台的結論。陳伯達在其分析中，是根據着毛澤東的見解的。事實充份證明了科學分析的結論。

從表面看，陳伯達的書是破產了的中國人民叛徒的一部特殊的傳略。而就事實上和本質上說，本書的內容，却是無比地廣泛。它揭發了美帝國主義遠東計劃破產的根本原因。這就使本書具有政治的現實性和重要性。蔣介石在其窮兇極惡活動的最後階段中，首先就成爲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他和中國人民本質上毫無相同之處。他是完全屬於美帝國主義的了。因此，蔣介石個人的垮台，也就是美帝國主義最嚴重的破產。

蔣介石的私生活，完全反映着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在其最後階段的歷史。他以一個上海交易所經紀人的資格，開始了自己的事業——在交易所裡面，一個金融家和走私販子及盜賊是不能加以區別的。

反動政治在早期曾經利用了私人發財和掌握權力的手段。蔣介石早已發現了怎樣可以獲得個人權力和在革命運動中玩弄挑撥離間手段的資本。他散佈了無數的『左傾的花言巧語』，可是，他從最初起就是一個懷有貳心的人，所以後來轉變到露骨的、醜惡的背叛人民、背叛革命，背叛民族解放運動。

經紀人將軍以高唱『民主』爲護符，而成爲舊中國買辦封建制度的走狗。他停止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鬥爭，而對中國工人和農民宣戰。但是，他並沒有能够把革命運動壓制下去。革命運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繼續發展。

蔣介石對於殘酷的，滅絕人性的反共恐佈是沒有止境的，正如在追逐暴利的事業上一樣，他簡直發瘋了。在全體誠實人民對他一致憤恨的中國，他能依靠誰呢？祗有依靠外國帝國主義者。蔣介石成爲他們的從僕。中國變成了奴隸市場，在這裡日、英、美帝國主義者各爲自己選擇了具有豐富天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的利潤優厚的地盤。

帝國主義者是形形色色的，他們相互間進行了爭奪霸權的鬥爭，而蔣介石至少成爲三個主人——日、英、美資本家們的從僕。他巧妙地週旋於三個主人之間，而把這套辦法叫做『政治』。但是，他們一致擁護他，因爲相互間雖有一切的矛盾，可是他們認爲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是自己對華計劃的根本威脅。他們以金錢和武器供給了蔣介石以便對共產黨人鬥爭，而這些物資的一部用於反共戰爭，

祇落得一個永遠引以爲恥的結果，一部分順着四大家族的無底袋花費出去，又以幾十億美元重返於美國和日本的銀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期間，蔣介石主要地是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服務的，他把日帝國主義者看成希特勒德國的同盟者，未來的勝利者。日本軍隊侵佔了中國的一部分，蔣介石並沒有阻止他們。這時蔣介石的軍隊正由希特勒的教官（包括臭名遠揚的賽克特將軍在內）訓練以進行反共的戰爭。就連美帝國主義者也是不反對日本的。他們認爲日本人能够完成了蔣介石無論如何也不克完成的事情：肅清革命運動和共產黨人。但是日帝國主義者對於這一點也並沒有成功。中國人民把共產黨的軍隊、把共產黨看成是爭取本國自由與獨立的勇敢的鬥士。

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式上置蔣介石於進行反對希特勒德國的同盟國政府之列。日本帝國主義是蔣介石名義上的敵人。美國提供了數十億金元和數千門大砲充作抗日戰爭之用。但是蔣介石並沒有作戰。他保存實力並且在軍火貿易中大發其財。有些美國政論家也看到這一點。美國政治家也熟知這件事，看到這件事，可是並不反對。他們讓中國共產黨人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戰爭，而自己却幫助了蔣介石準備反共戰爭。

中國人民親眼看到，抵抗日帝國主義強盜的戰爭，祇是共產黨的軍隊進行的。中國人民知道，在解放區農民已獲得土地，肅清封建地主和腐敗的買辦資本家政權。

中國人民曾經注視着蘇聯人民對厚顏無恥的帝國主義強盜所進行的英勇鬥爭，並且相信：祇有人民政權、工農政權，才能使中國獲得民族獨立和解脫貧困。

德國法西斯制度的垮台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對蔣介石說來，不過是外國帝國主義對華統治的換班。他在當時成爲祇是一個主人——美國人的從僕了。

美國資本家把中國看成一種攫取的獵品，他們簡直手忙足亂了。陳伯達把這種貪求無厭，寡廉鮮恥的盜賊行爲，描寫得淋漓盡致。華爾街代理人、企業家和經紀人這一夥子惡棍，也追隨美國將軍和軍事顧問之後，向中國橫衝直闖而來。每個人都想割取一塊較肥的肉：工廠、土地、鐵路、鑛山。在城市裡美國軍人成羣結夥、肆無忌憚地欺侮中國人。美國海員強姦了中國的婦女。

蔣介石拍賣中國土地 和 中國人民是心甘情願的。他順從地接受了美國主子一切屈辱的條件，讓給他們種種特權和工業專利權，把中國一切資本主義式的經濟都放在美國主子金融監督之下。他堅決地把全中國當做一個毫無權利的殖民地而讓給美國富翁，他已經不是中國的主人翁了。中國大部分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被解放的土地上，建立了脫離開帝國主義的新生活。

這是美帝國主義實現侵略計劃的根本障碍，而擺在蔣介石匪帮面前的一個任務，便是在極短的期間內肅清共產黨的軍隊，並且收拾解放區的中國人民。

美國以武器供給了國民黨。美國軍事專家訓練，了蔣介石的士兵。這一時期那個美國將軍沒有到過中國！馬歇爾從中國想出了把全歐洲變成被奴役式的中國的計劃。赫爾利和魏德邁將軍們在中國曾經發號施令。煽動家兼冒險家布立特在中國曾經支配一切。

歷次反共的軍事行動，在美國將軍們的直接指揮下接連地準備妥當。建立了幾百萬軍隊，用最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美帝國主義相信他們掌握了巨額的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但是在他們看來彷彿是有力量的東西，實際上都是軟弱不堪的。我們所談的，是陳伯達這本書在一九四七年冬敘述的情形。戰鬥雖然正在激烈的時候。而結局是早預定了的。蔣介石軍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打擊下瓦解了。人民解放軍，爲愛國主義所鼓舞，在天才的將領們領導下，進攻、前進，獲得光輝的勝利，不斷地成長和壯大起來。

美國將軍們和不稱職的軍事顧問們也和蔣介石的將軍們一齊撤退，後來竟逃之夭夭了。他們把自己一切可恥的罪過都推到腐敗的中國反動將軍們頭上。他們嚴厲地批評了蔣介石的腐化統治。但他們却絕不批評自己、他們雖然也親眼看見全中國人民起來反對劊子手買辦，可是仍然繼續着支持蔣介石。

美國帝國主義者頑固地支持了自己的從僕。他們不願放棄滅亡中國的計劃。三年前陳伯達寫道：

『美帝國主義援蔣滅華的計劃，是要以台灣和廣東爲出發點和中心根據地。』

當蔣介石匪帮的最後殘餘從大陸上滾蛋，而整個偉大的中國團結在民主政府周圍，團結在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周圍以後，美帝國主義卽在現在——一九五〇年還妄圖實現自己的計劃。此外，現在很明顯的，佔領台灣並使之變爲進攻中國的軍事基地，是更廣泛的瘋狂計劃之一部分，在這個計劃內，預定使朝鮮負起進攻滿洲北部基地的任務。

但是在朝鮮又重踏了中國的覆轍。美帝國主義訓練並以武器裝備了李承晚軍隊以進攻北朝鮮。他們讓南朝鮮人充砲灰，而自己却担任指揮官。但是

他們處在沙灘上和泥沼中。李承晚是蔣介石的袖珍第二版。美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把美國青年送上不光榮的死亡的道路，這些青年是在棍棒驅使下在朝鮮作戰的。

陳伯達的書以豐富的實際材料確確實實地揭發了美帝國主義在華失敗的原因。而且我們正看到決定美帝國主義在朝鮮失敗的，也是同樣的理由。

民主的力量在遠東正如在各地一樣，成長起來不斷地發展着。構成全球最大多數的人民，現在正進行着爭取自己民族獨立的鬥爭。他們獲得全體進步人類的同情。帝國主義支持反動的、腐朽的政府和統治來反對這種強大的，不可戰勝的運動，是軟弱無力的。美帝國主義絕不能拯救它們。美帝國主義祇有使自己固有腐朽的基礎，更加動搖起來。

（譯自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六日『眞理』報『書刊評介』欄）

對呂著「簡明中國通史」隋代部份的幾點意見

羅元眞・高振鐸

費了幾天時間，將呂著簡明中國通史下冊（東北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七月最新版）第十二章第一節第一段「隋初的經濟發展」、第二段「隋末的苛雜和繁役」（三〇三——三一〇頁）；第二節第一段「隋末農民大起義」（三二四——三三〇頁），僅隋代這一階段的有關史料應用得不正確、或牽強的，年代錯誤的，作了初步的校正。（我不曾得到本年四月一日三聯書店該書的新版，不知那裏面是否有的已更正了。）

自己的力量很薄弱，時間又不充分，書讀的也少，難以做的很好。但，自己也正在學習這一階段，順便作了這工作，覺得對自己有幫助，也希望它對學習本國史的同志和同學們有些幫助。

在九月三日北京『光明日報』學術上柴德賡先生發表了對呂著簡明中國通史的幾點意見的一篇文章，這是很難得的，却仍不夠全面與細緻，應更努力地做下去，這還僅是一個開端，希望能繼續出來更好的此類文章。最後，自己的這篇裏錯誤在所難免，誠懇地希望讀者與著者指正。

（一）三〇三頁正文正數第二行『楊堅襲爵後僅九個月，便代替北周作了皇帝，建立隋朝。』

事實是楊堅襲爵後十三年才作皇帝。作大丞相到作皇帝却是九個月。

按楊堅襲爵爲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紀元五六八年）秋七月事，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陳紀四：

『（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隋國公楊忠卒，子堅襲爵。』

而楊堅代周稱帝爲陳太建十三年，周大定六年（五八一年），因而由楊堅襲爵到他作皇帝中間相距十三年（五六八——五八一年），不是『僅九個月』。

『（周）大象二年（五八〇年五月）以楊堅爲大丞相。』（文獻通考卷四十九）

在同年十二月「受禪」，次年（五八一年）二月正式稱帝，自作大丞相到篡位却爲九個月。

（二）三〇四頁倒數第五行『服役十二番（每番三日）』（謂公元五八一年所施行的）；三〇五頁正數第三行『服役日數減每年十二番（番三日）爲二十日』（謂五八三年施行）。

『每番三日』恐非，因爲如此算來便是三十六日了，事實該是三十日，而「番」只能做換班的次數解，而不是什麼日數的單位，「十二番」只是每年換班十二次。

隋開皇三年前關於役的規定是：

『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食貨志）但周的規定却明顯是三十日：

『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上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三十日），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

由此可見『每番三日』是不應該這樣註的。

（三）三〇四頁倒數第四行『單丁及奴婢各半之』。『奴婢』應改爲『僕隸』（見隋書食貨志；文獻通考）

（四）三〇四頁倒數第三行『公元五八八年（即開皇八年）又開始向「諸州無課調處，及……管戶數少」的「課州」「不受地者」「計戶徵稅」』。

這顯然是將『不受地者』也列爲『計戶徵稅』範圍之內，食貨志上並未這樣寫，因爲隋規定：

『未受地者，皆不課。』（食貨志）

因而這是否課『未受地者』是很成問題的。食貨志：

『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

還裏並未提出『未受地者』也『計戶徵稅』。只是呂先生想像加入的。且高熲所說只是部份的州，並非全國。

（五）三〇四頁倒數第二行『官吏的薪俸，給予「職分田」，衙門機關的辦公費，給予「公廨田」，由其佃給人民，收取租子』。（呂先生認爲是公元五八一年即開皇元年所施行的）。

實際上給『職分田』『公廨田』的確實年代是開皇十四年（公元五九四年），而非五八一年。

但在時間上怎樣錯了這些年呢？可能是著者只讀了食貨志在開皇三年以前有一段關於隋的總的記載：

『京官又給職分田，……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

還完全似在公元五八一年（開皇元年）所定的一樣，其實在下邊還有更明確的記載：

『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

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開皇八年以前）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取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尙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壞風俗，其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求利，一皆禁止。……』（食貨志）

這就說明了給『職分田』『公廨田』不是在五八一年（開皇元年），而是在公元五九四年（開皇十四年）。開皇八年以前是給『公廨錢』，在開皇十四年以前也仍給『公廨錢』，所差止是「錢」的來源處有些不同，前者是來自『隨近之州』後者是取自『所部』的『計戶徵稅』。

（六）三〇六頁正數第三行『到「平陳」後時公元五九三年（開皇十三年），庫藏司報告「庫藏皆滿」，「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應改爲『公元五九二年（開皇十二年）』（見食貨志）

（七）三〇六頁倒數第二行『據傳吳中豫中夜中紡紗能次晨成布，即所謂「鷄鳴布」』

『豫中』應爲『豫章』；『紡紗』應爲『浣紗』。

隋書地理志下揚州條：

『豫章之俗，頗同吳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及要官者，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室，猶見放逐，以避後人。俗少爭訟，而尙歌舞。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且成布者，俗呼爲鷄鳴布。』

『豫中』爲『豫章』之誤已很明顯。而『浣紗』誤爲『紡紗』也是完全說不通的，因爲如果是在夜裡紡紗，次早織成布並不稀奇，只能說明人手多，分工好些，作的快一些。但事實上紡出的紗，必須經過浣；而『浣紗』却不簡單，因爲一夜的時間很短，且又無日光，能很好地乾燥，紡織成布，必有其極爲高明的乾燥法，這才能說明紡織業發達。

（八）三〇六頁『宇文述所造「觀風行殿」』。『宇文述』當爲『宇文愷』；『觀風行殿』原爲『觀風殿及行城』（見通鑑紀事本末卷一五五）

（九）三〇七頁正數第四行『早在文帝開皇年間，情況最好的時期，文帝幸岐州仁壽宮，環宮外都是哭聲和野火瀰漫，「左右」却把這幅流落飢民圖，揑報爲「鬼哭」和「燐火」』。

著者這一想像的推論是不恰當的，也就是說呂先生根據的史料不太能說明這個問題。

這一推論是根據隋書食貨志開皇十三年楊堅命楊素修仁壽宮的末段而來的；

『（開皇十五年三月仁壽宮修成）後，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仁壽殿一定是在仁壽宮裡——振鐸註），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瀰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旣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宜敕以咒遣之，自是乃息。』

當時：

『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徐……等州大水，百姓飢饉。』（食貨志）

確是事實，流落的飢民是可能而且一定會有的，但這裡的『燐火瀰漫，又聞哭聲。』是否可以看作是『流落飢民圖』呢？却有考慮的必要。記載上寫的很清楚，這是過年前的除夕初夜即所謂『歲暮晚日』——服役而死者的家屬去燒紙哭泣，而非經常如此。假如眞是流落的飢民，那麼只『乃令灑酒，宜敕以咒遣之，』自是乃息』却又爲不通，難道飢民可因此而不飢？因而，這可能只是除夕夜裡或那幾夜裡有過，「法事」作了以後，又過了年，當然也沒有天天去燒紙哭泣的道理。於是「乃息」。

（十）三〇七頁倒數第六行『「不受田」的農民，一面對地主納租服役、送禮，一面還要對官家繳納戶稅和服徭役等，負担都已不輕，此外還有各種納稅負担。』

『「不受地」的農民對地主納租服役，送禮』是正確的，因爲他是地主的佃戶。但『還要對官家繳納戶稅和服徭役等……還有各種納稅負担。』却是沒什麼根據的。（見本文（四）可能是呂先生將『未受地者，皆不課』列入『計戶徵稅』範圍內而想像出的。）

（十一）三〇九頁倒數第四行『西域各國和林邑（交趾支那）都沒有經戰爭，即成了隋的屬領。』

實際上林邑不是沒經過戰爭便成了隋的屬領的，是經過了很大的戰爭的。

隋書列傳第四十七林邑列傳裡：

『羣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寧長眞，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率衆而陣。方與戰僞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國有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十二）三二五頁正數第二行『公元六一一年（大業七年），受兵役重壓最苦的山東河北農民，首先起義，鄒平人王薄、翟讓等爲首的起義農民，……』；三二七頁倒數第二行『在人民起義軍裡，聲勢最大的是王薄、翟讓爲首的集團。』

這裡舉的『王薄翟讓』，實爲『王薄孟讓』，著者將『孟讓』與『翟讓』弄混了。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五五煬帝亡隋：

『（大業）七年鄒平王薄擁衆據長白山……

『九年三月……齊郡王薄孟讓，……各擄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

『十二年冬十月……韋城翟讓亡命於瓦崗爲羣盜。』

隋書煬帝紀：

『九年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

這就很能看清楚不是什麼『王薄翟讓』而是『王薄孟讓』，雖然孟讓的名字在大業九年方出現，但『王薄孟

讓」名字在一起，而且同在齊郡，王薄七年起義，孟讓也可能是和他一同起義的。但翟讓的名字卻在大業十二年才出現，可見他不是爲首起義的。

（十三）三二五頁倒數第七行『白楡妥爲首的靈武（寧夏靈武）少數民族人民起義。』；三二六頁倒數第六行『荔非世雄爲首的臨涇（甘肅鎮原）少數民族人民起義。』

涇是否眞是『少數民族人民起義』？呂先生也許以爲他們地近少數民族而如此推想？因爲通鑑等史籍上說白楡妥：

『亥稱奴賊。』

『劫掠牧馬。』

同樣，下面說『荔非世雄爲首的臨涇少數民族人民起義』，亦不知呂先生有何根據？一個領袖爲少數民族，不等於該集團都是少數民族。

（十四）三二六頁『蒼梧即廣西梧州』應作今廣東封川。

（十五）三二六頁正數第五行『盧月明爲首的涿郡人民起義。』『盧月明』爲『盧明月』之誤。

（十六）三三九頁倒數第一行『朱粲投降越王楊侗，接受其所封號（楚王）。』

朱粲並非投降越王楊侗，而是降唐受封。

綱鑑易知錄卷四十一隋紀恭帝：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振鐸註）朱粲降唐，以爲楚王。』（後繼投越王侗。）

（十七）三三〇頁正數第一行『劉季眞、杜伏威、輔公祏、高開道、郭子和等，則都爲着取得個人的官職和封號，投降唐朝。』

『高開道』並未投降唐，而是被其部將張金樹出賣，自殺而死。（見舊唐書高開道傳）。輔公祏則又是反唐而死的。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脫稿於長春。

附呂振羽覆函

編輯先生：

你的十月四日信及承寄羅元眞、高振鐸兩先生：『對呂著簡明中國通史隋代部份的幾點意見』原稿，均於九日收到，很是感謝。承囑爲「新建設」寫文章，本是義不容辭的；但在我目前的工作情況與腦病情況下，還要請你原諒，容緩報命。羅、高兩先生的大作我也深致感謝，特別對他們那樣對拙著逐節逐段去進行校正的精神，更十分歡迎，我想讀者也會同樣歡迎的。

羅高兩先生的大文所指摘的，如（一）是對的，也是梁德庚先生所已經指出的；（二）也是對的，「番三日」係「番三十日」之訛；（六）是完全對的，公元五九三年係五九二年之訛；（七）也是對的，「豫中」係「豫章」之訛，「紡紗」係「浣紗」之訛；（八）的「宇文述係「宇文愷」之訛；（十二）所指翟讓確爲孟讓之誤，孟讓是大業十三年（六一七年）纔爲翟讓合流的。（十四）隋時蒼梧應作今廣東封川，也是對的；（十五）「盧月明」確爲「盧明月」之訛。但其中有些是由於當時的校對和排印所引起的。

關於其他幾條，我以爲還可以商酌，特舉愚見以就商於羅高兩先生。如（三）「奴婢」應改爲「僕隸」，「隋書：食貨志」確是如此；但我以爲隋的「單丁及僕隸各半之」，也是北周制「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的沿襲，同時北朝文獻中一般都是用的「奴婢」字類而很少用「僕隸」。

第四條羅高兩位認爲『諸州無課調處及……管戶數少的「課州」「不受地者」，計戶徵稅』的「不受地者」是出於我的「想像」。但我以爲正由於隋朝一般定制：「未受地者皆不課」，所以高熲奏章的「諸州無課調處」正是各該州無受地之戶的處所，如邊遠之郡，「課州管戶數少者」也正是各該「課州」所管的「受地」的課戶少；他提出要「計戶徵稅」，正是說要向「未受地」之戶「徵稅」。如係指「受地」之戶，那已經是定制，何用再事奏請呢？而此種「徵稅」的目的，則在於由各該州本身去維持其「官人」的「祿力」，不要再從「隋近之州」去撥付。

第（五）條公元五九四年（開皇十四年）「皆給地以營農」的「給地」，即「公廨田」的給予，究係補給前此未曾給予之「京官及諸州」還是一律從這一年纔給予。我以爲還值得討論，我寫拙著「簡明中國通史」所參考之日文書籍「東洋史講座」等亦謂係開皇十四年，隋書亦有開皇十四年「詔省府州縣皆給公廨田」之記載；但由於魏書：「食貨志」有「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便認爲此制由來已久，不是由隋才創制，乃把「京官又給職分田……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看作開皇元年的事。這種看法是否妥當？今承羅高兩先生指出，應從新加以考証；但由於手邊材料太少，以及時間限制，僅能把這個問題提出。

第（八）條羅高兩先生說：「觀風行殿」原爲「觀風殿及行城」我以爲按「隋書，宇文愷傳」說「觀風行殿」還容易使讀者了解。

第（九）條「（文）帝以歲暮晚日登（岐州仁壽宮）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瀰漫，又聞哭聲……」羅高兩位謂我以之解釋爲「流落飢民圖」是「不恰當的」「想像的推論」，而應解釋爲「歲暮晚日」——服役而死者的家屬去燒紙哭泣……」。這種解釋也不是沒有可能。但當時的

實際情況是：「帝命楊素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台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顚仆者推塡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隋書食貨志）像這樣大規模的徭役，很明白役丁是來自四方各地的。遠地的役丁死了，其家屬除夕前來「燒紙」，我想不可能有那多「孟姜女」；而近地死於役的役丁家屬前來燒紙，我想又不可能形成那樣「燐火瀰漫」的場面，這是一方面。另方面，「隋書」又說：「開皇四年以後，京師頻旱，時遷都龍首建立宮室，百姓勞敝。」在開始營造仁壽宮之明年（開皇十四年），「五月辛未，京師地震，關內諸州旱。」「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我以爲這就是「流落飢民圖」的具體背景。至於「洒酒」「宣敕」以後「乃息」，我想也是不難明白的：楊素們能將「相次於道」的「死者」「一切焚除之」以掩文帝耳目，也就能惡毒地殘忍地驅散飢民的。

第（十）條，羅高兩位認爲「地主的佃戶」只「對地主納租、服役、送禮」對地主階級的政府就沒有什麼租稅了；因而說我認爲「一面還要對官家繳納戶稅和服徭役等，負担都不輕，此外還有各種納稅負担。」「都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兩位先生的這個意見是不大妥當的。總的說來，是從秦漢的「名田制」以來，由於租稅的分裂，地主則主要按地向農民收租，地主階級的政府則向農民收稅和征役，而且常常是花樣很多，不勝例舉。因此我以爲不要把「未受地者不課」的「課」去概括一切，也不要那樣去估量地主階級的政府。

第十四條謂「林邑不是沒經過戰爭便成了隋的屬領的，是經過了很大的戰爭的。」隋朝對林邑確進行過一次戰爭，其經過，據「隋書：南蠻傳」：「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林邑於「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寧長眞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僞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因此，原先本沒經戰爭，林邑便向隋朝貢貿易；後來由於隋朝統治者貪圖其「奇寶」，而又派兵進擊的。

第（十三）條，羅高兩位謂揣著：「白榆娑爲首的靈武（寧夏靈武）少數民族人民起義」，「荔非世雄爲目的臨涇（甘肅鎮原）少數民族人民起義」，爲沒有「根據」其意並謂白榆娑「妄稱奴賊」「劫掠牧馬」，算不得什麼人民起義，只是匪賊。我以爲這也是値得商討的。關於白榆娑條，隋書爲「白榆，妄稱奴賊」，通鑑爲白榆娑；「妄」「娑」兩字很可能係一字之訛，因而所謂「奴賊」不應出自其自己的稱謂，應是隋朝統治者所給予的，如同國民黨反動派誣起義的彝族人民爲「夷匪」，並誣他們如何「打家劫舍」一樣。所謂「奴賊」就表現了一種大民族主義的歧視。其次大概羅高兩位也認爲荔非世雄是屬於少數民族的人民。但是在當時種族關係的具體情況下，除非爲各種族人民的聯合起義，則以一個出身少數民族的人民來充任漢族起義人民的領袖，是很難想像的。而靈武、前漢朝所置，後漢廢，故城在今寧夏寧朔縣西北。後漢段熲追羌於令鮮水上及於靈武谷是也；後魏薄骨律鎮，後改置靈州；隋置靈武郡，即漢渾懷障，爲都尉治所，故城在今寧夏平羅縣東北二十五里。唐移置，故城在今寧夏靈武縣西北，後魏破赫連昌收胡戶徙此，號胡地城。臨涇，漢置，後魏廢，故城在今甘肅鎭原縣南五十里；隋置秋谷縣，改曰臨涇。靈武臨涇當時都主要是少數民族住區。

第（十六）條，羅高兩位謂「朱粲並非投降越王侗，而是降唐受封，後才投越王侗」。按「舊唐書」本傳：「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率兵以背粲諸州響應，相衆而攻之，大戰於淮源。粲敗，以數千兵奔於菊潭縣，遣使請降。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是糟藏猪肉。」確怒謾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雙耳，更得噉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於五世充，拜爲飛驃大將軍。」因此朱粲的降唐，並沒有完全實現，便半途變計的。

第（十七）條羅高兩位謂「高開道並未降唐，而是被其部將張金樹出賣，自殺而死，（見「舊唐書」高開道傳）輔公祏則又是反唐而死的」。按「舊唐書」高開道傳說：「羅藝在幽州爲竇建德所圍，告急於開道，乃率二千騎援之。建德憚其驍銳，於是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詔封北京郡王，賜姓李氏，授蔚州總管。時幽州大飢，開道許給之粟，藝遣老弱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甚悅，不以爲虞，乃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請粟於開道。悉留之。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國」與劉黑闥合流。又說：「時天下大定，開道欲降，自以數翻覆，終恐致藝。」是高開道曾降唐受其官爵封號，後又絕唐的。關於輔公祏「舊唐書」本傳說「公祏尋與伏威遣使歸國，拜爲淮南道行台尙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後因與杜伏威爲爭奪個人權利，伏威陰奪其兵權，公祏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僞學道辟穀以遠其事。武德五年，伏威將入朝，留公祏居守，復令（五）雄誕典兵以制公祏，陰謂曰：「吾入京若不失職，無令公祏爲變。」其後左遊仙乃說公祏令反，會雄誕屬疾於家，公祏奪其兵，詐言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因僭即僞位，自稱宋國，於陳故都築宮以居焉」。後失敗，逃至武康，「爲野人所執，送於丹陽，（李）孝恭斬之。」因此，輔公祏是與杜伏威一同降唐而受其官職封號的；後來也由於杜伏威的個人權利衝突，才又「反唐」的。

我除對羅高兩先生的一部份意見完全同意，並對其逐節逐段校對的精神表示十分歡迎與感謝外，並提出上述一些不成熟的意見，藉以與羅高兩先生及同道商榷。尙希兩先生繼續指教。

呂振羽　一九五〇、十、十四、大連

學術文摘

本刊摘錄這一欄，主要爲了節省讀者的時間。摘錄的部分，祇能包括各篇論文的要點和結論，以便讀者瞭解全文的大意。——編者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中國革命

陳伯達

十月革命給中國人介紹的馬克思主義，即是爲列寧、斯大林所恢復並加以發展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即是布爾什維主義。這布爾什維主義是在長期中和那種背叛馬克思主義、主張社會改良、反對社會革命，並與帝國主義合作的社會民主主義作鬥爭，而鍛鍊出來的，是和社會民主主義完全相反的對立物。

中國工人階級政黨一開始就和布爾什維主義相結合，這就使得我們黨和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前進的事業處在一個極其優越的地位。

中國工人階級政黨沒有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同時也即說明了中國工人運動沒有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中國廣大工人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發展起來的，因此，中國廣大工人羣衆所相信的，只有中國共產黨。

避免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根據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原則而建設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這是十月革命所給於中國革命的最集中的和最根本的影響。這一個影響是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命運的。

中國共產黨根據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主義，確定了關於中國革命的一個最根本的觀點，這就是中國革命必須是由中國工人階級來領導，而不能由別的階級來領導。

中國共產黨同時又根據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主義的革命精神，按照中國的條件，堅持了武力革命這一個觀念，特別是按照中國的特點，確定了關於工人階級領導農民戰爭這一個武力革命的觀念。

毫無疑問：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完全是屬於新型的，是屬於布爾什維主義類型的革命戰爭，我們的人民大革命，是屬於布爾什維主義類型的革命。

正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到中國，使我們產生了這樣一個革命黨，產生了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中國布爾什維克。這是中國革命一切問題的關鍵，這是中國歷史大轉變的關鍵。

中國人民正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踏上了十月革命所指出的推動帝國主義統治的道路。經過了許多曲折的道路和千辛萬苦的戰鬥，中國人民勝利了。這就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

布爾什維主義的所以勝利，因爲它是正確的科學，是代表人類的希望。它在俄國勝利，在東歐各國勝利，在中國勝利，並將繼續一國又一國地在全世界勝利，因爲這個革命的眞理是任何反動勢力所不可抵抗的。

（「中蘇友好」第一卷第一期）

馬克思主義的恐慌學說

郭大力

馬克思對於恐慌的分析，歸結起來，是像下面一樣：恐慌的一般可能性，是由於商品流動的性質（即買和賣的脫節）和貨幣流通的性質（即貨幣充做支付手段的機能）。這種抽象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社會，才轉化成爲現實性。這是由於資本與資本的交換具備着一切特殊的性質。必須保持比例的諸生產部門，不可能保持比例；已經結成連鎖關係的各個資本家，只要在一個大據點上受到襲擊，那就是，只要一個大生產部門內資本家的再生產（那包括着資本的流動過程）受到阻礙，全體系就會陷入危機。

價格變動，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會引起資本主義恐慌或危機，因爲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是必需有均衡性的，但它沒有可能用意識的方法去保持這種均衡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經常的，有引起恐慌的原動力。這個原

動力是什麼呢？那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這樣一種生產方式：它以剩餘價值的生產為目的。資本家一心想要多生產一些剩餘價值。在實行資本主義佔有制的社會內，生產已經充滿着社會的性質。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作為資本主義恐慌的原動力，也不外就是這種矛盾。

馬克思告訴我們，資本家為要生產剩餘價值，為要榨取更多的勞動，拚命把生產擴大了。但這樣生產出來的東西，不會被用來增加生產者大衆的消費能力。因之，在資本主義社會，經常存在着一個使生產發生過剩的原因。

總結：買與賣合一的必要性和貨幣充作支付手段的職能，是恐慌的最基本的因素，但不是有了這個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有了恐慌。這個因素，在資本主義社會，取得了發展的形態：其一，是由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性質規定的，一個資本家是否能把商品賣出，要看別一些資本家是否已經把商品賣出；其二，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信用制度規定的，一個資本家是否能夠支付，要看別一個資本家是否能夠支付。資本主義的這兩個特徵，規定了在這樣一個社會裡面，一個局部的變動已經會引起資本主義生產的恐慌或危機。除了各種偶然發生的事故，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有一個事情，在經常發生作用。那就是，資本家拚命發展生產，但却限制着勞動者的需要。只要資本主義的這個性質被證明了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恐慌也就被證明了是不可避免的了。

（「新中華」第十三卷第六期）

論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價值律

沈志遠

列寧和斯大林不僅明確地指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根據客觀的經濟規律而發展，他們還揭示了這些規律跟過去社會的經濟規律根本不同的特殊性。在過去社會中，經濟規律是不受人們的意志和意識的控制而自發地、盲目地活動着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却是、而且只能是作為人們所認識、人們所自覺掌握着的規律，通過人們自覺計劃化行動而實現其作用。

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無論在內容的實質上，或在表現的形式上，都跟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有着根本的區別。第一，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是表現建立在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制上的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它跟表現資本主義或其他剝削關係的經濟規律根本不同。第二，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是成為被認識了的必然性而發揮其作用，並且被自覺地利用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上去。經濟的計劃化本身既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同時，它又是人類自覺利用經濟規律的集中表現。這又跟盲目的統治着人的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是根本不同的。

列寧主要的建立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的商業和貨幣的理論。斯大林則繼續發展這一理論，並且把它應用到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上去，而獲得了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成就——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空前成就。斯大林一貫地發展着他關於商業和貨幣的學說時指出，在社會主義的階段上價值律不能被消滅，它仍將繼續發揮作用，只是它將以被改造了的形態發揮其作用而已。

為什麼社會主義社會需要保存價值律呢？這個既經統治着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制和直接社會的勞動（因為勞動已失去私的性質，從而也就失去了如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勞動兩重性），價值律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

價值律和商品貨幣關係（後者是前者的現象化）的必要性，正決定於以生產手段社會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決定於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在社會主義之下，「商——貨」或「貨——商」的買賣發生在兩種場合：一種是各個社會主義企業（包括國家的和集體農場的）之間的買賣；另外一種是社會主義企業（包括集體農場）與蘇維埃勞動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之間的買賣。前一種場合的商品交換關係之所以必要，是由於：（一）各個社會主義企業間的社會分工，（二）在社會主義階段上國營企業的財產獨立經營之必要。後一種場合的商品交換關係之所以必要，是由於社會主義的按勞（按勞動的質和量）給酬的分配原則。

社會主義的按勞給酬的原則，是以那作為商品交換之基礎的勞動等量原則，作為其基礎的。根據這一點，所以按勞給酬的原則實質上與各取所值的原則是同義的。勞動等量的原則同樣也成為企業中經濟核算制的基礎。

社會主義的按勞給酬原則和經濟核算制，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產生的新的經濟範疇；而價值却是從以前社會遺留下來而被改造了的範疇。這兩種範疇中間的聯系是在價值律一經掌握在計劃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手裡，就變成了實現社會主義的按勞給酬制和經濟核算制的工具了。

（「學習」第二卷第十二期）

「新理學」底自我批判

馮友蘭

在我底『一年學習總結』中，我曾經說：『我過去的哲學思想，阻礙了我自己底進步，並阻礙了有些別人底進步』；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接了些各地方朋友底來信，証實了，我過去的哲學思想，確曾阻礙了有些人底進步。

其中有一位未曾見過面的朋友，就是茅冥家先生。他的信上寫：『我之想與你通信，是因爲我曾經與你有過一段歷史淵源。因爲我曾經熱中於你的「新理學」，至於一切思想，言論，行動，都受你的影響……我做過一番自我批評而且做得很嚴格。我檢查我的過去而且檢查得很仔細。在檢查與批評中，我連帶檢查到了「新理學」與你，也批評了你的過去。因此有許多地方，我對於你的轉變，看成了我的轉變；對於你的改造，看成我的改造。』

茅先生底信使我很受感動。不過對於他所提的關於『新理學』的三點，我沒來得及很詳細地討論。一則因爲我近來的注意力，集中在學習新哲學。對於以前舊哲學底問題的討論，很有厭倦之感。再則茅先生所提的那三點，是他受『新理學』底一般影響而發生的錯誤。專就那三點說，與『新理學』底說法，還有相當的出入。若仔細討論起來，並非三言兩語，所能完結。

現在茅先生所提的那三點，已在報上發表了（見八月六日光明日報）。我似乎應該對於那幾點寫一篇討論的文章，但是上面所說的那兩點困難，仍然存在。我想，與其枝枝節節的討論，倒不如就『新理學』作一個一般的檢討，或者對於自己有更大的益處。

自從五四運動後，我很留意當時所謂中西文化問題。我一直認爲，中西文化底不同，是由於中西哲學底不同。一九三三年，我在英國住了半年，看了一些共產主義的書。歷史唯物論幫助我解決了中西文化問題。在抗戰時期，我所寫的新事論，那本書，就是這時期底思想結晶。照現在看起來，當時對於歷史唯物論的了解，是很不夠的。但是自從一九三三年起，我一直相信馬恩的歷史唯物論是正確的。不過一直到解放前，我一直相信我可以在歷史研究方面持唯物論。而在本體論方面不必持唯物論。

雖然如此，我底『新理學』，在開始卻是受我所了解的歷史唯物論底影響，或者可以說是啓示。以前我像很多人一樣，於談到文化問題時，分別文化，都是以國別或民族爲標準的，而歷史唯物論分別文化，則是以社會發展底階段爲標準的。從歷史唯物論底觀點看，凡國家或民族，屬於社會發展底某一階段的，它們在文化上是一類的，這就是說，如對於它們所有的文化作判斷，以它們爲主詞，可以同一的客詞形容它們。例如說，美國底文化是資產階級的文化；英國底文化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在這兩命題中，英國文化、美國文化是『個別』。資產階級的文化是『一般』。在這些命題中，我們看見個別與一般底對立與統一。

從對於各國別底文化的判斷，推廣到對於最普通事物的最普通的判斷。例如我們說：這個桌子是方的；這個桌子是『個別』，方的是『一般』。在這個命題中，我們也看見個別與一般底對立與統一。新理學那本書，就是這樣開始的。這樣的分析是不錯的。不過在新理學那本書中，我所注重的，不是一般與個別底統一，而是它們的對立。在一方面說，它們是對立的，不過專強調它們的對立，這就犯了列寧所說的『直線性與片面性』底錯誤。列寧在『談辯証法問題』一文裡說：『直線性與片面性，死板與僵化，主觀主義與主觀盲目病，這就是唯心主義底認識論上的根源。』

人的知識，是客觀事物底反映，客觀事物中有兩方面：在一方面中可以看到個別，在又一方面中可以看到一般。不知道此兩方面可以分別觀之，這是知識對於事物沒有分析，這是知識上的原始統一，也可說就是混沌。經過分析，知道事物有此兩方面，但同時須要知道這兩方面在客觀事物中是分不開的。具體的事物是兩方面底對立底統一。這在知識上是經過分析而又回到統一。這就是知識底提高一步。這樣就是知識底辯證的發展。

但是知識很可能就停留在分析那一階段上。由此而來的理論，就專強調個別與一般的對立，而忽略了它們底在客觀事物中的統一。新理學那本書底理論就是知識停留在這一階段的理論。

因爲有這一方面的強調，所以在解放以前，我所最不了解一個海格爾（即黑格爾——編者）底哲學名詞，就是『具體的共相』（就是特殊的一般）。照我以前的看法，這是兩個自相矛盾的名詞。現在我底看法是：當成名詞看，這是兩個自相矛盾的名詞。但從事實看，每一個東西都是一個具體的共相。了解了它是怎樣的一個具體的共相，我們就可以知道怎樣處理它。

對於具體的共相的了解，是我參加土改底一個主要的收穫。在土改中，一件主要的工作是劃成份。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階級成份；他是一個富農，或是一個貧農，或是一

個自由職業者。他有個什麼成份，就得到什麼待遇，每一個人都不僅只是張三或李四，而是一個富農或貧農等。由這一方面說，他都是一個現實的共相。現實的共相，就是具體。因此它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有血有肉的。它是個具體的共相。

我們現在反對美國，我們不是反對美國，而是反對一個帝國主義者。我們不是反對一個空洞的，抽象的，一般的，帝國主義者，而是美國那個帝國主義者。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者。美國是個別，帝國主義者是一般。除了美國外，還有許多別的帝國主義者。每一帝國主義者，都與美國不盡相同，而都是帝國主義者，這就是說，每一個具體的帝國主義者，其內容都比抽象的帝國主義內容豐富。美國那個帝國主義者，就是一個具體的共相，一個特殊的一般。知道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者，比只知道美國是美國，好得多，因爲若知道它是個帝國主義者，就知怎樣處理它。從美國這個帝國主義者去了解帝國主義者，也比專從『帝國主義者』底定義去了解帝國主義者好得多，因爲定義是抽象的，一個具體的帝國主義者比一個抽象的定義，內容豐富得多。

我的思想這樣中止在分析這一階段上，與我研究哲學底態度，是有關係的。我以前一向認爲哲學家的任務是觀察世界。宋朝底邵雍作有觀物篇。以前我很喜歡『觀物』兩個字。程顥有『靜觀萬物皆自得』一句詩，以前我很喜歡這『靜觀』兩個字。以前我以爲哲學家的任務，就是『靜觀』萬物，在自己的思想中，將其加以分析。哲學家是一個宇宙底旁觀者。這種態度，與新哲學家底態度完全相反。新哲學底任務不僅要解釋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實踐不是與知識對立的，而是知識底一部分。在新哲學中，理論必需與實踐合一。所以新哲學不能停留在分析那一階段。它不僅注重一般與個別在思想中的對立，而且注重它們在實際上的統一。

在解放以前，我本已不喜歡『唯心論』這個名詞。我自以爲我的哲學思想不是『唯心論』。我所以這樣的『以爲』，有兩點理由。第一點，我底哲學思想承認有獨立於心的外界。第二，我底哲學思想不承認心先宇宙的本質或根源。我承認心必有其物質的根據，始能存在。就第一點說，我底哲學思想不是舊哲學中所謂主觀的唯心論。就第二點說，我底哲學思想也不是舊哲學家中所謂客觀的唯心論。有此兩點理由，我一向不承認我的哲學思想是『唯心論的』。

近來我纔發現：因爲我強調個別與一般的對立，這種過分的強調，後來演繹爲一般可脫離了物質與自然獨立而自有。這也是唯心論底一種。在某一方面我躱開了唯心論；但在另一方面。我又陷入了唯心論底窠臼。

以前我以爲『新理學』的方法是對於事物作形式的分析。以前我很喜歡形式的這三個字。這是從形式邏輯來的。形式邏輯論到概念底聯繫時，不管概念與推論底內容，而只管其間的形式的關係。『新理學』中所謂形式的分析，亦是不管事物的具體的性質，而只對於事物，作形式的肯定。以爲事物必都是某種事物，有某種事物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爲某種事物者。某種事物之所以爲某種事物者，『新理學』稱之爲理或共相（即一般）。這樣只肯定有理。而對於理底內容，並不要知道，以爲知道理底內容，是科學的任務。不是哲學的任務。

可是這樣的哲學是空的。以前我承認它是空的。並且以爲哲學越空越好。它越空它就越純粹。但是這樣的哲學，有甚麼用處呢？我以前的回答是：這樣哲學的用處，不在於增加人底知識，而在於提高人底『境界』。

我在新原人那本書中提出的關於人底境界的說法。照現在看，那種提法及說法，是有害的。但是其中的主要意思，我現在還覺得是代表中國舊哲學底優良傳統，在新社會中還是有用的。我覺得，新社會供給那個意思，以更多的例証。在新社會中有些事情，在形式上看，與舊社會中有些事情好像沒有甚麼不同。例如工廠中的社會主義競賽，在形式上看，好像就是資本主義的工廠中哄騙工人多出勞力底辦法。可是覺悟的人知道，此二者在形式上雖有點相像，但是其意義是完全不同的。『紅旗歌』以戲劇底方法，說明其間的不同，並說明覺悟了這樣不同的人不僅工作對於他有了新的意義，生活對於他也有了新的意義。在新社會中，任何事都有了新意義，所以人的生活也有了新意義，這種新意義就構成了人底新的境界。

在新社會中，道德標準提高了。實際上是要把每一個人的境界都提高到『道德境界』。這是新社會的一個大的進步。有些人以爲共產主義，只提倡『鬥爭』，不提倡『合作』。所以它是提倡自私自利。又以爲共產主義注重『唯物』，所以只注重物質的享受，不注重精神的提高。這些論調，若非出於有意誹謗，就是出於完全無知。

就我現在所覺到的，新原人那本書關於『天地境界』的說法，是有問題的。若說一個人應有他底宇宙觀。他不僅要了解社會。還要了解宇宙。有了對於宇宙的了解，他底作爲對於他就另有一種意義。例如：一個人了解勞動創造人類，勞動創造世界。另一個人了解勞動可以增加社會生產。另一個人了解勞動可以得到上級的奬賞。這三個人對於勞動的了解不同，他們去勞動底時候，勞動底意義不同，他們底境界也就不同了。照新原人底說法，了解勞動有創造世界底意義的人，本著這個意義去勞動，在這樣的勞動中，他的境界是天地境界。這樣的說法似乎沒有什麼害處。

不過所謂天地境界很可能成爲僧侶主義的逃避主義底淵藪。對於沒有勇氣爲社會正義而奮鬥的人，不能夠把自己提高到道德境界，他即躱到自以爲是天地境界中去了。照新原人底理論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爲這樣的逃避，是出於自私自利，作這樣逃避的人底境界，實在是『功利境界』。我在理論上雖不以逃避爲然，可是在行動上却是總在逃避。新原人對於別人也可能有這種影響。這種影響是有害的。

不過提高人的境界並不必靠我所謂空的哲學。在以前我以爲提高境界，是人人都需要的，而以前所謂『技術的』哲學，即煩瑣哲學，則不是每個人所需要的（照現在看，它並不是任何人所需要的）。所以我有意將哲學精簡到幾個觀念。這幾個觀念可以提高人底境界。這是新知言那本書底主要意思。可是現在看，這樣空的觀念，與實際脫

離了聯繫。它所能提高的境界，大概是上面所說的逃避主義的。其實像勞動創造人類，及勞動創造世界，這一類與實際聯系的道理，一樣可以提高人底境界。而且可以在實際的工作中提高人底境界。

在新原道那本書裡，我指出在中國哲學中，有兩個傾向底對立；中國哲學的發展，是趨於將這個對立統一起來。這個講法有辯證法的意思。有個英國人讀了這本書，就問：『馮某人是不是共產黨？』當然這個問題證明他對於共產主義並不了解。那本書從辯証的觀點指出了中國哲學發展，但不是從唯物論的觀點。那兩個傾向的對立所隱藏的，其實就是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對立與矛盾。我應該將這種隱藏的實質揭露出來，並由此說明辯證唯物論底使命。辯証唯物論一方面對於以往的唯心論及機械唯物論，作『兩條戰線』底鬥爭，一方面又把它們優點統一起來。這是它底『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這種歷史的使命，在歷史中早已孕育起來，即在中國哲學底發展中，亦可見其端倪。

我說新原人提出關於人底境界的說法，那種提法是有害的。因為它是就個人立論，從個人出發的。新世訓那本書中，講修養方法，也是就個人立論，從個人出發。至於新哲學則無論講什麼，都是就羣衆立論，從羣衆出發。這是舊哲學與新哲學中間的一個主要的分歧點。照中國舊哲學底說法，一個不甘於庸俗的人，要希聖希賢，這就是說，要想把他自己成為聖人。宋儒以為成為聖人的人，不是離開社會的人。他要在社會的活動中，提高他自己，完成他自己。這與佛家比起來，是進了一步，但是他總還是就個人立論，從個人出發。

在新哲學中，一切都是從羣衆出發。『為人民服務』是對於每一個人在道德方面的要求 。不但為『人民服務』，還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是說，為人民服務，不能有一絲一毫自私自利的動機。新社會又要求每個人都以批評與自我批評底武器，隨時檢討，看他自己是否眞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樣的出發點就不同。這不是因為要使自己成為聖人，所以為人民服務，而是要為人民服務，所以必先完全忘我。

王陽明解釋大學底三綱領，以親民為明明德底工夫。他說：『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明德也。』新哲學對於人在道德方面的要求正與這個相反。借用舊名詞說，它是以明明德為親民的工夫。這樣就把宋明道學整個地翻過來，如同馬克思把海格爾整個地翻過來。

在階級社會裡，私有財產底制度，使每個人都有一種習慣，就是遇事都先想到自己。無產階級底哲學，就是無產階級社會底哲學。在這種社會裡，沒有私有財產，因此也沒有個人主義。一個人不但不想使他自己成為富人貴人，也不想使他自己成為聖人。可是他要為人民服務，他必須完全忘我。完全忘我是舊日所謂聖人底主要的成分。但是照舊日所講成為聖人底方法，實在不能使人成為聖人。因為假使一個人老想着使他自己成為聖人 ，他還是老想着他自己。老想着他自己就是不能忘我。宋明道學家常以為，佛家底人想叫自己成佛，是自私的。照現在看，道學家想叫自己成聖人，又何嘗不是自私的。

在新世訓那本書中，我有一篇討論感情底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雖不主張如道家哲學所說『以理化情』底辦法，但是我主張宋儒所說『情順萬物而無情』底理論。這種理論，現在無需細說，有一點可以說的，就是這種理論底實際的效果，是把情感冲淡了。它不能成為行為底推動力，而只是行為底一種無害的附屬品。這樣的理論，表現在我的態度及言語上。光明日報上有一篇通訊說我有一種異常的冷靜。還有一位現在作鄉村工作的清華同學給我的信上說：『抓住過我的，曾有兩種語言。一種是「新理學」式的，一種是農民式的。但前者使我恬靜，以至於冷酷，是沉靜。而後者則使我激奮到要流淚，要戰鬥。』當然冷靜與冷酷，所差是很有限的。

與革命隊伍這方面的人接觸以後，我覺得無論是他們的行事或言論，都是充滿了熱情。我想關於革命底發展，大概有這一種的情形，在革命底初期，革命的人，大多專靠天眞的，自發的，熱情，而缺乏理智的組織與計劃。我所見過的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都有這種情形。現在革命，則是有整套的理論與計劃，而又推動之以最高的熱情。在革命的行動中，理智領導了感情，好像領袖領導了羣衆。這樣理智與情感統一的人生，總是現實的豐富的人生。以前我以為我底那種辦法也是已經得到理智與情感的統一，但是照那種辦法，情感在實際上不能起積極作用。所以那種辦法仍是偏向於消滅情感那一方面。這就是僧侶主義底偏向。

總結起來說，我近來發現，我以前的哲學思想，不合於辯証唯物論的根本之點，在於辯証唯物論底精神與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對立及對立底統一，而我以前的哲學思想底精神與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對立底對立。因此與實踐結合的時候，辯証唯物論的精神與方法所得到的，到處都是統一，理論與實際統一，個人與羣衆統一，理智與情感統一。我以前的哲學思想底精神與方法所得到的，到處都是脫節，理論與實際脫節。個人與羣衆脫節。理智與情感脫節。

對於茅先生底對於新理學的評價，我有一些修正與補充。

第一，有些人以為我是主張復古開倒車的。這個我覺得不完全合乎事實。我的新事論，現在看起來，雖有許多的缺點，但總不能說是主張復古或開倒車。我也不相信不經革命的流血鬥爭即可使新社會來臨。不過我害怕流血，害怕自己流血，也害怕別人流血。『新理學』是以發揮『理學』開始，可是後來道家及禪宗的氣味，越來越重。它確是『代表着舊知識分子在現社會的失望悲觀中而又沒有力量求改革』，如茅先生所說的。

第二，茅先生說『新理學』是被壓迫階級底哲學。這大概是他底客氣之辭。在以前，我以為我是超階級的，我的哲學思想也是超階級的，它是對於任何階級的社會都可以用的。近來我了解，自以為是超階級的這個思想，本身就是統治階級底思想。當然所謂統治階級，其中又有許多階層。我與以前的絕大多數的哲學家一樣，都是屬於所謂士大夫階層的。它在舊社會中，『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在過去有個時候，我對於新哲學有相當的愛好。它幾乎要把我吸引到革命這邊來。但是我害怕改變我底『正常』

生活。這種『正常』生活，當然就是舊社會中一般士大夫的生活。這種生活決定我底思想向傳統的哲學中鑽牛角尖與打圈子。

抗日戰爭激發了我底民族主義的情感。這種情感，使我底哲學思想以總結舊哲學底方式表現出來。我近來覺得，總結舊哲學的工作，有兩種作法：一種是對以前哲學思想作一個批評的總批判；一種是對於以前哲學思想作一個同情的總了解。我以前所作的是後一種的總結。在舊社會將要崩潰之際，我要對於以前的思想，作『同情』的了解；在客觀的作用上說，豈不是等於要挽救它底崩潰。而挽救舊社會底崩潰，正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所需要的。我近來覺得：同是一句話，在不同的時候說，對不同的人說，用不同的方式說，都會有不同的社會作用，這一點我以前並沒有注意到。

茅先生說：在解放以前，『新理學』曾經是一個思想的支柱。假若眞是一個支柱，問題就在這裡了。無論我在主觀上是怎樣想法，可是在客觀的影響上，這個支柱是舊社會的支柱。在舊社會是革命底對象底時候，這個思想的支柱，然當也成爲革命的對象了。

在客觀方面有這樣的情形。在主觀方面，則有如有一位同學與我的信上說的。他說：『吾師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爲王」太久，受害可眞大，現在可要當敲警鐘。個人要有所發現，完全必要，用功的精神，更須發揚。但絕不許「稱孤道寡」連此思想及其相連的情感，都不許有。…：這點上正如你自己所說：「必須努力克服。」』

第三，茅先生說：新理學的流行，是一幕悲劇。從一方面看，可以這樣說。在以前我不會有階級觀點，但是民族觀點確是有的。上面說過，在抗日戰爭中，民族主義予我以很大的激發。我有意發揮我認爲是民族思想底優良傳統，以爲這是與民族有利的。可是後來革命底發展，使我底工作成爲革命底阻礙，也成爲民族利益底阻礙。從這一方面說，可以說，是悲劇。

若從別的方面說，無所謂悲劇。中國近代史變化得太劇烈，太快了。往往一個時期，在時間上，不過是幾年的工夫，可是在內容上，可以相當於普通歷史中一個很長的時代。『新理學』在開始的時候，是有它的進步性的。我不相信一個完全沒有進步性的東西，會在某一時能有相當的流行。就『新理學』說，它反對當時的實驗主義底不可知論。它反對當時直覺主義底非理性主義。它提倡邏輯的分析與清楚的思想。它試從唯物史觀底觀點，解決中國文化問題。它底民族主義的色彩在對日抗戰時期，在某方面相當地起了鼓動的作用。可是中國變得太快。不久它就失掉了進步性，而成爲進步的障礙，『爲歷史所淸算』。這是『勢所必至』，無所爲悲劇。

在我們習慣於舊哲學的人，社會的轉變，是我們的幸運。新哲學的成立，已竟有一百年底歷史，但我們對於它，或是淺嘗輒止，或是熟視無覩。直到全社會的改變，才使我們開始了解新哲學底眞理。這等於以全社會的轉變，爲我們作了一個科學的實驗。我們能遇到這樣的一個偉大的實驗場面，豈非千載一時底機會。

生在新社會的人，回看舊社會中的生活習慣，以及思想情感，好像是遊山的人，上在一個更高的山峯；回看以前所以爲是最高的山峯，已經是在脚底下，而它的全貌，以前所看不見的，現在已經看淸楚了，它的缺點，以前不顯露的，現在已經顯露出來了。在這種情形下，人能知道他底以前的偏見與錯誤，這實在是非常幸運的。

（轉載自十月八日光明日報「學術」）

稿約

一、本刊是學術性的月刊，內容包括哲學、史學、經濟、政治、法學、文藝理論及一般學術界應知的自然科學理論等部門，性質是研究的、介紹的和批判的。對於現實問題的理論分析，本刊尤爲注重。凡是這方面的學術論著或譯文，一律歡迎投稿。

二、投稿文字，以語體文爲主，須加新式標點。

三、譯稿請儘可能附交原文。

四、來稿一經發表，每千字即按北京人民銀行折實牌價六至十個單位致酬。

五、來稿刊出前如已發表，恕不致酬。

六、來稿本刊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七、稿末請註明作者眞實姓名和通訊處，以便聯系。

八、來稿請寄：「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新建設雜誌社編輯部」收。

更正

本刊第三卷第一期，第十九頁「關於幾個哲學問題」，小標題「第三、哲學的黨性關係問題」，「關係」兩字係誤植。第二十一頁下半段倒數第十五行「公開主張哲學應爲工人階級黨的政治路線和人民的利益服務」，應接於倒數第十六行「公開主張辯證唯物論是工人階級鬥爭的思想武器」之後。

又據「馬克思的週期恐慌學說」作者樊弘先生來函稱：第二十八頁下半段第二十行「必須是有」應爲「必須沒有」。同段第二十五行「並不沒」應爲「並不是」。第二十九頁下半段第三十一行「商品的信用」應改爲「商業的信用」。第三十頁上半段第七行「支付手段」應改爲「現貨手段」。第三十二頁上半段第二十四行「不能往下慘落」應改爲「不能不往下慘落」。第三十三頁上半段第五行「貼現局」應改爲「承兌局」。同頁上半段第二十六行「銀貨款」應改爲「銀行貸款」。

又，據「論商品與貨幣」譯者吳恩裕先生來函稱：第六十四頁上半段第十二行「棉花」應改爲「羊毛」。

學習 半月刊 **創刊一週年**

徵求十萬紀念訂戶

·訂閱八折優待·

預訂三月六期九千六百元，半年十二期一萬九千二百元，全年二十四期三萬八千四百元，(平寄郵費免收)自九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止訂閱八折優待。第三卷第一期爲特大號，訂戶概不加價，歡迎機關、學校、工廠、部隊集體訂閱。各地新華書店均可預訂。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北京·上海·瀋陽·重慶·西安·廣州·香港
天津·大連·哈爾濱·長沙·開封·濟南

「學習」半月刊第三卷內容

一。繼續幫助讀者學習幹部必讀十二本書，並做到更好地與各地學習進度相配合，照顧各個地區大多數讀者的需要。

二、努力使理論密切聯系實際，加強配合時事政策的學習，增加以理論來說明政策的文章。

三　加強學習的思想指導，增闢「社論」一欄，對有關學習的重大問題代表本社發表評論，並增闢「學習評論」一欄，經常評論學習中的各種問題。

四，照顧一般讀者的理論文化水平，努力作到通俗化。

五　根據以上原則，第三卷起除原有大部分欄目外，並增添一些欄目。主要欄目如下（這些欄目不一定每期都有）：

1. 學習文件
2. 社論
3. 學習評論
4. 論文（關於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和基本知識的；關於中國革命的基本觀點和基本知識的；關於當前時事政策的；關於學習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
5. 問題解答（與第二卷同。但力求簡練正確）
6. 講座（有系統的講述各種基本知識，例如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講座，共同綱領講座，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講座等。三卷一期起先連載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講座一種）
7. 名著題解（介紹馬列主義理論名著）與圖書評論（以介紹適合自學用的新書為主）
8. 半月談（主要評論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幹部教育中的一些思想問題）
9. 讀者討論會（討論在讀者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10. 學習經驗（個人學習的經驗、集體學習的經驗）
11. [illegible]

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科學討論會

十月十八日到二十日，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了第一次科學討論會。科學討論會是中國人民大學推動學術研究工作的一種制度，這次是爲了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國慶而舉辦的，討論會的主要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年來各方面的成就。並宣讀下列論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營工業管理組織的基本原則與體系」；「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立與鞏固財政制度上的成就」；「在新中國建設中，國家預算的實質與意義」，「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貨幣流通組織及鞏固方面的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制度的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信用制度組織及信任的基本開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的清算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成成就」；「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經濟的性質」；「人民中國消費合作社的性質、作用與任務」；「列寧關於統計的學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造會計制度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法制的建立與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的組織」；「中國國家法擬底把握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爲國際法的民主原則而鬥爭」；「斯大林關於語言的學說」；「論新中國的道德教育」等篇。

地質學家裴文中等考查東北文物古蹟

地質學家裴文中等九人，奉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命令，到遼西考查古蹟文物。九月下旬到達錦州，即赴錦西縣沙鍋屯觀察史前人類所居的洞穴。這洞穴在距城東二里多的山僻，三十年前曾被帝國主義學者安特生發掘，運走遺骨、骨器、獸骨、紅陶器、彩陶器和石器很多。後曾到義縣觀察萬佛洞、遼塔、奉國寺（即大佛寺）。並考查義縣九區清河門的遼墓和變山口（即土團子）已發現的三個古墓。

國際民主法學工作者聯合會動態

國際民主法學工作者聯合會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在巴黎成立，最初參加的有廿個國家，現已增加到三十四國，我國的新法學研究會也爲正式會員。該會的主要任務是交流經驗，促進彼此相互了解和合作，並建立民主的國際法章程中號召全世界民主法學工作者共爲發展民主權利與自由、維護法學中的民主原則，和爭取持久和平而努力。

聯合會於今年四月，曾在布達佩斯召開理事會，號召全世界法學工作者熱烈響應和平簽名，堅決反對原子戰爭。

聯合會已在五個國家成立分支組織，並在廿一個國家成立通訊機構，最近，復號召各國民主法學工作者採取更有效的步驟，進行保衛和平、反對侵略的鬥爭。

塔什克設立新馬恩列學院

塔什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斯大林頓納地方，新設了馬恩列學院的塔什克分院。這分院將把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用塔什克語文翻譯出版，並要進行研究檔存的關於塔什克黨組織的歷史資料，目前已有很多著名的科學工作者、編輯和翻譯工作者參加工作。

朝鮮學者爲祖國獻身

八月七日平壤電台廣播：南朝鮮的科學、文化藝術工作者五百餘人舉行大會，通過反對美國侵略，爲祖國而鬥爭的決議。著名語言學家金與穆（譯音）在會上講話，歷述美帝企圖將朝鮮變爲殖民地，野蠻地屠殺無辜的朝鮮人民，毀壞文化教育機關等罪行，並號召全國文化科學工作者團結起來，反對美帝侵略，堅決保衛祖國。

拉脫維亞國書館六十五週年紀念

拉脫維亞科學院所領導的米西尼圖書館，是拉脫維亞共和國最老和規模最大的圖書館，成立到現在，已有六十五年。它的創建人是拉脫維亞的一個農民，名叫楊、米西尼，他收集了很多十六至十八世紀出版的拉脫維亞文孤本書籍，和大量的文學期刊。一九二五年，米西尼把自己的圖書館捐贈給里加城，到今天，米西尼圖書館已成爲全國的文化工作中心，它與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圖書館建立圖書交換制度；並爲集體農場特別組織二十隊流動圖書供應隊。

日本學術新著

日共機關雜誌編委會最近出版了「世界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本書「竝在從側面來解說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各個構成部分。」全書分爲三篇：第一篇從理論上說明一般危機的本質，並從歷史上敘述它的發展過程。第二篇對一般危機的特徵和構成部份加以檢討。第三篇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般危機的新特徵有所論列。此外並在卷首附有「關於一般危機的若干問題」，作爲補充的解說。

這部書是由進步人士朝野均三郎所譯，由東京六月書店發行。

此外，「列寧的農業問題」一書，也由進步人士朝野均譯爲日文，由東京青木書店出版。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新字第五十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世界知識

『世界知識』週刊是國內唯一歷史悠久的國際問題綜合刊物。每期特約各方面專家撰述當前世界局勢動向及有關國際問題的專文，文字淺近，講解清晰，以幫助讀者認識目前形勢、增加國際知識，並解答在學習國際時事中的疑難問題。

經售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訂閱處　京、滬本社，全國各地郵局，新華、三聯、聯營書店，工人、青年出版社
零售每册基價二元按八百倍計算
預訂價　（平寄）三月（12期）24元
半年（24期）44元全年（48期）82元
掛號郵寄國外平寄每期另加一千元
老訂戶及集體訂閱十份以上九折優待
圖書館及資料室具證件來訂九折優待

翻譯

綜合月刊　新思潮　新文化

內容包括思想、學術、文藝、時事分析、翻譯理論、推譯批評、文化報導、書報評介及「翻譯工作者協會」通訊等欄，爲該會機關刊物。

每月一日出版　　零售每册基價五元
預定半年共六册計（平寄）基價三十元
（掛號郵費另加七千三百元）
「世界知識」訂戶訂閱本刊九折優待
訂閱處：同「世界知識」訂閱處

世界知識叢書之三十

我要知道原子問題

約里奧—居里原作　郭沫若先生序
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編譯

基價三元

本書是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委員會機關刊『保衛和平者』一個專號。內容包括約里奧—居里教授的『科學應爲和平服務』及法國卓越科學家關於原子問題的報告，及我國保衛和平大會主席郭沫若先生的序言。把原子能問題各方面解釋得深入淺出，非常明確。特別指出原子能用於和平建設可以增進人類的幸福，用於戰爭則是對人類殘酷的毀滅。是愛好和平者必讀和精讀的。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叢書之二

經濟危機與冷戰

美・傑姆士・艾倫等著
凌　青・張文漣合譯

基價六元五角

本書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分析戰後經濟危機的發展及其與冷戰之關係的著作。全書由七篇論文組成，都是美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根據研究結果而寫成，發表前經過集體研究，因此是一部非常珍貴而有價值的著作。篇首是福斯特論杜魯門的管制經濟與戰爭危機。其他如美國的世界地位及經濟危機，發展中的經濟恐慌，冷戰和國外市場，人民生活情況等，都給予深刻的分析，研究美帝經濟的不能不讀。

新書預告

第二次大戰馬來亞民族解放鬥爭　邦達列夫斯基著　陳用儀譯
五國紀行　愛倫堡著　根　香譯
美帝侵略下的拉丁美洲　陳麟瑞譯
金圓帝國主義　列昂節夫著　葛辛譯

世界知識社出版

北京東堂子胡同四十七號　電話五局二一四〇

新建設 月刊

第三卷・第二期

負責人　費　青

編輯委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千家駒　向　達　*沈志遠
*吳　晗　狄超白　李廣田
金岳霖　范文瀾　*胡　繩
袁翰青　孫曉邨　*陶大鏞
*費　青　費孝通　*張志讓
*傅彬然　聞家駟　雷潔瓊
樊　弘　*鄭　昕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儲安平
鍾潛九　*謝覺哉　嚴景耀
（有*者，爲常務編輯委員）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上海辦事處：上海延安東路中匯大樓六一八室

總經售　新華書店

本期基價每册五元

訂閱：
三個月三期　基價十五元
半年六期　基價二十八元五角
全年十二期　基價五十四元
均按預定時發售倍數收費
平寄郵費免收　掛號郵費另加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基本定價每册五元